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編

現代歐洲政治經濟

·(三)

柯爾夫著

仲雲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編 政治學 叢書

吾師夫樹桐

著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十 斯坎的納維亞諸國

歐洲的西北部，有三個僅藉狹隘的土腰，與大陸相連接的國家，通常併稱爲斯坎的納維亞諸國，分開說，爲諾威、瑞典、丹麥。這三個國家，其地理上的相似，實不及人種上及文化上相似之甚。因爲這三國的氣候，彼此大不相同，且如丹麥，以一個狹小而平坦的農業區域，維持着十分稠密的人口，而諾威的情形，則恰與之相反，土地廣袤，人口稀少，且全境多山，致大部分的土地『全然不能生產』。然而人種上的統一卻是十二分的確實。原來這三國的人民，同爲第一篇中所說過的諾斯曼人種的後裔，其他的人種可說很少很少（在歐洲，瑞典恐怕要算是民族最純粹的國家。除芬蘭及住有少數德國人的什列斯威（Schleswig）以外，北歐是沒有所謂少數民族問題的）。縱觀歐洲史的各個時代，北歐諸國有時三國合併，有時兩國合併，常同受一個君主的統治；自一九〇五年諾威與瑞典的統一破裂以後，始成今日之局面。遠在第九世紀與第十世紀，斯坎的納維亞卽已爲諾斯曼人

所發現，此後，其統治權曾一度遠擴至斯坎的納維亞本部以外，但在現今，這個帝國的遺蹟之足資紀念者，亦不過下列三事，其一爲丹麥領有冰島，其二爲諾威領有北冰洋的斯匹次北爾根（Svalbard，Bergen）其三爲丹麥與諾威共同領有格林蘭島，格林蘭主權的糾紛，還是最近一九三三年方纔圓滿解決的。

關於斯坎的納維亞諸國，其最饒趣味之事，爲從過去的冒險的海盜生活，發展到現在的和平主義，優良的文化，與自由的制度。但凡涉獵過歷史的人，一聽到丹麥、諾威、瑞典等名字，便會聯想起維金人的劫掠，克努得的廣大的帝國，斯德哥爾摩的血浴（Stockholm Blood-bath），亞道爾夫（Gustavus Adolphus）與查理七世的遠征等等；但留心二十世紀的歷史者，則毋寧聯想到易卜生（Ibsen）的劇本，南孫（Nansen）之北冰洋的探險或歐戰難民賑務的主持，丹麥的合作運動，丹麥的高等學校，瑞典的選舉法與監獄制度等等。當大戰時，三國全都保守中立，而且在將來，他們也似乎有永遠不參加戰爭的絕大可能。就中有一國（丹麥）甚至將軍備完全廢除。一旦發生領上的糾紛，或則組織相互的法庭審理之，或則提交國際法庭請求公斷，從不憑藉武力取得解決。

一向從航海與軍事尋求發洩的民族力量，能不掉掉原來的氣魄，而轉向到和平事業，在這個世界，恐怕只有上述三國可當其選了。

諾威

三國中的最北一國是諾威，狹長而多山的領土，從北緯十三度起，迤邐向北，到達終點時，已深入北冰洋界內。在亨墨菲斯（Hammerfest）那個都市，每逢夏季，太陽就永遠不會沉到地平線以下；爲了這一逕照着的陽光，諾威有許多地方在整個夏季內竟只知有晝，不知有夜。然而諾威的地位雖然是這樣的處於極北，那流經海岸不遠的灣流（Gulf Stream），卻使之有非常調和的氣候，尤其是高大的山，把從俄國來的乾燥而嚴寒的大陸氣候擋住，所以諾威的氣候，能益臻完美的境地。氣候的調和，以及天然風景的美麗，替諾威吸引了許多夏季遊客，而且遊客的數目年有增加，諾威人這一注收入一定不少罷。

諾威高出海平面的平均高度，較歐洲全部的平均高度過於百分之六十。這並不是因爲有很

高的山，諾威最高的山峯，亦不過六千餘呎；而是因爲山地對平原的比例，佔着絕對的優勢。卽在海洋中，亦呈此種特點，諾威沿海岸綿亙着不絕的峽江以及密集的小島，便是這個特點所造成。假如把犬牙交錯的海岸綫，細加計算，那末諾威實際上的海岸綫，約爲地圖上的海岸綫的六倍。可知諾威的漁業與航業的發達，並不是無故的。還有，山陵的起伏，造成了許多具有絕大速度的河流，因而替水力電的供給備就了極好的基礎。統計起來，挪威的河流共可供給約一千二百萬匹馬力的水力電，就中未被利用者居其一千萬。對於缺乏煤炭的諾威，這棄置不問的一千萬匹馬力的水力電，將在相當期間內貢獻絕大的幫助，是不待言的。

當然，像這樣廣大的山地，其意義便是諾威的大部分，不適用於居住，並不適用於經濟上的用途。居民約三百萬，以平均每方哩二十二又二分之一的人口密度，散佈各處，——除俄國外，歐洲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低的人口密度。人口在十萬以上的都市只有一個，那就是奧斯羅（Oslo）。可供耕種之地，僅居全境二·五%，森林地帶佔二四·二%，而「全然不能生產」的土地，則居七二%。所以諾威僅生產極小量的穀物，如雀麥及大麥之類，比較重要的農產品是馬鈴薯。

由上可知諾威是個非常需要進口貨的國家。差不多所有食糧，都需從國外購進，同時又需進口大量的煤，不過北冰洋岸幾同無人島一樣的斯匹次北爾根，卻能供給少量的煤，替缺乏煤炭的諾威解嘲。此外，織物與交通用具的進口量，也大有可觀。進口的礦產品，以煤為大宗，這是因為諾威有相當數量的鐵礦與銀礦之故。進口貨的重要供給者為英德兩國，美國就差得遠了。以上是諾威進口貨的情形。對於這種巨大的進口額，諾威便藉輸出大量的木材、製紙原料、紙張、魚、魚類產品，以為抵償；在這些輸出品中，最後兩項，即生魚與魚類製品，佔總輸出額百分之二十五。罐頭食品工業——主要的當然是魚類——進步甚速，各種電氣金工業亦然。輸出品大部分銷往英國。除此以外航業亦非常發達，這使諾威顯然不利的差額，得以減少不少。以人口為比例，諾威的商輪可說是非常的多（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在四百萬噸以上）；當大戰時，諾威商輪以受潛水艦襲擊，曾損失甚多，於此尤足見諾威商輪的數量為何如了。

雖然境內住有數近二萬的拉伯人 (Lapps)，極北部分住有少數芬蘭人，諾威的民族總可算得是十分純粹。居民有百分之九十七為路德教徒，但其實除猶太教外，任何宗教都在不禁。教育

程度極高，不識字者絕無僅有。又諾威的刑法，亦以寬大爲世所稱。

在中古時代初期非常活動而且佔着重要地位的諾威，在以後的數世紀中，忽然一降而爲斯坎的納維亞三國中最弱的國家。自從喀爾馬聯合王國（Union of Kalmar）（一三九七年）將斯坎的納維亞三國併而爲一，同受丹麥王統治之後，諾威就繼續臣屬於丹麥，一直等到拿破崙戰爭終止，打了勝仗的同盟軍爲要懲罰丹麥在戰爭期間的態度，纔把諾威從丹麥手中奪出，使之歸附於瑞典。然而諾威的覺醒的民族意識，卻不以與瑞典聯合爲然，瑞典雖允給以最大的自治權，也不能消弭諾威與日俱深的不滿；及至一九〇五年，爲了派遣外交代表問題，發生爭執，爭執了若干時以後，瑞典與諾威的聯合卒告破裂。自此以後，諾威遂爲獨立自主的國家。歐戰時期，始終嚴守中立。最近與各國互訂通商條約，英國也是其中之一。

諾威的政體爲君主立憲，王位世襲，議會（Storting）採取比例代表制度，凡年齡在二十三歲以上者，不論男女，都有選舉權。遠在一九〇七年，諾威即准許婦女有參政權，亦可謂得風氣之先了。議會全由人民選舉，選出後分爲兩院，四分之一的議員隸上院（Lagting），四分之三的議員隸

下院 (Odelsling)。上下兩院分別舉行集會討論等事務，但當兩院意見不一致連續至兩次時，則舉行聯席會議，藉以解決爭端。議員總額為一百五十，都市代表居三分之二，鄉村代表居三分之一。議員年齡須在三十歲以上，在任期內，得享受薪俸。國王對議會的提案有否決權，但議會也可置之不顧。又諾威的地方政府，權限甚大，中央政府不能對之有十分的干涉。

諾威現今的內閣，係左翼自由黨所組織，為一九三三年的農民黨內閣的後繼者。像其他比例代表制度的國家一般，諾威歷來的政府，大都由各政黨聯合主持，即在單獨一個政黨上臺之時，實際上也不能不與其他的政黨合作。然而勞工黨卻是例外，卻從來不與旁的政黨聯合。這是諾威議會中最大的政黨，也就是歐洲唯一在議會中佔有絕大勢力的左翼社會黨。這對馬克思主義抱有極強的信心，故曾一度加入第三國際，但於一九二三年宣告脫離。勞工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他是推翻現狀為目標的，卻居然能在諾威始終保持其存在，其與第三國際的關係雖已斷絕，但又不屑與第二國際發生關係，像這樣的政黨真是少有的。他曾於一九二七年在挪威建立社會主義政府，不幸閱時不久，即因財政難關無法打開，突然解體。當時繼勞工黨組閣的人，就是現內閣總

理摩溫克爾 (Mowinckel)。

瑞典

瑞典爲斯坎的納維亞三國中之最大者。人口六百萬，幾全爲瑞典民族。這個國家的人口平均密度，是每方哩三五·四人都。城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的居民，約在五十萬之譜，此外又有三個都市，居民各在十萬以上。瑞典的山地，遠沒像諾威那麼多，可是氣候卻比諾威更爲大陸性，這是因爲從東方吹來的俄國的寒風，在整個冬季內把波羅的海凍結起來，使瑞典本部的溫度呈繁複變化之故。不過自然富源，則到底瑞典勝於諾威。可耕之地佔全境九·三%，森林區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這廣大的森林區，便供給瑞典的木材業與造紙業以充分的原料。然而以瑞典森林之豐富，近年來竟也露枯竭之象，故植林政策的採取，已成爲瑞典當務之急了。

以食糧論，瑞典當然談不到自給。縱使能够生產那麼豐富的畜類製品，致有某種數量的牛油與醃肉可供輸出，也還是不能不從國外購進大宗穀類以供自己的消耗。農民差不多有四分之三

是擁有田產的。小農場開辦得很多，唯尚比不上丹麥。人民之住在鄉間者，不到三分之一。除食糧外，瑞典又得進口巨量的煤，因為國內的產量實在不够應用。在大戰前，煤大都從英國來，及大戰發生，英國煤遂被德國煤所替代，一直到現在還是這種情形，一九三三年英國與瑞典互訂通商條約，希望恢復英國煤在瑞典的市場，但似乎還不會見效。此外，織物在瑞典進口貨中，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大體上，瑞典的輸入品與輸出品是尙能保持平衡的。輸出品的主要項目爲木材與鐵。廣大的森林區，供給巨量的木材，而共長二萬哩的內河，則替這些木材供給便利的交通，及木材已到達目的地，則以之製成木料，或造紙原料，或紙張，又或火柴，行銷國外。因克魯革 (Ivar Kreuger) 的自殺而聞名世界的瑞典火柴組合 (Swedish Match Combine)，其出品在全歐火柴消費上，實佔極重要的地位。至如鐵，則瑞典鐵的著名，已有數世紀之久。在北部，即拉伯人的住區，鐵礦之富，世罕其儔，故可供輸出之鐵，竟佔全部產量五分之四之多。可是近幾年來，瑞典的鋼鐵生產，已漸呈式微之勢。瑞典的輸出品，以英國爲最大的主顧，但輸入品從德國來的，比從英國來的多。

瑞典像諾威一樣，於一三九七年被併於丹麥，及至十六世紀，由發薩（Gustavus Vasa）領導，脫離丹麥的羈絆而獨立，在這其間，曾發生一次大屠殺，那就是前面說過的斯德哥爾摩的血浴。自此以後，瑞典遂漸進而為波羅的海的強國，并在歐洲的政治舞臺上充當要角，尤其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原來那個世紀，亞道爾夫為三十年戰爭中的重要人物，而在這個世紀的末葉，查理七世為要貫徹其掩有波羅的海全部的夢想，率兵侵犯俄國。像其他的侵入俄國者一樣，查理七世一敗塗地，致瑞典喪失不少在波羅的海的領土，不過尚能保持對芬蘭及一部分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主權，及至拿破崙戰爭結束，這兩個區域亦見併於俄，而瑞典則獲得諾威，聊以自慰。多半由於人口的稀少，瑞典到了十九世紀，忽然漸趨式微，卒失其原來強國的地位。在大戰中，始終保持中立；但瑞典是德國出口貨主要尾閭之一，所以大戰期內，屢蒙協約國投射疑忌的眼光，處境非常困難。瑞典的國界問題，與西面的諾威，並無多大糾紛，不過在兩國的邊界上，住有特遊牧為生的拉伯人，他們只知驅着北極鹿隨意往來，並不知國界為何物，因此瑞典不能不與諾威訂條約，用來約束這種遊牧民族。至如與東面的芬蘭，最重要的糾紛，即奧蘭羣島的所有權問題，已於一九二一

年，如芬蘭之意獲得解決了。

像諾威一樣，瑞典也是個君主立憲國家，其憲法訂立於一八〇九年，而在一九一九年加以修改，規定婦女也有參政權。議會（Riksdag）分上下兩院，下院人數二百三十，四年一選，凡人民年齡在二十三歲以上者，均得參加選舉。上院人數一百五十，年齡須在三十五歲以上，八年一選，則由地方議會的議員推舉。上院的議員還有一種必需的資格，那就是財產，苟財產不敷規定的數額，即不能當選。不論上下院的選舉，都採取比例代表制。假如兩院爲了財政上的問題發生爭執，則舉行聯席會議，藉投票取得解決。實際，議會的事務，大都由常務委員處理，凡議案的討論與修改，常務委員均有極大的權限。

如在諾威一般，瑞典並沒有一個政黨在議會中保持顯明的大多數。不論上下兩院，規模比較巨大的政黨是社會民主黨，成立於一八八〇至九〇年間，久受布蘭丁（Hjalmar Branting）的領導，始終抱着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策。大戰以後，瑞典曾有過好幾次社會民主黨政府，即如現今的政府，也由社會民主黨組織，自一九三二年九月登台以來，迄未發生變動。此外又有右翼黨，農民黨，

自由黨等，但自由黨爲了禁酒問題，內部已呈分裂了。

酒料之禁止販賣與准許販賣，可說是瑞典辯論得最激烈的問題，原來自一七七五年以來，因政府專賣的結果，飲酒者，尤其是飲烈性酒料者，曾有一時反呈激增之象。所以瑞典人早就以嗜酒若命出名。然而這對於人民的身體與文化，好像並沒有發生不良的影響。瑞典的死亡率，在歐洲爲最低，至其教育程度，則可與教育最發達的國家相媲美。驚人數目的電話——瑞典平均每十四人有電話一架，英國僅每四十人有電話一架——我們不妨就視爲瑞典的教育程度的一個說明。以言宗教，瑞典人百分之九十九係路德教徒。故瑞典既沒有少數民族問題，也沒有少數宗教問題，這使瑞典省去了無數麻煩。

丹麥

丹麥這個國家，由介乎波羅的海與北海中間的一個向北突出的半島，以及波羅的海中的三個島嶼合成。此外，位於奧克尼羣島（Orkneys）以北的非羅羣島（Faroe Islands），亦爲丹麥領

地，而丹麥王同時又爲名爲獨立國家的冰島的國王。又，操丹麥語的人民所居住的什列斯威，向來受德國的統治的，於一九二〇年因全民投票的結果，給劃入丹麥的版圖。這個區域內的德國人，德國的國社黨現正力謀挑起其不滿的情緒，倘使沒有這些德國人，那末丹麥境內儘可說沒有少數民族的尙在。人口總數爲三百五十萬，散處在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方哩的土地上。哥本哈根（Copenhagen）是唯一的大都市。至於宗教，路德教幾已成爲丹麥的國教，但也有極少數人（不到百分之二）信奉其他的宗教；其實在丹麥，信徒是絕對自由的。

丹麥之最使人感興趣者，爲其一般的性質，在過去百年當中，大變而特變，致前後判若兩國。其他的國家，變化的狀態固亦非常複雜，或有重大的獲得，或有重大的損失；但丹麥的變化卻是例外，他是完全變了樣。中古時代的丹麥，是個強大的，好勇善鬪的，封建制度的王國。當十世紀的時候，斯汶（Sweyn）四處征戰，結果傳給他的兒子克努，得以一個廣大的海上帝國，其版圖西起英國，東訖波蘭邊疆。這個帝國後來卒歸崩解。但是到了一三九七年，喀爾馬聯合王國合併瑞典、諾威、丹麥三國，使同受丹麥王的統治，於是丹麥國勢又振，爲波羅的海的重要國家者至數世紀之久。在拿破崙

戰爭期中，丹麥名義上守中立，事實上卻表同情於拿破崙，英國恐怕丹麥艦隊爲拿破崙所利用，立即對丹麥提出艦隊的要求，並砲擊哥本哈根以示威。待拿破崙戰爭結束，在巴黎的和會席上，勝利的同盟國於是從丹麥手中奪去諾威，交給瑞典，藉示懲罰。自此以後，丹麥在歐洲政治舞臺上的地位，便一天天的降落。當一八六六年時，舉行了一次無效果的抗拒以後，丹麥逼得對普魯士讓步，承認後者之佔領什列斯威、好斯敦爲合理，雖則同時各國聯合給與一個保證，擔保其領土與王冠的安全，但這不過是聊平丹麥之氣而已。丹麥的憲法，頒布於一八四九年，但後來爲了要給與地主以更大的勢力，頗有修改，因此招惹了人民很大的不滿。

但巨大的經濟變革，終於隨着農民之專力於合作運動而俱來。原來合作運動的本意，共有兩點，其一爲削弱地主與居間人的勢力，其二爲使丹麥的農業有一個新的基礎，俾不致被美國巨大的雜糧產額所破壞。

世界上第一個合作牛乳場，是一八八二年在求德蘭半島（Jutland）出現的。但丹麥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的智識，則早已有很好的根柢，這完全出布藍特威神父（Bishop Grundtvig）所發

起的民衆高等學校之賜，他的第一個民衆高等學校，創立於一八四四年，因此之故，丹麥的農民較歐洲其他地方的農民更易了解合作運動的經濟的目的，對於合作運動的推行，也就便能踴躍參加了。

合作運動自開始後，進展甚速。合作牛乳場在很短期間，就把舊有的私有牛乳場打倒；於是合作豬肉製品工場，合作雞蛋會社等組織，隨着合作會社與合作牛乳場之後，陸續成立起來。結果，這些貨品的輸出額遂呈激增之勢。同時因採取大規模的生產方法與合作購買，土地所滋生的物品，數量也大增。可是丹麥雖然是一個農業國，自己所生產的食糧卻萬萬不敷自己的消耗，所以每年進口的雜糧，爲數頗有可觀。而且還有一點，我們必須予以注意，即丹麥的農業，是建築在非常集約的墾植方法與家畜的象養二者上面的。

與合作會社的發達同時發生的，是土地的重新分配。這情形，係由一九一九年的土地法促成。如今丹麥已沒有所謂大地產了，土地已給劃成小農場（有許多小農場的面積是意想不到的小）。佃農制度正在迅速銷滅，土地已有百分之九十爲農民所有。丹麥是唯一的引導農民社會實行自

治而獲有成效的國家。這一部分固然是因爲在自動的合作運動下面潛伏對自治原理的深切的了解與認識，但人民教育程度之高，亦爲其重大原因。丹麥的初等教育，自一八一四年以來，即已規定爲人民所必受。但這個國家教育制度的主要特點，是『民衆高等學校』其設立的目的爲使成人受比較高深的教育，雖然受國家的津貼，卻沒有一個不是私辦。這些高等學校，以及農業學校與其他性質的學校，總之，便是丹麥的整個教育制度，實使全世界的教育家感到最大的興味而稱道不置。

丹麥本是一個農業國，所以在工廠中作工的人民，差不多只有四萬。其對外輸出，以畜類產品——牛油、乾酪、醃肉、雞蛋——爲大宗，價值遠過於其他輸出品價值的總和。至於輸入品，主要的是織物、煤（丹麥是沒有煤的）、金屬品、機品，以及前面說過的雜糧。因爲地位的關係，丹麥的航業頗爲發達。

丹麥輸出品之銷往英國者，其數量比銷往其他任何國的數量爲多，原來丹麥的農產品，真像建築在英國市場上面，尤以牛乳與醃肉兩項，每年銷往英國的數量，大可驚人。而此兩項之中，又以

醃肉與英國市場的關係更爲密切，蓋在歐洲，英國是唯一的輸入巨量豬肉製品的國家，除英國外，丹麥大量輸出的醃肉是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市場的。因此之故，丹麥就不能不與英國的領地，尤其是新西蘭，在英國市場中作激烈的競爭。他於一九三一年追隨英國之後，放棄金本位制；而當渥太華協定給與他的輸出品以重大威脅之後，新西蘭爲求自己的貨幣價值與澳大利亞的貨幣價值一律起見，極力將幣價減低，於是丹麥逼得亦步亦趨，舉行克羅內（Krone）的再跌價了。

在從前，丹麥的輸入品大部分來自德國；但一九三三年與英國互訂之通商協定，與斯坎的納維亞其他各國及英國間所訂之通商協定一樣，其目的在增加從英國來的輸入品——特別是煤的數量，故丹麥輸入品的來源，業已發生變動。丹麥假如拒絕英國出口商人的要求，其在英國市場中所居的地位定將蒙受危險，可見丹麥之改變其輸入品的來源，實有不得不然之勢。

一方面，在過去許多年間，小農人的數目續有增加，而另一方面，地主在政府中握着大權，丹麥就這樣的發生嚴重的政治糾紛，致不得不在一九一五年，將憲法加以修改。如現行的憲法所規定，丹麥是個君主立憲國，國王有任命內閣之權，但議和或宣戰等事，則必須取決於議會（Riksdag）。

議會分上下兩院，下院 (Folketing) 人數一百四十九名，由年齡在二十五歲的男女國民，以比例代表制選舉之，上院 (Landsting) 人數七十八名，就中五十六名由下院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上的議員組織選舉之，十九名由一九一五年前的舊上院推舉。假如兩院意見不能一致，而在重選後下院仍固執己意，則得解散上院。凡法令的頒布，必先得國王的允准。在下院中，社會民主黨是最大的政黨，其所代表的階級，為都市勞動者全體，少數農業勞動者，以及更少數的農民。現今的政府，成立於一九二九年，係社會民主黨與急進自由黨所合組。

丹麥是國聯的會員，當一九三三年時，已把軍備全數裁去了。

十一 比利時與荷蘭

在法德兩國之間，沿歐洲大陸北部的海岸綫，互着兩個『低地國』，即比利時與荷蘭，俱以屢遭兵燹出名。原來這一區域，如讀史者所常見到，其南部既係兩大鄰國陸上侵略必由之路，同時沿海岸一帶，又爲西歐幾條極重要的河流的出口。這兩個事實，便是那裏屢次充作戰場的由來。歐洲歷史上的有名的戰爭，有許多是在比利時境內舉行的，如蒲汶（Bouvines）、庫爾特來（Courtrai）、布楞漢（Blenheim）、尼爾溫登（Neerwinden）、滑鐵盧、伊泊爾（Ypres）等戰事都是。又如斯克爾德河（Scheldt）的航行權問題，其對歐洲時局所發生的影響，幾與阿爾薩斯羅蘭問題不相上下。

當中古世代的時候，這兩個低地國是打成一片的，但因宗教戰爭之故，終於劃分爲兩，北部獲得自主，南部卻繼續屬於各大國之下，一直等到十九世紀已着實過了些時候，方纔達到自主的目的。

的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比利時被劃給荷蘭國王管轄者若干時，但拿破崙戰爭後的全部決議，實極不鞏固，荷蘭統治比利時一事，當然沒有例外，所以到一八三〇至三一一年，這個決議卒被推翻，比利時這纔與荷蘭一樣的成爲獨立國家。這兩國人口都非常稠密。經濟發展都有極高的程度，不過比利時注重工業，而荷蘭則比較的注重農業。二國領地都非常狹小，且都處於易受攻擊之地位，所以都沒有資格爲歐洲的強國。還有雖然荷蘭海上帝國黃金時代早已變成歷史上的事情，但兩國至今仍各擁有廣大的殖民地，這也是荷蘭與比利時相似之一點。

比利時

比利時是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以比利時那樣狹小的領土，人口卻有八百萬，平均每方哩須容納六百八十八人之多；然而這種數字反使得實際上的人口密度減色，原來比利時西部諸省，人口比較稀疏，但在布拉奔省（Brabant），人口密度就高至每方哩千三百二十五人，這是足以驚人的。而且這種情形並不是爲的有許多大都市。誠然，布魯塞爾（Brussels）居民有八十五萬，安特

衛普 (Antwerp) 居民約近三十萬；然而除這兩個都市以外，人口在十萬以上之都市，卻一共只有兩個。比利時的驚人的人口密度，並不是大都市而是密集的小都市與村落所造成的。

比利時之爲工業國家，我們只要看過上文，或者已可明白八九。事實上，他是歐洲最古工業國之一。列日 (Liège) 區域的煤，在中古時代的後半期，就已大有名，及至十八世紀末葉，鋼鐵工業也一天天的發達起來；拿破崙 霸歐洲之時，就利用比利時（那時比利時在法國手裏）做他的兵工廠，自此以後，比利時的工業依然像從前樣的向前進展。故在現今，比利時最重要的出品，自然是鋼鐵與煤。可是鋅、鉛、玻璃、織物 四者，也有巨量的出產。此外，比利時又爲鑽石 工業的中心。工業既如此發達，故比利時之不能生產穀自己消耗的食品，實爲不待言的事實。土地有二分之一以上在墾植 中（森林區域居百分之十八），就中百分之四十種雜糧，又百分之四十種畜糧。可是特農業 爲生的人民，總數不到五十萬，與特工商業 爲生者之二百餘萬的總數一相對照，我們就很可以明白農業 在比利時所佔的地位爲何如了。主要的農產品爲馬鈴薯 及甜菜。小麥與裸麥 也有出產，但數量非常之少，故每年必須進口巨量的小麥，及相當數量的大麥 與玉蜀黍，藉補食糧之不足。總之，

比利時的輸出品（大都是製品，尤以鋼爲最重要）是很可與其輸入品兩相抵銷的。他的最重要的主顧是英國，最重要的供給者是法國（註）。

以毫無罪辜之身，而蒙慘酷的待遇，那是比利時在過去期間的經歷。當十六世紀的時候，比利時就與荷蘭一同被收入哈布斯堡王家麥克斯米林帝的版圖，繼受麥克斯米林帝的孫兒，即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統治。比利時各省曾聯合起來反抗腓力，但其與『合衆省』——即現今之荷蘭——的協力，因爲比利時所信奉的是天主教，與荷蘭的加爾文教，兩不相容，因而他們的聯合極不堅固，結果卒歸破裂。自一五八五年安德衛普陷落以後，比利時又受西班牙的控制，其後經過馬爾巴羅（Marlborough）的戰爭，到了一七一三年，纔改受奧大利哈布斯堡王家統治。不論在西班牙的統治下或在奧國的統治下，比利時都曾獲得相當程度的自治，但是將近十八世紀的末葉時，這種自治大受攻擊，故比利時對奧國的反抗，遂與法國革命同時掀起。

這種反抗的結果，是比利時的『解放』。自一七九五年以降，成爲法國的一部分，並具有法國革命後的制度，可是此種情形，仍不能使比利時十分滿意，及至拿破崙失敗，遂改隸荷蘭。一八三〇

年，比利時對荷蘭的反抗成功，戴薩克思、科堡、奧坡爾（Leopold of Sax-Coburg）為國王，於是渴望已久的自主，始得如願以償。比利時這種成功，可說完全得力於英法兩國的友好態度，但其國際上的地位，則直至一八三九年方纔明白確定，歐洲的重要國家，都在倫敦條約中相約以後如遇戰爭不得侵犯比利時的領土。這就是一九一四年被德國作為『廢紙』而撕得粉碎的條約。自大戰以來，比利時始終以尋求另外的方法用來保障國土，為其唯一的目的，其對國際問題與國際事情的態度，都以此為其唯一的方針。

從凡爾賽條約，比利時得到巨大的利益，除人烟繁密的德屬東非的一部分被劃為比利時的委任統治地外，魯安達、烏倫迪（Ruanda-Urundi）亦歸比利時所有，這是德國邊界上的一個小區域，包括馬耳美第（Malmédy）、歐本（Eupen）、摩勒斯納（Moresnet）三地，人口共計六萬四千。像這樣，比利時可還是極不滿於其疆界，尤其是其與荷蘭的疆界。依照他的願望，要奄有南部靈堡（Limburg），甚至全部斯克爾特河南岸，方纔可以滿足，因比利時認為荷蘭在斯克爾特河南岸的主權，可以使荷蘭的海口鹿特丹（Rotterdam）興盛起來，因而妨礙安德衛普的發展。然而這

還算不得重要，更重要的是比利時國內的民族問題。

這並不能稱爲少數民族問題，因爲弗蘭特人 (Flemings) 的勢力雖然不能與法蘭西人種的比利時人相比，但人數卻彼此相等。法蘭西人種的比利時人之佔得盛勢，始於法國革命時代法國佔得比利時之時；整個十九世紀，法語是比利時最佔勢力的語言，重要位置盡爲操法語的比利時人所把持。人種的殊異，一半是由於宗教的殊異，因爲兩方面雖同屬天主教徒，但弗蘭特人卻比較得更爲牢守舊來的天主教的習慣。一半則由於階級的殊異，因爲弗蘭特人大都屬於勞動階級，或所謂『小百姓』。大戰以前，弗蘭特人原很不滿於現狀，故在大戰期中，當比利時政府遷至哈佛爾 (Havre) 之時，一部分弗蘭特人遂戴波爾姆斯博士 (Dr. Borns) 爲領袖（這個團體的名稱叫做『實行旅』）企圖藉德國的援助，建立弗蘭特人的比利時。大戰終止後，此種運動曾暫時消滅，但至一九二八年，又呈死灰重燃之勢，在所謂補缺選舉中，關在獄中的波爾姆斯博士竟獲得無數的票額，於是政府不得不於承認干德大學 (Ghent) 的『弗蘭特化』(Flamandisation) 外，並給與弗蘭特人以許多權利。然而事情依然不能說業已獲得解決。弗蘭特人所組織的政黨即所

謂「前進黨」者，在現今比利時國會的下院中，佔有十一議席，在上院亦佔有五個議席。

比利時是君主國，自一八九三年以後，人民始有選舉權，而弗蘭特人之獲得選舉權，則爲一八九八年的事。婦女得參加地方選舉，但如在大戰中喪失丈夫或兒子者，則得參加下院的選舉。下院四年一選，採取比例代表制，凡人民均不得放棄票權，上院三分之一由四十歲以上的人民選舉，三分之一由各省推舉，還有三分之一，則由上院推出有名望的人充任。從一八八四年至大戰完了之時止，天主教始終最佔勢力，但自此以後，其他的政黨亦漸趨強大。現今比利時的政府，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係自由黨與天主黨的混合政府。比利時的勞工黨，歐洲最溫和的勞工黨之一，是一八八〇至八九這幾年中成立起來的。工團主義很佔勢力。勞動階級的三種運動——工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及合作運動——在比利時有非常密切的相互關係，遠非歐洲除蘇俄外的國家所能及。因此之故，比利時人之在各種「國際」中充當職員者，爲數頗有可觀。

比利時的海外殖民地，即比屬剛果，面積頗爲廣大。當一八八〇至八九年中比利時在那個地方的拓殖手段，曾爲世人所詬病，但其後幾經改良，時至今日，比屬剛果的情形，已可與其他歐洲各

國在熱帶地方的殖民地不相上下了。

荷蘭

荷蘭人口的稠密，雖不能與比利時相比，但可說相差無幾。其人口總數約在八百萬之譜，人口密度平均每方哩六二五·五人。但這個國家的一大部分，水多於陸，只有南部與北部諸省，陸地較多，故人烟亦最繁密，這些省分再加上了西蘭省（Zeeland），便是往昔的荷蘭的主幹。荷蘭的死亡率極低，生殖率極高，所以人口的增加是非常迅驟的。

荷蘭這個國家，因為時受海水的侵入，並因防務有時周密，有時鬆弛，故其土地的面積，尤其是在墾植中的土地的面積，常隨時代而有變遷。譬如在中古時代的時候，海水曾屢次泛濫成災，就有幾次造成了須德海（Zuider Zee）那樣的內海，致荷蘭的陸地大為減少。但在現今，藉興築堤壩，排去海水而獲得的低地，面積已大有可觀。先從海洋手裏奪得土地，然後加以灌溉，使成爲可耕之地，這可說是荷蘭農業的主要特點。世界上最偉大的填築低地的計劃，即化須德海的大部爲耕

地之計劃，興工於一九二四年，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相當的成功。然而荷蘭大部分的土地，至今還是只藉堤壩抵禦海水的侵入，這種堤壩，一如在十六世紀樣，依然可以隨時潰決。故在現今，防海工程依然是荷蘭國脈所繫，較之荷蘭所甚感缺乏的軍事要素，真不知重要到若干倍哩。

荷蘭人民之住在鄉間者，超過全人口的一半。最大的都市是阿姆斯特丹，人口七十五萬；次為鹿特丹及海牙，人口各五十萬。可耕之地佔全部土地百分之二十八，草地與牧場佔百分之四十。森林區甚為稀少。田畝有半數以上被人民自由保有，面積大都很小，但西蘭與格羅寧肯（Gröninge）兩省，卻不乏相當數量的大地產。在墾植中的土地，平均每畝生產額很高。如一般人所知道，畜類產品，尤其是乾酪、牛油、雞蛋三者，是荷蘭農產品的主要項目。但雜糧也有出產，就中尤以裸麥為最重要。又甜菜與馬鈴薯的產量，也十分豐富（馬鈴薯有四分之一係供工業上的用途。）

荷蘭的工業，爲了缺乏充分的煤，發達比較的遲。現在，工業已獲有相當宏大的規模；據一九二〇年的統計，荷蘭有職業的人民共二百七十五萬，就中從事工業者不下一百萬，工業之中，以織物工業爲最重要，其出品的大部分是供輸出用的。製煙業亦頗發達。此外，荷蘭又爲鑽石琢磨業的重

要中心。然而，很顯明的，荷蘭的強大的力量，猶如在往昔一般，並不建築在國內工業上面，而是建築在國外商業上面。荷蘭的航業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曾經坐過世界上第一把交椅，現今地位雖非昔比，卻還是頗佔勢力，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荷蘭商輪的總噸數，居全世界商輪總噸數百分之四。其中尤以與德國的關係為最密切，蓋德國貨品之經過荷蘭口岸而運銷外洋者，數量實足驚人，這便是大戰期中荷蘭經濟制度陷於混亂的由來。總之，荷蘭進出口額之所以能夠兩相抵銷，即謂為全賴航業的發達，亦無不可。輸入品以小麥、煤、及木材為大宗，次為畜糧，如玉蜀黍及亞麻仁等。輸出品以各種畜類產品為最重要，又織物亦有相當數量的輸出。（菜根的輸出額雖係一個有趣味的項目，但價值到底比其他的輸出品為小，故不甚重要）與荷蘭有最大商業往來的是德國，但英國也是荷蘭的乾酪與牛油之極大主顧。

荷蘭之成為國家，時在十六世紀。初由沿海諸省之兇狠的加爾文教徒共戴奧蘭治公威廉為首領，並得英女王依利瑟伯祕密援助，以與西班牙的宗教狂所加的壓力相對抗。卒在一六〇九年，脫離西班牙而獨立。自此以後，不但在歐洲，就是在全世界，荷蘭也是一個重要國家，而且這種情形，

竟差不多繼續至一世紀之久。但是在歐洲大陸上與他國，尤其與法國的路易十四，舉行政治上的鬭爭，這一筆費用實非這個狹小的國家所能勝任。即使在威廉第三接受英國的王位，因而使荷蘭獲得英國的援助以後，荷蘭的財政情形，依然無所改進。故經濟衰落的局面，終於隨着十八世紀而俱來，加以國內政局机舛不安，無暇對外，致許多海外領土，尤其是在美洲與在非洲的，相繼喪失。可是荷蘭還保有在馬來羣島的領土，這是十七世紀的時候，從葡萄牙手中奪來的。此種遺產，便是現今荷蘭在熱帶地方的帝國，即荷屬東印度所由建築起來，其面積爲荷蘭本土的數倍。

和比利時一樣，荷蘭也給捲進了法國革命的鐵蹄下。當一七九二年時，荷蘭逼得開放斯克爾特河的航行權；此後，自一七九五年起至一七九八年止，那裏出現了一個完全模倣法國的共和國，叫做巴達維亞共和國（Batavian Republic），不過如干伯敦（Camperdown）的戰爭（一七九七年）之所示，荷蘭似乎沒有像比利時那樣的易於就範。所以拿破崙戰爭一結束，同盟國就立即恢復荷蘭的舊制，並選威廉一世爲其國王。但未幾比利時宣告離貳，威廉一世竟不得不以十二分的寬宏大量，承認其獨立。自是以後，荷蘭遂閉門自守，對於歐洲大陸的一切政治鬭爭，均謝絕參

與，在大戰中，雖然遭受了許多不便，但終能貫徹其中立態度。

現在荷蘭的憲法，實際上訂立於一八四八年，及至一九一七年改訂以後，始有人民均得參加選舉之規定。議會分上下兩院。下院人數一百，每過四年，全體辭職，舉行重選，其制度爲比例代表制。上院人數五十，由各省選舉，每過六年，提出一半名額，舉行重選。荷蘭的十一省，各有一個議會，每年集會兩次，又有一個政務參議會，參議任期爲終身制，並得享受薪水，此外又有一個由國王任命的政務長官。又每縣亦設有縣參議會，但國王所任命的縣長，賦有管理警察之權，且當認爲必要時，得停止參議會的開會權。

荷蘭並沒有少數民族。信教絕對自由，但宗教上的難題卻在所不免。荷蘭的改革教會，其信徒即係加爾文教徒，系出曾經創立共和國的改革派，在許多人心目中，這無異是荷蘭的國教。然而實際上，天主教徒的人數，與改革教徒固相伯仲，而新教徒的人數，則爲改革教徒之一半。此外又有十萬五千猶太人。無論那一種宗教，都得依照其地位的等級，分沾政府的預算金額。可是這些宗教的存在，卻是各種政治經濟集團雜然並陳的根源。例如荷蘭的工會運動，內部早就陷於分裂，一方

面是基督徒（即天主教）工會，另一方面是其他宗教的工會。至如政黨情形也差不多。荷蘭現在政府，係天主教與右翼黨的聯合政府。自一九二九年登臺以來，迄未發生變動。

（註）

盧森堡公國，有人口三十萬，在大戰前，係德國關稅同盟中的一員。當一九一九年時，他有權就法比兩國中任選一國，與之成立關稅同盟，結果他選定比利時，故在現今，盧森堡與比利時在關稅上猶如一家，無分彼此。工業上，盧森堡的生鐵產量頗為豐富，據一九二九年的統計，共有七百五十萬噸之多，又鋼的產量，每年自兩百萬噸至三百萬噸不等。居民約有三分之一從事農業。

十二 法國

自一七八九年以來，被尊爲革命策源地的法國，不想到了現在，竟一反以前的情形，成爲歐陸諸國中最穩健的國家，自一七八九年起，至一八七一年止，前後八十餘年間，法國的革命活動，極盡推陳出新之致，其所採取的政體，亦幾於無所不包。一七八九年革命後最初數年，法國根據『人權與公民（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的原則，創立民主國家，但閱時不久，這種政體就演化而爲拿破崙的武力專政，形成影響及於整個歐洲大陸的最顯著的革命力量。此後，在一八一五年，有布龐王家的復辟，漸進而爲查理十世時代的更完備的專制政體，結果卒引起一八三〇年的革命。由於這次革命，法國於是以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爲元首，變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像這樣集君主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於一身的政體，到了所謂革命年，即一八四八年，爲急進派的革命所推翻。但是這一次革命的發起者，不論意識與心情，都十分紛歧。猶如一八三二年巴

黎與里昂兩地的社會黨的暴動一樣，欲想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化爲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企圖，轉瞬失敗。民主勢力內部的不穩，使拿破崙三世在一八五一年得以古迭達而建立第二帝國。但拿破崙三世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中，爲普所敗，他的顯赫的帝國驟然崩潰，因此在普軍包圍巴黎之時，法國遂有三次共和的建立。可是事情還沒有這樣簡單，因爲法政府與普軍訂立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以後，回憶往事，不禁怒憤填膺，他們起初爲抵抗普軍的侵入，原存有若干軍火，至是遂利用這批軍火，突起暴動，建立巴黎公社，爲歐洲社會主義政府之嚆矢。可是這個政府閱時數月，就被壓平，犧牲人命之多，較一八三二與一八四八兩年之社會黨暴動，尤有過之。自一八七一年，保王黨與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共戴狄埃爾（Thiers）爲領袖，削平巴黎公社以後，大多數的保王黨爲了皇位缺乏適當的候補人，只好對三次共和予以承認，因此，在當時實很少有人相信法國能永遠自安於民主政治。然而，事情出於意料之外，截至現時爲止，巴黎公社竟爲法國最後一次的革命，而且大戰以後，法國竟比歐洲其他任何國家更不易發生革命。即在現今，縱使社會主義者有一個強大的政黨，共產主義也有不少信徒，但這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其基礎似較歐陸其他各國更爲穩固。

且與英國相較，法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似乎還要差得多。

在歐洲，法國可說是具有最高程度的平衡經濟狀態的國家。他的四千一百五十萬的人口，從事於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動。在其境內，有最現代化的大規模的工業，同時也有零碎到極點的小規模工業。這大大小小的工業合併起來，恰與農業處於均衡的地位。原來法國的全部有業人民，操工商業者約佔百分之五十，操農業者可也幾佔百分之四十之多，這就使得法國的國民經濟，獲得與衆不同的自給。可見法國的平衡經濟的局面，並不是全由人力，大部分還是十分自然的發展過程所致。同時可見法國的工業化，以視其他的西歐強國，即英德兩國，是不免相形見絀。實際上就工業化言，法國僅能勝過意大利與東歐各國，而與捷克及斯坎的維亞諸國相比。像這樣的高程度的平衡經濟狀態，對於法國的社會與政治的生命，實有莫大的影響，因為這種平衡，其意義便是法國的全體民衆，工業團體與農業團體兩面正好保持相等的權利。還有，由於小規模工業的繼續存在，法國的工業者與英德兩國的工業者不同，講話並不能發生巨大的力量。不但工業者與農業者的利益與觀點，彼此互異，就是工業者內部，大規模工業的代表與小規模工業的代表，其利益與觀點也

很不一致。例如冶金工業 (Comité des Forges) 公會，法國大規模工業的最重要的代表，與散佈全國的小規模工業，抱着截然不同的態度。而且法國的城市以靠近鄉村的小市鎮爲多，巨大的工業都市絕少。居民近三百萬的巴黎，是唯一的名副其實的大都市。居其第二位的馬賽，居民就沒有超過六十五萬，居於第三位的里昂，居民高出五十萬無幾。自此以下，波爾多 (Bordeaux) 的二十萬與里爾 (Lille) 的二十萬，更不足道了。所以大部分的都市人民，尙保持着小市鎮居民的特點，何況住在鄉間的人民，實際上要佔到全人口的半數，亦可見法國都市化人民之少了。還有一層，法國大大小小的市鎮，都住有許多所謂小康階級 (rentier)，他們專恃小數目的積蓄過活，其生活程度，遠在英美的中等階級以下。此種小資本家，以其人數的衆多，故影響於法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的組織，實至深且巨。總之，法國這個國家，人民的階級地位，非常複雜，因之所採取的政治與經濟的方針，皆須受這個事實的決定。不論在政治上與在經濟上，法國當決定方針之時，斷乎不能違背下述兩種人民的意旨：其一爲廣大的農民，其二爲恃小規模工商業或小數目的積蓄爲生的小市鎮居民。大工業家在國民經濟中既居於重要地位，當然有其應得的權利，他們也許可於這

種權利以外，提出額外的要求，而如願以償。可是其中到底有一個限度，如果超過這限度，便爲法國的政府所絕對不敢應允。故從現時代的意義說起來，法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色彩，萬萬趕不上英德二國，而其非常穩定的政治制度，也就在這樣是建築在小資產階級對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所抱的保守態度上面。

依賴土地過活的人民中，大部分自己種自己的田，換句話，大部分是有產業的。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替法國的自耕農階級建立了比歐洲其他大國的自耕農階級更穩固的基礎。有產業的農民，其數遠過於賴工資過活的農民，以比例言，假定後者爲三，則前者在五以上。不論在擁有田產者與土地勞動者中間，都有很大數目的女人，推厥原因，半由法國男人在大戰中，死亡甚多，半由法國土地所有權制度，以及法國對女人雖不給與政治上的權利，卻盡量給與經濟上的權利那樁事實所致。如上所述，法國當然是小地產的世界，大地產已很少留存。到了鄉間，只見土地都給劃成很小的田畝，分屬於廣大的農民。土地集中於大地主手裏，農民階級失其存在，這在英國是很普通的情形，但在法國可不如此。農業上的合作，進行得非常積極。且政府所以獎勵之者，無微不至，當一九二〇

年時，政府爲促進農業合作運動起見，曾籌有一筆基金，專備農業借款之用。這筆基金，由九十九個區域農業銀行與五千五百個地方農業銀行，經手出貨。培種方法的標準極高，務使土地能滋生最大的報酬。近幾年中，鄉間的電氣化發達甚速，所以不僅鄉村與小市鎮的工業盡蒙其利，就是農業上的工作，亦因之而愈稱利便。自從藉凡爾賽和約獲得阿爾薩斯羅蘭兩州的豐富的碳酸鉀礦以來，法國的農業，乃益呈蒸蒸日上之勢。

截至世界恐慌的前夜止，法國農業上與工業上的人手，都甚感缺乏。在戰後最初數年中，至不得不從國外輸入大批勞動者，以爲彌補。因此之故，現今法國境內的外籍人民，爲數頗有可觀，計意大利人八十萬以上，比利時人五十萬，西班牙人四十萬以上，波蘭人約三十五萬，瑞士人十四萬，俄國人九萬，至如從北非輸入的勞動者，其數目的巨大，更不難想見。法國勞工的缺乏，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率的緩慢。原來在歐洲，除瑞典以外，法國是生殖率最低的國家，照近幾年來的統計，平均每年每千人約增加十八人，而其死亡率卻平均每年每千人有十七人之多，兩相抵銷之下，幾可說毫無增加。這種情形，便是法國容納大批移民的由來。阿爾薩斯羅蘭兩州的收回，使法國在一九一九

年增加了約一百七十萬的人口；然而即使如此，法國在一九二一年的人口總額，爲了戰時的死亡額過於重大，竟猶趕不上戰前約三千九百萬之數，唯相差究屬有限，所以五年之後，即一九二六年，終於以四零零七十五萬之數，超過一九二一年。再六年之後，即一九三二年，續增至約四千一百五十萬。但自世界恐慌發生，外籍勞動者之被遣回故國者，不在少數，故一九三二年以後，法國的人口總數或已視前退步，亦未可知。因此之故，法國在世界恐慌初期，居然得免於失業人口激增之患，原來他已把無事可作的外籍勞動者，交給他們的祖國去維持了。

自阿爾薩斯羅蘭兩州收回之後，法國獲得了豐富的碳酸鉀礦，已如前面所述。同時，又獲得豐富的鐵礦，豐富的煤，以及許多紡織工廠，就中尤以鐵爲最可寶貴，因爲這就是過去期間，德國大部分鋼鐵工業的根基所在。不但此也，阿羅兩州人煙的繁密，遠勝戰前的法國，故自合併於法國之後，除法國的領土因此增加百分之二·五外，人口也增加百分之四。然而不幸，政治上的問題，也就這樣的掀起來了。因爲法國力謀同化阿羅兩州的政府，不料這種企圖，竟惹起該地大部分居民的反對，因此屢起糾紛，尤以一九二八年的糾紛爲最嚴重，法政府至不得不逮捕許多自治運動的領袖，

加以拘禁。但若撇開政治不講，單從經濟上言，則阿羅兩州的收回，實爲法國大規模工業化的一大幫助，因爲法國從德國手裏取得的鋼鐵工廠與煤礦，本來是依據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組織起來的。故自奄有阿爾薩斯羅蘭以後，法國就驟然進而爲歐洲最重要的鋼鐵生產者之一。記得曾有不少人們，於一九一九年發表預言，說法國整個社會，此後定將很迅速的轉向於大規模的工業化。無如法國的經濟制度，其目的只求工業能夠供給國內市場的需要，奢侈品能供給國外市場的需要，此外並無他求，故對於任何改革，均持反對的態度。說得明白點，法國的工業品之能行銷於世界市場，完全賴有人工精製這一點，而這種貨品的生產，與其在合理化的資本主義組織下，倒還不如在小規模的生產制度下比較容易達到目的，這麼一來，前面的預言，自無應驗之可能了。

農業上，法國所生產的，大部分僅供自己之用，無論那一種重要農業品，都很少剩餘可供輸出。譬如就講酒罷，據多數人的觀念，法國既生產大量的葡萄，酒當然是最重要的輸出品，而事實上則法國每年輸入之酒，其數量十倍於國內所產出。不過這種進口的酒，大部分是取給於自己的生產系統的一部分，即法屬阿爾及耳，而非取給於外國。此外，法國又輸入大量的小麥與玉蜀黍，以及相

當數量的糖。原來法國的小麥與甜菜雖有大規模的生產，——小麥、甜菜、雀麥三者，是法國的主要農業品——但常不够國內的消費，故十年中總有八九年需要進口大量的小麥與糖。照一九三一年的統計，法國最大的輸入品爲煤及熟煤；次爲雜糧，尤以小麥爲大宗；再次爲酒，數值與雜糧相差無幾。至其輸出品，以數值多少的順序排列，爲化學品、鋼鐵、絲織品與棉織品。歸納起來說，法國的輸出品大都是熟貨，輸入品爲某幾種食糧及一種重要原料品，卽煤。

工業上的生產，法國爲了缺乏充分的煤，向來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阿爾薩斯羅蘭兩州的收回，以及對薩爾煤區的處理權，依然不能變更原來的局面。這便是法國成爲英國煤的重要市場的由來。不過近幾年來，德國、波蘭、比利時等國的煤，亦參加法國市場，與英國煤作激烈的競爭，而且曾有一時，法國爲要抵制金鎊的跌價，對英國煤課以特定的稅率，致英國煤益蒙不利。其實，縱使煤的缺乏，可以阻礙法國的工業，尤其是鋼鐵工業的進展，但因水力電的發達，法國在工業上到底沒有感到十分困難。近年以來，法國的電力出品，其總額有飛速的進展，照目下的統計，全部出品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藉水力電製造起來的。法國有許多小工業，從前因爲與里爾及羅蘭產鐵區域附

近的北部大工業區相隔太遠，很不易得到動力的供給，但在現今，這些小工業的進行，已隨着電力的發達而漸趨便利了。

法國最重要的工業，爲化學工業與鋼鐵工業，這兩種工業，便是阿爾薩斯羅蘭兩州的收具有重要意義的原故。自化學工業與鋼鐵工業以降，便要輪到織物工業。法國的絲織品，雖然近年來須與日本的廉價絲織品，以及意德英三國的人造絲織品，作激烈的競爭，致在過去兩三年，輸出額呈極大的傾跌，但在世界市場中，依然不失爲一巨擘。又如棉織品，以慘淡經營的意匠，與精巧華美的形式見稱，故其地位，僅次於絲織品一等。此外，法國又輸出大量的衣服，這又是一種專門講究品質的出品。然而以世界恐慌的到來，這一出品竟比其他任何出品受到更大的打擊，當一九三〇年時，法國輸出的衣服，總值十六億六千二百萬法郎，第二年驟跌至六億九千一百萬法郎。又法國的汽車，其生產量與輸出額俱大有可觀。次於汽車的輸入品，是品質高貴的酒，再次爲肥皂及香料。綜上所述，可知法國依賴於奢侈品的銷路者至深且切，所以最易感受世界恐慌的影響。以法國那樣的國家，竟會比其他重要國家更難掙脫恐慌的深淵，這是出人意外的。推原其故，皆由有幾項最重

要的輸出品銷路一落千丈，因而造成巨額的失業人口所致。不過從大體上說，法國所依賴於世界市場者，到底不及英國或德國那樣密切，故雖失去大部分的市場，其經濟制度還不致陷於怎樣的紊亂，尤其是因為法國在國外有非常豐富的現金來源，以之購買必需的輸入品，綽有餘裕，所以財政也就不致呈捉襟見肘之態。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當世界恐慌的深刻化到達極點之時，法國的失業人口也纔到達真正的高度；然而即使在那時，因為法國的工業規模比較的小，法國的人民比較的可為接近於土地，故其所受到的打擊，也比較的小，使其他的工業國與法國具有同樣的環境，則在世界恐慌中所受到的打擊，定將數倍於法國，這是可以斷言的。原來法國與英德兩國不同，政府並無失業保險制度的設立，救濟失業的事務，俱委諸地方。故當法國的工人無工可做，而回鄉又有所不可能之時，他的處境，較之設有失業保險制度的國家的失業工人，當然要痛苦到萬倍。但是幸運，一九二六年，當災區的復興事業差不多已經完成之時，法政府籌得巨額的款項備建設之用，特別是用於電氣事業，以求國家生產能力的擴展，這種經濟發展的偉大計劃，到了世界恐慌的時期，竟成為阻止法國失業人口急劇增加的堅固的堡壘。固然，在恐慌的漩渦中掙扎多時的法國，

始終不曾有過脫身的日子，且因預算案之漸趨困難，活動資本之漸趨枯竭，致公共事業的經費大感短缺，於是法國要想掙脫恐慌，愈有所不能。不過即使恐慌尖銳到無以復加的今日，法國仍比其他各國具有不易動搖的基礎，這是因為他的財政——雖然不能說公共財政——上的力量，本很堅強，同時，國民經濟又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平衡局面之故。

前面早就說過這種平衡經濟的局面，並非全由人力，大部分還是由於自然。但法國的大政方針，亦以保持平衡經濟為其唯一目標，這是不待言的。凡輸入品之有壓倒國內工業之危險者，法國莫不以高率關稅相餉。同時，他寧可把小麥的價格，擡至世界市價以上，而不願放棄其嚴峻的保護農產品利益的政策。可見我們如果說法國的平衡經濟，由於天然者較由於人力者為多，那並不是說法國的平衡經濟，能脫離國家的扶助而獨自存在，不過說法國的政府，只須以保持現成的平衡局面為其唯一的方針，除此以外的方針，既已推翻於前，他大可不必加以恢復，致貽庸人自擾之譏耳。

法國的關稅制度異於他國的一點，是法國對貨品的來處，鑒別得比他國更為精細。蓋大戰以

還，法國的關稅，並不由國會制定，而是由政府當局與各國分訂通商條約時規訂之。因此之故，法國市場上遂充滿着享受不同稅率的外國貨，同樣一種貨品，從甲國來的課以重稅，但從乙國來的，居然以較輕的稅率通過海關。其實法國並不是沒有普通稅率的規定，在無特訂的通商條例可援時，他就應用普通稅率，可是事實上，這種稅率是只應用於極少數的幾種輸入品的。由上可知要想測量法國稅率的高度，或將法國稅率的高度與其他各國的稅率高度兩兩加以比較，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至於怎樣藉一般的計算法，以明瞭法國稅率的高度，將在本書以後部分述之，茲且從略。

政治與財政

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法國的財政狀態，其經過頗為複雜。大戰時的費用，因賦稅不能有相應的增加，故幾乎全賴借債維持。因在大戰中，法國最重要的工業區域，有一部分陷於敵手，加以大部分的壯丁，都被徵發至軍隊中服務，致國民經濟起了極大的紊亂，在這時候要想增加稅收，確乎是勢有所不能。大戰停止，法國依然恃借債度日，他對美國的債務，大部分是一九一八年以後欠上的。其

實自大戰停止以後，賦稅額是已給提至很高的標準了，不過每增加一次賦稅，就發生一次政治上的紛爭，直至現在，政府還是很不願爲了增稅，招致人民的反感，納稅者方面，也很不願給與徵稅者以爽快的應允。縱使近幾年來，因徵收方法漸趨嚴密的結果，規避捐稅之舉已漸減少，可是作奸犯科者，依然實繁有徒，尤其是所得稅，這是法國的納稅階級所十分不滿而欲想竭力規避的。法國的全部稅收中，間接稅居其大部，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據近幾年的統計，英國的全部稅收，直接稅佔一半以上，假使把遺產稅也計算在內，共佔百分之六十之多，而法國則即據最近的統計，所得稅還是只佔全部稅收約五分之一，各種直接稅（包括遺產稅）併計，亦高出三分之一無幾；至如關稅、國產稅、營業稅三者，共佔全部稅收百分之五十，註冊稅、印花稅，以及其他類此的捐稅，共佔百分之四十。不管近年來稅收有若何之增加，法國的預算仍沒有法子達到平衡。最近達拉迭耶（Darlanier）的政府抱着絕大的勇氣，增加稅額，整頓徵收方法，冀有以挽回預算的頹勢，但依然不見有怎樣效果，因爲法國（一九三三年度）的預算，即使把償還國債的準備金停提一年，也不免呈着極大的支絀。

所以法國的財政狀態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既不能充裕國庫，又不能討好人民，而在另一方面，如金融界的狀況所昭示，國民的財力卻非常充實。法蘭西銀行的金庫，現金存積如山，致存戶放在銀行裏的款項，得不到差強人意的利率。以法國的可供調用的現金之多，而猶謂不能償還對美的債務，誠未免有點近乎荒誕。可是法蘭西銀行以及其他銀行的不活動的現金，並非屬於法國的政府，而是屬於法國的人民，且有一部分是屬於國外存戶，直至現今，政府還想不出法子逼令交出，撥歸國家支配。我們應該知道，縱使法國的財富在表面上是那麼好看，從大體上說，他其實是個貧窮的國家，財富遠遜英國或美國，大部分人民負擔賦稅的能力，也遠在英美兩國的人民之下。就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言，法國的稅額確乎已是異常的高，而政府對於握在少數人民手中的多餘的財富，又未便過問，於此可見法國公共財政的困難，其實並非無故了。

法國公共財政之所以不能獲得穩固的基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九一四年以來，法國的最有勢力的階級，即小資產階級，所經歷的不幸的境遇。大戰停止後最初數年，法郎的價值大跌。固然，較之德國的馬克，法郎的情形的確要好得多。因為在魯爾佔領以前，馬克猶未呈猛烈

的傾跌，而法郎卻始終不會有過像魯爾佔領前的馬克那樣的傾跌；可是已儘量使法國的貨幣價值大減而特減，竟至不到戰前價值的五分之一，因而貨幣的購買力，也呈極大的低落。當一九二六年時，法國的躉售物價，高出戰前七倍以上，就是生活費，也較一九一四年漲到五倍有餘，其後，法郎的價值，總算在一九二六至二十七年的樸蔭凱贊政府下獲得穩定，但也只爲戰前價值的五分之一，這使戰前持有貨幣的人們，財產跌去五分之四。況且即在一九三二年年末，躉售物價依然高出戰前四倍以上，零售物價則高出五倍以上。零售物價所以如此之高，可說全出法國的保護農業政策之賜。

像這樣，法國的人民，包括多數小康者在內，其在戰前的積蓄，已隨着法郎的跌價而付諸東流。於是對於可以造成法郎的再跌的政策，都抱着絕大的疑忌。他們對於以保護工業及農業的利益爲目的之政策，無不欣然予以贊同，即使這種政策可以造成國內物價的高漲，亦所不恤；然而對於可以實現世界物價普遍的提高之任何企圖，卻就不敢放心，以爲這種企圖，定可以使他們的積蓄，價值一再傾跌，至於不可收拾。因此之故，法蘭西銀行與法國歷來的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往往與他

國的意見相左；照他國之意，世界各國如能同時採取通貨膨脹政策，目下的難局定可打開，但法國卻不願參加這種計劃，雖則某種計劃，例如斯脫來沙會議（Stresa Conference）中所決定的，爲救濟陷於困境的農業國起見，將某幾種物品的價格提高，法國居然一變其態度，答應合作。原來斯脫來沙會議中提高小麥價格的議案，僅使小麥的世界價格，漲至與法國國內的小麥價格相差不遠的程度，法國如果予以承認，是不致增加人民的生活負擔的。關於提高物價的整個問題，我們將在以后作詳細的討論，這裏恕不再贅。

自一九一八年起，至一九二六年止，法國吃盡通貨膨脹的苦處，這種經驗，就使法國在事後奉貨幣穩定爲天經地義般的法則，因而對於金本位制信念之堅，爲任何國家所不及。近年以來，法國人民孜孜兀兀地積聚了巨額的現金，且其貪婪的慾望，好像永無饜足之時，他們明知像這樣的存儲巨額不生利的財產，對自己並無好處，但也毫無悔意，推原其故，皆由信仰金本位制一念有以致之。不論在經濟上與在政治上，法國人的希望，常常被他們的恐怖所戰勝，故法國的貨幣政策，永遠受慎重將事一念的支配，這種有點近乎認認過慮的念頭，不但阻止法國與他國協力從事於任何

的世界復興計劃，且又阻止他恢復其出借剩餘資本於國外的企圖。因為一度從蘇聯受到甚深的教訓的法國人，已不願把自己的金錢，投資於國外不甚穩定的地方，致冒收不回來的危險。他們寧可放在國內，縱使在現在的情形下，是幾乎全然不能替他們生利。

前面說過，法國的希望，常被恐怖所戰勝。這種恐怖的觀念，支配大戰以來的法國外交政策至若何程度，將在本書討論歐洲政治問題時加以詳細的分析。以歐洲現下的局面，法國的恐怖，實有其充分的理由。問題只在從這種恐怖觀念出發的政策，是否能化除恐怖的根源，而不致把這些根源，變成更爲真實而迫切。不管法國對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懷着若何恐怖，只要他能於戰後最初數年，協力助成德國的復興，使風雨飄搖的德意志共和國得有穩固的基礎，則在十五年後的今日，歐洲的光明與安定，或能勝於最樂觀的人們口中之所說，亦未可知。無如法國的態度，適與此相反。且現今的法國人，大都以爲他們的態度很對。這種觀念，由我們看來，是根本錯誤的，然而環境如此，也難怪他們抱這樣的態度。

因爲法國雖在一九一四年時，藉英國的幫助，將德軍逐出巴黎近郊，可是直至今日，他們還不

曾忘記那時的教訓。覺得德國軍事上的準備，實非自己所能望其項背。法國人的軍事設備，完全從一戰而捷這個觀念出發，所以事先並不曾儲藏充分的軍火，一旦陷於持久戰，其困難可想而知。自己大部分的領土被敵人佔據了四年的法國，其對自己的力量發生懷疑，對德國懷着絕大的恐懼，是不足為怪的。其實，自從大戰以來，法國也未嘗不抱復興歐洲之想，其與各國通力合作，以求實現此種理想者，已非一次。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魯爾佔領，德國固然不幸，但法國的損失，亦幾乎與德國不相上下，所以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七月的赫里歐 (Herriot) 政府，就替法國開創一個新時代，法德間的關係，日趨和睦。即使一九二五年四月赫里歐的政府解體以後，法國的外交政策，也並無多大的變動。因為以後的幾次政府，主持外交事務的白里安，常以赫里歐的方針為方針，堪稱蕭規曹隨。而且，當樸蔭凱雷於一九二六年起而組閣之時，他已不是一九二三年發動魯爾佔領事件的樸蔭凱雷，因為他的政府，淵源固出自戰後數年的愛國同盟 (Bloc National)，但其成立的原因，則完全由於法國需要一隻鐵腕，來挽救疲憊的財政，並非由於法國將改變其外交方針。這是包羅一切政黨的內閣，赫里歐及其他的急進黨，皆允參加，不但法郎在那時穩定起來，就是修訂了好幾

年而猶毫無頭緒的對美債務問題，也於是時圓滿解決。但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急進黨社會黨會議的結果，命急進黨員退出政府，於是法國的外交方針，突起變化。原來一九二九年及其後數年中，繼樸蔭凱雷起而組閣的人，對於外交方面，又重返於一九二四年前的強烈的反德政策，尤其是白里安退出政界，繼且謝世，法國驟失外交導師，以後總之，一九二九至三二年的法國政府，如泰迪歐（Tardieu）的政府，如賴伐爾（Laval）的政府，無一不使法國走上了反動的途徑。及至一九三二年，這種反動的政府解體，急進黨以得社會黨的贊助，繼起組閣，法國本可重新採取溫和的態度，以應付歐洲的政局，無奈為時已經太晚，德國的國社黨運動，既勢成燎原，不可復遏，而英法兩國同時建立溫和政府共同維持歐洲和平這種希望，又因成立於一九二九年的英國第二次勞工黨內閣做了一九三一年財政恐慌中的犧牲品，成為泡影。原來一九三一年的英國，正像六年前的法國一般，財政問題已把一個左派的政府完全斷送。時至今日，法國的財政困難，與日俱深，加以德國的軍國主義，又有死灰重燃之勢，一九三三年達拉迭耶的急進黨政府，是否可在這兩重壓迫之下站得住呢？這是誰也不敢保險，而有待於日後的事實來證明了。

然而縱使法國有採取軍國主義以反抗敵國的軍國主義之危險，照目下的情形，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似尙不致如德國或意大利的民族主義那樣蒙上了侵略的面貌。因爲自從收回阿爾薩斯羅蘭兩州之後，法國已無其他的野心：法國的軍國主義，尤其量僅限於防守方面，是恐怖觀念的產物，並不是好大喜功的觀念的產物。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法國只願閉關自守，不願參加任何國際活動。他們自視爲歐洲文化最高的民族——說句公平話，法國人儘有權利這樣自許——只想在安定的局面下，開墾自己的土地，發展自己的社會生活，此外並無他求。經濟上，法國人很易變成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以法國自耕農與小工業者人數之衆多，贊成維持現狀的中等階級的勢力之大，當然有這種情形。可是這種強烈的個人主義，在社會生活上，尙能與深固的家庭觀念相調和；原來在法國，家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即說法國人的生活與思想全以家庭爲本位，亦不爲過。又法國的婦女，對於要求政權那樣的事情，從來不感若何的興味，這或者是因爲她們的社會權利，已到很高的程度，故而如此。總之，法國的文化，其固有的特點殊難以磨滅，不論家庭生活與農工業制度，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傳統的慣例，這種慣例不但使社會主義無從擡頭，並使法西斯運動或任何

反對議會政治的運動，也失其興起的可能。至如關於商業，法國是個採取保護貿易政策的國家，可是他的稅率，不過用以促成國內政策，使法國不論在社會上與經濟上，都合於自由放任制度，以與路易十四治下的舊制度恰相反對，此外，使無多大的意義了。

十二 西班牙與葡萄牙

擁有十九萬方哩以上的土地的西班牙，從領土上言，爲歐洲第三大國，其面積較法國稍遜，較戰後的德國爲大。但是他的人口，卻瞠乎西歐其他大國之後，因爲他只有二千三百萬至二千四百萬的人民，與法國的四千餘萬及德國的六千七百萬相比，較前者幾少一倍，較後者幾少兩倍。西班牙的工業，以及農業生產方法，都很不發達，其一部分的原因即由於人口的稀少。不過國家的本身，也與有密切的關係。原來西班牙境內，高原居其大部，雨水十分缺乏；且靠近海岸與主要河流的大部分人煙繁密的區域，因有山嶺阻隔其間，交通非常不便，結果不但各區域間的感情彼此隔闕，就是經濟發展上，也有不能聯絡之苦。加以大部分地方缺乏充分的鐵道綫，大部分的土地，假如不先打巨量的本錢，就不適於耕種，故西班牙農工業之落後，是不足怪的。其實，只要能够推行灌溉與其他的農事改進方法，西班牙雖然缺乏充分的沃土，也未嘗不可以養活數倍於現今的人口。

無如在過去期間，這個國家的政體以及土地租借制度，無一不足以阻礙經濟上的發展。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的革命爲止，土地幾全爲大地主所有，即在現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仍不在少數，這些大地主從來不想法子去改進墾種方法。而廣大的農民，又不識不知，過着卑下的生活，全然沒有機會明瞭如何改進農事。西班牙歷來的政府未嘗不從事於改良教育，並化費巨額的款項於土地使用方法的改進，可是在一九三一年革命以前，竟毫無成就，既不能使農民較前開通，且又不能幫助農民增進其生活。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社會黨與資產階級合組的革命政府曾竭力以推廣教育，並開始實行農業改進計劃。可是這些改進事業至今尙未有若何的成效，因爲縱使各地方已增設了許多學校，且在幾個區域，土地的重分配與改進，業已認真着手實行，然而要想藉這種政策產生確實的效果，斷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目的。何況這個共和國所欲據以解決土地問題的土地法，直到一九三二年九月方始頒布，確實土地的重分配，幾至今日方纔開始實行，大部分的區域猶毫無頭緒呢？

同時，以世界恐慌的到來，西班牙的農民，一如其他各國的農民一般，大受打擊。因爲西班牙的

輸出品大抵爲農產品，價格早已一落千丈，加以他的貨幣極不穩定，這使農民當向國外購買工業品時，蒙受絕大的損失。總之今日的西班牙，即在較好的環境下，也是一個極貧的國家，何況加以世界恐慌，無怪他的貧苦，日甚一日，政府鞏固新創的共和國的企圖，也困難重重，不易實現了。

前面說過，西班牙境內，缺乏雨水的高原居其大部。其實西班牙這個國家，除極小一部分外，可說全係高原構成，而且高原的高度非比尋常，致有幾處突起而爲峻峭的山嶺。都城馬德里（Madrid），居一大高原的中心，以瓜達拉馬山脈（Sierra da Guadarrama）與北境相隔離。伊比利半島上比較膏腴的低地，大部分在葡萄牙南境。至若西班牙膏腴之地就很少，比較過得去的，在南部有自林拿勒斯（Linares）起至塞維爾（Seville）與聖盧卡（Sanlucar）止之瓜達爾幾維河（Guadalquivir）流域，在西北部有厄波羅河（Ebro）流域，此外，從北方的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到南方的木爾西亞（Murcia）沿海岸一帶（範圍甚爲狹小），以及加里西亞（Galicia）的極西北一帶，地勢均比較的低，土地亦比較的肥沃。然而上面所舉的低地，大部分仍缺乏充分的雨水。原來伊比利亞半島可分作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濕潤區域，包括葡

葡萄牙全部以及西班牙的加里西亞與範圍甚爲狹小的北部一帶，還有部分是面積比較遼闊的乾燥區域，包括西班牙的中部與南部。唯西班牙人煙稠密之處所，第一爲首都馬德里地，第二爲南部與沿東部海岸一帶，其他的區域，除厄波羅河上的薩拉哥撒（Saragossa）與北部海岸的畢爾巴鄂（Bilbao）以外，就很少繁盛的都市。

總之，西班牙原是個農業國，大部分的土地，培種方法非常窳劣，除東南兩部比較肥沃的區域外，絕未施行科學化的農業生產方法。即是雜糧，如小麥與大麥，有巨量的出產，但也毫無剩餘可供輸出。不僅如此，西班牙每年還得輸入大批玉蜀黍，以補國內食糧之不足。其有剩餘可供輸出的農產品，爲酒、橄欖油、水菓三者，這也就是他所賴以換得自己所甚感缺乏的工業品的事物。除此以外，他又輸出大批原料品，尤其是鉛、銅，以及高等的生鐵。在西班牙，過磷酸鹽的產量尙稱豐富，所以如果想藉化學肥料增進農業生產標準，自己的原料儘殼應用，不必取給外國。西班牙又生產相當數量的鋼鐵與大量的水門汀。但此外所輸出的製造品中，最重要的得推棉織品。生絲雖有產出，絲織工業卻至今尙未發達。說起輸入品，最大的是煤，幾全部取給於國外，又機器、汽車、電料器具，以及其

他金屬工業產品，亦以取給於國外者爲多。近年以來，西班牙雖不免有小數目的不利的貿易差額，幸從未到過若何嚴重的數字。又近年來西班牙所舉借的外債，亦絕鮮巨大的數目。但其各種礦產，現正由外人所創辦的公司經手開採，像這樣的將自然富源的所有權送給外人，再加以缺乏充分的煤，西班牙的工業，宜乎無振興的希望了。

在一定期間內，西班牙當然脫不掉農業國的本質，因此西班牙共和政府目前唯一要務，當然是農業生產方法的改進，尤以中部的土地，向來握在大地主手中，從未經過開發，改進事業實刻不容緩。要是能够像比較肥沃的區域那樣，土地的分配，比較的平均，培種方法也比較的進步，或者再好一點，能够像南部那樣，橘子與檸檬等有大量的出產，葡萄園與橄欖園有大規模的樹立，那末西班牙的國計民生，定可較今日爲優裕了。

如前面所說，以西班牙自然富源的欠缺，農民本已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土地制度則使這種固有的不利加深一層。如一九二八年西班牙農業情況報告中所載，普通人民所保有的地產，不到十公頃者居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貴族有以一身而擁九萬五千公頃者；十萬大地主所擁有的地

產，合計不下十二萬畝之多，但是中等的地主，卻就只能以一百二十五萬的人數，分潤六萬畝的地產。大地主對於培種方法，大都漫不經意，而農民又只好依賴大地主爲生。革命以前，一部分農民的勞力，只換得一飽，比較好一點的，也只換得三披索(Peseta)一天的報酬。在過去期間，大地主對於任何土地改革，都竭力反對，即在現今，大部分的大地主猶持此種態度；所以很明白的，只有對土地問題能爲果敢的處置，新創的共和國始有穩固之望。然而革命以後，政府遲遲不即表示態度，因而政府是否有勇氣與反對大規模土地改革的大地主相周旋那樣的問題，有不少時候竟成了無法解答的謎。一直等到柴摩拉 (Zamora) 的政府解體，亞撒那 (Azaña) 的政府成立，社會黨在政府中的勢力，較前強大，於是真正的土地改革，始露端倪。(一九三二年的) 西班牙政府，曾以毅然決然的態度處置土地問題，這無疑的是一九三三年最初數月中反對黨猛力攻擊社會黨的一個主要原因，蓋反對黨之意，欲肅清政府中的社會黨，改建純粹由共和黨主持的政府，俾土地的所有權獲有更穩固的保障。

以上所說的困難，正如共和政體的西班牙的其他許多困難一般，推厥由來，真可說非一朝一

夕之故了。西班牙的天然形勢，如完整的流域，被山脈切成數塊，一個個的高原，蟲起於境內四處，這些都使西班牙只宜於分裂，不宜於統一。因此之故，回教徒所建立的王國，閱時不久，即告崩潰，而當回教徒初被逐出之時，代起的基督教王國，都是些零碎小國。直到十五世紀末葉，阿拉貢(Aragon)與加斯底耳兩王國，在斐迭南與伊瑟倍拉之下併而爲一，於是始替西班牙創立一個力能統一全國的王國。這個局面，如一般人所熟知，便是西班牙史上黃金時代的序幕。然而不管西班牙本部，已被陸續發見，不管那裏蘊有豐富的寶藏，貧困兀自隨着黃金時代而俱至；十六世紀西班牙顯赫的貴族，一如今日西班牙的殘餘貴族，只知以坐收貢禮爲事，對於自己或農民的地產，從不想法子增進其生產能力；而可以實現繁榮的製造業，也以貴族不願沾污他的兩手，以及宗教狂將克苦耐勞的猶太人與摩爾人統統逐出境外。這兩種原因，失掉發展的機會。十七世紀的西班牙，是歐洲最貧苦最無秩序的國家之一。國內常常發生飢荒，以致外來遊客，也找不到寄身之處，與果腹之物。十八世紀的改革計劃，曾不能使西班牙的狀況有若何進步。其後，當一八三三年時，西班牙的革命，居然打破歐洲各國的扼制而獲得成功，這纔有一個比較自由的制度，但以教會權力之大，王位爭奪之

烈，他的政治地位，依然停滯在極低的水準，毫無長進。

一九三一年革命以前，西班牙在武人統治下者，前後共八年之久，此種武人專政制度，係導源於一九二三年保王黨維拉將軍（General Primo de Rivera）的古迭達。其實，即使在武人專政時代以前，西班牙形式上雖係立憲政體的國家，實際上仍與君主專制國相差無幾。亞爾豐十三世（Alfonso XIII）自從獲得了大多數的議員，掌握全部政權以後，即明白表示其對立憲政體的憎惡，以及將政府建築在教會與軍隊上面的決心。政客猶如走馬燈上的人物，來而復往，往而又來，保守黨與所謂自由黨，輪番奉命組閣。原來西班牙一如其他的國家，並不缺乏政黨，無論那一個政客，都有其鮮明的黨徽。但是事實上，這些政黨的力量都十分薄弱，組織也十分散漫，每一政黨內部，小黨紛立，各戴領袖，互相傾軋，且以國王權力之大，軍隊與教會聲勢之盛，政黨懾息其下，在處理政務時，權限實小到可憐。西班牙的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在十九世紀的後半，就已經在都市勞動者中間佔着甚大的勢力，尤其是在加泰隆尼亞；及至一九〇〇年以後，少數農村區域，尤其是比較肥沃的南部，也漸漸沾染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的思想。西班牙的社會主義，在最初的時候，即已對

無政府主義表示強烈的傾向，即西班牙的工團主義與工會主義，其態度與方針，也始終與無政府主義爲近，而不與社會主義爲近。原來西班牙的勞動階級運動，地方觀念很深，故當舉行局部罷工之時，往往能發生極大的力量，但如舉行全國總罷工，其力量就比較脆弱。這種地方觀念，是西班牙的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之無政府主義化所造成，同時也可說所由造成。

十九世紀的西班牙政治史，可說是一部軍人跋扈史。只要軍隊與教會能够聯合起來，很易隨意所欲地幹去，而不受任何憲法的束縛。無如事實上，彼此並不能一致，教會反對民主政治甚力，軍隊則屢次對民主政治加以迴護。在里維拉的古迭達以前，即十九世紀之時，西班牙就已經一再發生將軍發表宣言抓取政權之事，有時候，這些將軍的目的固在推翻在實施中的憲法——其實此種憲法，只有自由之名，並無自由之實——唯以創立比較自由的政治制度爲其目的者，亦往往而有。不過，不管這些將軍原來的政治主張怎樣，他們實都只想利用在位的時機，建立某種形式的個人獨裁，並非對政治學說有真正的信仰。像這樣的抱有野心的將軍，此起彼倒，此倒彼起，無有已時，於是西班牙的政治組織，遂陷於絕不穩定之中。在里維拉古迭達以前，數年之中，軍人發表宣言之

風稍戢。但這意義並不是軍隊業已停止干政。西班牙既養着大批軍隊，軍官遂得以因緣時機，組織武人議會，把持財政，決定政府文官的俸祿，並嗾使政府弁髦實施中的憲法。國王當然與軍隊一鼻孔出氣，他無時不在利用軍隊與教會二者，為破壞憲法及建立專制政權的工具；就因為欲維持國王的尊嚴，並欲使國王的威權遍及國內，巴塞羅納（Barcelona）總督里維拉遂於一九二三年舉兵推翻政府，另組武人政府。

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九年，里維拉繼續執掌西班牙的政權。起初，他的政府澈頭澈尾是個武人政府；但其後物議漸多，里維拉認為有減少武人政治色彩的必要，遂於一九二五年恢復文人內閣，雖則事實上，閣員全由里氏任命，因而內閣凡有措施，都須稟命里氏而後行。到了一九二七年，里氏作進一步的改革，俾政府的面貌較前更近於立憲政體。不過對於業已取消的憲法的保證，則到底不會加以恢復，換言之，他不會召集任何形式的議會。直至他的專政時代將近沒落之時，他纔召集一個類似議會的組織，議員並非出於民選，而是出於政府任命，所以絕對不上代表民意的機關。迷信專制手段的里維拉，好像並沒有使自己變成永久的獨裁者的意思，他只想在國王、軍隊、教

會三者的地位獲得穩固的保障以後，就施行比較寬大的政治。無如他所給與民衆的允許，如採取議會政治的原則以及建立文人政府之類，都是有名無實，萬萬不能滿民衆之望，加以經濟上的難題，例如國幣價值的猛跌，他又無法應付，故其地位卒漸漸動搖起來。而且，他的手段不論怎樣嚴辣，在國王眼中，猶失之太溫和。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當他不孚衆望的現象變成十分顯著的時候，國王就要求他辭職，而代以另一位軍事領袖——貝倫革將軍（General Berenguer）。

同時，民間不滿的空氣，一天天的增劇，一天天的化爲革命行動。在勞動階級方面，罷工時有發生，大都是局部的，壽命也不長久，但已使政府疲於奔命。可惜那時的革命勢力，內部非常渙散，推厥原因，一半固然由於工團黨與社會黨、急進黨與農民黨、保守黨的失意分子與其他的議會小組政黨之間，都沒有採取同一步調的可能，一半却由於各種革命勢力對於國家的政治系統，意見彼此互異：一派主張建設統一的西班牙共和國，以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全國，一派主張將國家分爲若干獨立國家，至少亦應分爲若干自治區域，然後由這些自治區域聯合而爲組織不甚嚴密的聯邦。

後面這種主張，大抵出自贊助加泰隆尼亞的獨立的人們。原來加泰隆尼亞這個區域，不但語言與其他區域迥異，就是文化與外形，也有幾分與西班牙其他地方不同，所以早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那裏的民族主義者，其主要的羣衆爲中等階級及農民，與巴塞羅納的勞動階級領袖勢不兩立，因爲後者是以建立統一的西班牙共和國爲其目標。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的中間，民衆對於貝倫革將軍的專政，已至忍無可忍的時期，於是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者到底聯合其他急進的革命團體，甚至一部分的保守黨，採取一致的行動。碰着這種堅有力的同盟，武人專政制度的死亡，自在意料之中。可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寇脫里文托斯 (Crabri Ventos) 飛機場的暴動，猶不免爲政府所壓平，共和黨領袖幾全數被逮下獄。自經此變，政府知民意之未可輕侮，允以一九三一年的三月爲選舉期，欲將國家二次置於半立憲的基礎上，藉以緩和民氣。然而自由、社會、共和等政黨，知道在這樣的狀態下，選舉只是一種滑稽劇，結果還是聲名狼藉的老官僚當權，因此明白表示態度，說即使選舉如期舉行，他們也將極力加以抵制。

因了這種威嚇，亞爾豐瑣逼得於一九三一年二月恢復憲法的保證，接着自由黨受他的勸導，

撤消抵制選舉的文告。但是自由黨的領袖羅曼諾斯子爵（Count Romanones）有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者爲其後援，聲言將要求政府召集國民議會，制定新憲法。這種聲言到了政府耳中，政府一怒而取消選舉，同時內閣因無法維持下去，提出總辭職。當此之時，國王猶極力掙扎，冀成立一能保持專政制度的新政府，唯人選不能不略加變化，結果遂由一位海軍上將，名叫阿塞那（Aznar）的，繼貝倫革將軍組閣。但這個內閣登台不滿兩月，卽行解體，這是因爲一九三一年四月的市區選舉，共和黨獲得絕大勝利之故。由於共和黨的獲勝，自一九二三年以來的專政制度，卒歸消滅，西班牙共和國於四月十四日宣告成立。亞爾豐瑣狼狽出國，同時卻發表宣言，拒絕遜位，換言之，他並不承認放棄西班牙國王的權利。然而西班牙並不理睬他的宣言，管自在柴摩拉主持下成立臨時政府，並立即召集國民議會。

這次革命並不會流一點血。因爲無論何處，不等革命的爆發，專政的主幹人員就已自行潰散。軍隊已非復從前武人專政制度下的面貌，其蹣跚不安的狀態，至爲顯著。向來被視爲鄉區的霸王，無人敢攖其鋒之教會，一到共和國成立的當兒，頓然失去勢力。教會首領至不得不逃到羅馬，託庇

於教王未幾，教王命他回國。但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對於西班牙的有限的財富，向來抱着誅求無厭的態度，弄得聲名狼籍，天人共憤，碰到以反教會爲號召的革命黨人，其弱點愈形顯著，自難恢復其原來的勢力了。

議會成立不久，即着手起草憲法。當時的政府，係治各種政黨於一爐，從社會黨以至離棄國教的保守黨，應有盡有，這些政黨對於新西班牙應建築在何種基礎之上，並無一致的意見，因此政府遂把起草憲法一事，委諸一個非政治性質的專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草就所謂憲法大綱，交與政府，政府並不參加任何意見，以之交與議會，議會又以之交與一個合各種革命政黨的代表而成為委員會，命其根據大綱，起草憲法，爲西班牙正式憲法的基礎。這個委員會既合各種政黨的代表而成，故社會黨亦得列席，但人數奇少，無左右委員會之能力，結果西班牙共和國的組織，遂與資產階級共和國如法國那樣的組織爲近，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組織，迥不相侔。然而西班牙的憲法當制定之時，曾博採各種憲法之長，故與尋常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憲法，究屬不同。第一，這較普通共和國憲法更爲注重於世界主義，第二，關於國民的權利義務的規定，其確切與嚴格，亦非普通共和國憲法

所可及。西班牙憲法所以能包含這些條款，顯然是由於社會黨的力爭。無如西班牙的社會黨，與一般的社會民主黨所見略同，他們以為社會主義的建立，必先經過資產階級的代議政治，故如能使西班牙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體，既非他們所願，亦非他們所能獲得。他們所獲得的，只為新憲法必須合於進步的代議民主政治這一點。蓋西班牙的議會，係採取一院制，議員全由人民公選，不論男女，俱有選舉權，在拉丁民族的國家中，對婦女給與選舉權的，要算西班牙是最早的了。

新憲法通過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可是在此以前，革命政府中的各黨派，即已發生裂痕。為富不仁的西班牙僧侶，原為革命黨人所深惡，共和國成立以來，社會黨聯合其他政黨中比較急進的分子，堅決主張驅逐耶穌會教士，並沒收其財產。這種主張，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在議會中獲得通過。但政府卻不以此舉為然，政府領袖柴摩拉與贊助革命的保守黨的領袖卯拉（Maura），反對尤力，於是第一次革命政府全體辭職，由亞撒那組織新政府，以為之繼。在亞撒那的政府中，社會黨勢力略強於前，但依然居於少數的地位。然而像這樣的革命勢力的破裂，只是暫時的情形；新憲法實施後不久，議會就公舉柴摩拉為大總統，因此革命勢力的內部的一致，又復確立起來。至曾繼柴摩

拉執政的亞撒那，則被任以組閣事宜，這是新憲法實施後的第一次內閣。

然而憲法雖已見諸實施，關於鞏固政府之事務，卻諸待處理。例如當十一月時，議會判決廢王亞爾豐瑣犯了危害國家的罪名，將他巨大的財產加以沒收，這宗財產加上了奪自耶穌會的財產，便是土地分配的經費之主要來源。可是政府還沒有着手於澈底的土地改革，他的面前就展開了一個需要迅速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加泰隆尼亞問題。原來加泰隆尼亞人在革命初發動時，即已堅決要求澈底的自治，並百般恫嚇，謂要求如不蒙見允，即脫離西班牙而獨立。所謂澈底的自治，當然非憲法所能認可，因為如憲法所規定，西班牙必須是一個統一國家，中央政府在處理通盤的事務時，賦有絕大的權力；不僅外交、商務、軍事、財政等由中央政府處理，就是勞工、教育、公益等問題之立法權，也屬諸中央政府。但為緩和加泰隆尼亞人的反對起見，憲法中規定議會須於憲法實施之後，立即制定若干條例，給與各省以相當程度的自治權。這就是說，各省與中央政府一樣的有立法權，並得施行特別法令，藉以適應其特別需要。而當雙方商妥之時，更可從中央政府接收某幾種業務的管理權。不過同時卻又規定聯省自治的條例，必須經過議會的認可或批駁，且不得收入憲法，因

爲一經訂入憲法，就成爲絕對有效，無法修改。對於這種折衷的辦法，加泰隆尼亞的極端的民族主義者還想給以一個不睬，無如加泰隆尼亞人大多數都贊成接受，尤其是勞動者，他們對於可以削弱西班牙革命勢力的統一之任何政策，都加反對，因此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的主張，終歸失敗，擾攘一時的加泰隆尼亞問題，就這樣的輕輕解決了。

自從解決了加泰隆尼亞問題，西班牙的政府與議會宛如釋去一擔重負，對於亟待進行的經濟改革，已可放手做去，不致像從前樣的瞻前顧後了。頒布於一九三二年九月的土地法，使預備分配給農民的土地，較前增加不少，這種土地原來或爲貴族的地產，此時由政府以無賠償的辦法逕行奪取，或爲與桑吉羅將軍（General Sanjurjo）的八月事變有關的保王黨的地產，此時由政府下令沒收。這是特別情形。此外，政府得根據土地法收買下列數種土地：一爲荒廢或培種方法不善者，二爲需要特殊的灌溉方法者，三爲在都市附近而未經業主培種者，四爲超過規定的面積者。最後一種，視土地所在的區域而異，規定的面積爲一百公頃至六百公頃，總之以當地的情形及土地的收益爲依歸。上列的土地，雖說由政府出價收買，但政府所出的價卻有一定的限度。在從前的時

候，地主爲了必須對政府納稅，曾將產業的價值陳報官廳；現在，政府就把這種價值作爲收買土地時的最高價格，這使政府佔了極大的便宜。因爲從前舉行陳報之時，地主爲要少一點捐稅，大概都不將產業的價值估得過高。

政府既以這種手段買進土地，然後以之分配於貧苦的農民，其所據以爲分配的標準，或爲個人，或爲合大羣的農民而成之「辛地開脫」(syndicata) 或會社。農民的合作運動，當革命前，就已在社會黨及比較急進的天主教徒指導之下，發達至相當程度；革命以後，社會主義者的農業部長又標榜農業集團化的政策，竭力將經過再分配的土地，置於集團管理之下，以免落於個人的掌握，希望藉這種有效的手段，來提高培種方法的標準，增進農民的政治教育。但是土地分配的事業，此刻還在發軔期中，且業已分配的土地，到底根據何種方法分配，至今尙無明白的報告公佈，故前面說過的農業部長的希望將來究能實現至若何程度，正未可逆料。

同時又有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部長，名叫里奧斯 (de los Rios) 的，用了極大的努力，從事於西班牙教育制度的改進。西班牙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初等教育，向來是十二分的不健全，且幾乎全

然受教會勢力的支配，奄奄無一點生氣。至於西班牙的高等教育，因得創始於一九〇七年的保護學術委員會的指導，曾獲有相當程度的發達，有幾個大學，甚至博得極高的榮譽，不過因學生屢次參加革命運動，累得里維拉手忙腳亂，忽而勒令停閉，忽而准予重開，致業務的進行大受妨礙，斯爲美中不足耳。但高等教育雖有可觀的西班牙，對於小學教育，竟毫無設施。在全體人民中，不識字者佔着絕高的百分率，從前如此，現在也未嘗不如此，說一句不客氣的話，西班牙是不配做歐洲國家的。社會黨在大戰前，就已致力於教育的改革，尤以在一九〇九年的巴塞羅納暴動中被官廳所加害之無政府黨領袖斐勒（Ferrer），鼓吹最力。社會黨、工團黨、無政府黨，都分頭努力於教育運動，無如這些運動不很能夠與全體民衆相接觸，加以必須時受教會所主使的迫害，故始終不會收宏大的效果。自一九三一年來，政府曾化費巨量的金錢，創辦新的學校，欲藉普及排宗教的小學教育，來打倒教會的勢力。但是這種企圖，恐亦非短期間內所可成就，因爲西班牙不但國庫如洗，教育經費難籌而已，就是振興教育所必需的師資，也甚感缺乏，欲挽斯弊，唯有多設師範學校或其他類此的機關耳。

這樣，西班牙政府中的社會黨，因背後還有急進黨中最急進的分子爲其後援，終於在教育及農業兩方面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且由社會黨的主持，西班牙的勞工法與工廠檢查法，亦粗具規模。可是這些政策，漸漸引起共和黨——即在議會中佔得多數議席的政黨——中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反對。舊時的保王黨，確已隨着一九三一年革命的爆發而完全消滅，但是去了保王黨，卻來了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代表工業家與中間階級的比較保守的分子，以勒魯(Lerroux)領導下的急進黨爲集合點，對社會黨施以猛烈的攻擊。曾有一個時期，勒魯的信徒以全體右派政黨爲後盾，堅決要求社會黨退出政府，俾可建立純粹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政府。一九三三年四月杪，西班牙全國舉行鄉區地方官的總選舉，結果，社會黨與急進黨雖然在這些落後的區域獲得了立足點，開前此所未有的創舉，但反對黨之當選者，其數究非社會黨與急進黨所能望其項背。縱使這些地方官並不能代表革命的主要動力所在的都市，此次選舉的結果卻使要求改組政府者振振有辭，因爲作此種要求者只須說一聲我們需要一個能代表全國公意的內閣就是了。

對於這個要求，內閣總理亞撒那提議從雙方互讓取得解決。他說，自此以後，政府爲實施議會

所通過的政策而頒布的法令，最重要者如土地法、教育改革方案、以及關於社會的法令等，他均將加以制限。至反對黨方面，則須放棄其以前的妨礙議會事務進行的戰略，俾政府得完成亟需實現的計劃。同時政府給與反對黨以一種言外的允諾，謂願於完成亟需實現的計劃以後，將政權交出，由能够代表真正的政治上的公見——不論其爲何種性質——之政治團體，主持國是。然而這種提議，卻立即遭反對黨的拒絕，蓋反對黨爲欲使政府窮於應付，決定繼續採取妨礙議會事務進行的策略，故對於亞撒那的提議當然不願加以理睬。一九三三年夏季，在反對天主教會的法令通過後不久，本爲虔誠的天主教徒的柴摩拉，因簽字於這個法令之故，被教會開除教籍，他於是罷黜亞撒那的內閣，欲以包含反對黨的新內閣爲之代。但是這種企圖終歸失敗，西班牙的大總統逼得將亞撒那請回，組織與舊政府毫無兩樣的新政府。所以現今的西班牙內閣，依然有社會黨參加，不過基礎實非常不穩；以資產階級政黨仇視現政府之烈，那個聯合內閣究能再維持若干時日，這是很難逆料的。

對現政府加以仇視，不僅全體右派黨政爲然，就是社會黨內部，也儘有少數分子，以爲社會黨

爲了要參加政府而採取妥協政策，是損害社會主義的真理，故亦猛烈反對政府。上次社會黨大會，參加政府的社會黨戰勝了反對派，固然不費若何氣力，但反對派之在黨內漸漸獲勢力，究爲不可掩的事實。社會黨的幹部，認爲欲鞏固共和國的基礎，並欲將早已通過於議會的政策，如憲法的實施，教會與土地兩大問題的處置等，以最有效的方法促其實現，社會黨均有參加政府的必要。然而一部分黨員，則謂憲法既已在實施之中，關於教會與土地的大政方針，又已明白訂定，是社會黨的第一步目的已達，此後的社會黨，應自列於反對黨，不應降心低首，繼續忠於帶有幾分資產階級色彩的政府，而猶沾沾自得。

社會黨員之力主脫離政府者，還有一個理由：社會黨繼續參加政府，實使其對勞動者的宣傳，大受阻礙，驅勞動者漸漸傾向於無政府黨及工團黨，而不復傾向於己，無政府黨及工團黨在最初的時候，就已把新創的中央集權制的共和國，看作連暫時滿足革命的要求也有所不能的政府，他們絕對不贊成中央集權制的政府；他們希望以全國的勞動者農民聯合委員會及聯合議會爲基礎，設立地方分治的制度。這些勞動者農民聯合委員會及聯合議會，與社會黨的工會，猶如冰炭之

兩不相容，一九三二年西班牙的幾次罷工，都出自他們的主動。對於這種含有政治意味的罷工，居於政府黨地位的社會黨既負有維持治安的全責，自不能不力加壓迫，這使他們喪失不少信譽。據社會黨左翼分子的觀念，此種狀態如果再延續若干時日，西班牙的大部分勞動者定將停止其對社會黨及社會黨工會的援助，改與無政府黨及工團黨發生關係，結果唯有坐視只想把西班牙造成如法國那樣的國家，而不欲奉社會主義制度為新創的西班牙共和國的模範之資產階級政黨，來主持西班牙的革命運動了。

原來西班牙的無政府黨與工團黨，雖然力足以為反對黨，但要想將革命的領導權收歸掌握，則力量似乎不足一點。它們不贊成中央集權制及強有力的政府，所以最缺乏一致行動的精神；他們只知把力量消耗於斷續的地方運動，這些運動各自為謀，彼此絕少聯絡，欲望其有普遍的成功，誠然是難之又難。還有，無政府黨與工團黨，勢力僅集中於巴塞羅納及其附近的市鎮，以及少數鄉區，在其他的工業中心，勢力就非常薄弱，這也是他們抓不到革命領導權的原因。像這樣，西班牙的勞動階級勢力，各有其所從屬，毫無中心信仰，致社會黨鞏固內部的企圖，早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到

了現在，希望社會黨脫離政府者，即根據上面這種情形立言。他們說：在現階段中，社會黨實以變成有組織的反對黨爲有利，因爲這樣，社會黨也許還可以把勞動階級勢力的主要部分集合起來，爲自己的後援，要不然，勞動階級運動將益趨於分裂的局面了。

社會黨與無政府黨工團黨間之裂痕，從工會勢力的分散反映出來。社會黨的後盾，是勞動者總同盟，係伯斯地羅（Bosteiro）與拉果（Lago）、卡巴雷洛（Caballero）兩人領導。這個團體在革命成功後最初數月，勢力驟然膨大，一九三〇年的會員額約僅二十五萬，到了一九三二年，突增至一百萬。同時在無政府黨與工團黨背後，則有全國勞工同盟，與社會黨的勞動者總同盟相對立。當西班牙共和國肇建之時，全國勞工同盟因反對社會黨之故，勢力大衰。據說近來情形頗有轉變，社會黨以參加政府爲人痛罵，全國勞工同盟就從這裏佔了不少便宜。不過雖然這樣，以西班牙全國而論，社會黨的勢力究比無政府黨與工團黨強大。照趨勢看來，一旦社會黨認爲土地勞工兩者的改革及反教會的法令已經有了穩固的根基，他們似將飄然引退，以在野黨的資格，努力鞏固勞動階級的組織，使成爲一種政治勢力。無如事實上，社會黨要想貫徹其政策，卻有絕大的困難，因爲無

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已深入勞動階級的心，社會黨碰到這樣的勁敵，急切定難取勝。

西班牙在從前的時候，是個君主專制的國家，中樞獨攬大權，各省處處須受中樞所在的加斯底耳省的控制，到了現在，人民撫今思昔，每易把中央集權制的政府與過去的情形聯在一起，因此之故，西班牙人民對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向來抱着甚深的惡感，而對劃全國為若干省或若干區實行分治的辦法，即無政府黨與工團黨所主張的，則表示熱烈的傾向。這種傾向，便使較社會黨尤為堅持中央集權制的共產黨，喪失在西班牙擡頭的機會。現在，西班牙的無政府黨與工團黨，固然是最左的革命勢力，但當社會黨的勢力膨大，或無政府黨與工團黨急於抓取政權之時，則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信徒，也許爲了要防止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勢力的擡頭，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如一九三三年春季的葡萄牙的情形一般。我們不要忘記，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其一部分黨員是從自命爲意大利勞動階級運動的最左的勢力之無政府黨與工團黨中間吸收來的，又如法國索勒爾（Sorrel）領導下的工團主義者，也曾對極右的保王黨買弄風情，這就因爲法國的保王黨，從其所組織的（Amelots du Roi）看來，實具有非常顯明的法西斯意味。所以，縱使西

西班牙的無政府黨與工團黨在目下尙未顯然的傾向於法西斯主義，將來卻難保他們不步以上所說諸國中的無政府黨與工團黨的後塵。在這樣的情形下，西班牙勞動階級的幸福，似乎還得依賴社會黨與勞動者總同盟，說得明白點，只有在社會黨與勞動者總同盟的基礎穩固以後，西班牙的勞動階級始克保持其利益；這永遠是社會黨的第一要務，較之繼續參加政府，與左翼的資產階級政黨合作，實有以左右政府的大政方針那種計劃，輕重緩急之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西班牙的社會黨之參加政府，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我們若因他們截至現時爲止尙未脫離政府，遂把加於其他喜與資產階級政黨組織聯合政府的社會黨之責詞，舉而加諸他們的身上，那就未免失之太不公平。因爲西班牙人在革命後最初數年所必須應付的，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局面：以西班牙工業之不發達，苟不先鏟除舊時土地制度與教會的惡勢力，革命的成果是也許會得而復失的。

葡萄牙

葡萄牙是伊比半島西部的一個狹小的區域，看起來似乎應該隸屬於西班牙，真的假如沒

有歷史的偶然性，也許已成爲西班牙的一部。無如當摩爾民族的王國盪起雲湧之時，葡萄牙就已獲得自主，自十二世紀以迄今日，其中有六十年因被西班牙征服，自主的局面暫告中斷外，始終保有獨立，雖則有時獨立的根基並不見怎樣穩固。

葡萄牙是過去時代很光輝而現在却非常黯淡的國家。當十五世紀之時，葡萄牙人在探險界內最稱活躍，結果獲得廣大的海外殖民地，但其在東方的領地，未幾即爲荷蘭及英國所奪；及至十九世紀，隨着巴西的獨立，葡萄牙在美洲的勢力，也完全消滅；現在葡萄牙的海外領土，只剩非洲的安哥拉（Angola）與摩贊貝克（Mozambique），這兩地是非洲除里比利亞（Liberia）以外管理得最壞的區域。即葡萄牙的本土，自一七〇三年的麥條恩條約（Methuen Treaty）以來，實際上竟無異是英國的屬地；威靈吞的軍隊，曾以葡萄牙爲根據地，並命供應給養。大戰發生，葡萄牙爲須效忠英國，遂加入協約國方面。

葡萄牙的人口，連馬得拉（Madeira）與亞速爾（Azores）兩島的人民在內，共六百五十萬，大都務農爲生。住在鄉間的人民，居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人口五十萬的里斯本（Lisbon）與二十

五萬的奧坡托(Oporto)，要算是最大的兩個都市。規模比較可觀的工業，是織物工業，共雇用工人五萬名。全部土地中，百分之三七·四爲牧場與生產雜糧的田畝，百分之二十八爲森林區，百分之二十五爲廢地，百分之五·二爲葡萄園，百分之六·二用以培植其他的水菓。小麥、玉蜀黍、馬鈴薯等俱有出產，但培種方法的標準極低，例如小麥的平均產額，不到意大利小麥平均產額之一半，較之歐洲其他任何國家（包括俄國）除希臘以外，亦均有遜色。主要的輸出品不消說是酒，同時水菓、軟木塞、魚（以沙丁魚爲大宗）三者，亦有相當數量的輸出。爲了製造業及礦產業俱極不發達，葡萄牙每年所輸入的製造品及煤，爲數頗巨，大都來自英國。此外又須輸入大批雜糧，以補國內產量的不足，故葡萄牙的貿易差額是非常不利的。

葡萄牙農民的生活水準極低。人民的死亡率極高，不識字者之衆多，亦歐洲所罕見。憲法訂立於一九一一年，以共和民主爲原則，規定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子俱有選舉權。然而葡萄牙的政府，幾無時不在風雨飄搖之中，正如都城里斯本之隨時須患地震一般。且議會也好像患時發時愈的慢性病，忽而開幕，忽而停閉，從未走上軌道。現在的葡萄牙政府，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七月，由一種民族

黨卽所謂 *Estudo Novo* 者一手把持，其所標榜的大政方針，爲維持對英國的聯盟，及推行電氣化二事。可是截至現時爲止，關於後面一種政策，曾未聞政府有若何設施。葡萄牙目下常常發生罷工，此外又有小規模的法西斯運動，當著者執筆的時候，聽說葡政府對於此兩種運動，均已決定以高壓手段對付云。

十四 意大利

在戰前即已爲歐洲列強之一的意大利，其統一與自主的完成，實較其他一切強國爲遲。因爲意大利之成立統一國家，雖說早於德意志帝國十年，可是德意志帝國正式宣告成立之先，德意志各邦早已在關稅同盟下一致聯合起來，故實際上統一的完成仍比意大利爲早。意大利的統一，是一八六〇年以舊時的撒丁王國爲基礎建立起來的，但非至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使之有佔領羅馬的機會，獲得一個傳統的國都以後，他的統一不能說業已臻於完成。這樣，從小國進而爲重要國家，意大利確是比較的落後，所以互十九世紀的後半，他無時不在努力奮鬥，冀博得西歐其他強國的一致承認。而因西歐其他強國——即英德法三國——之人口與經濟發展，均非意大利所能望其項背，意大利實很難獲得與之完全相等的地位，一直等到一九一四年，似乎還不能達到目的。

大戰給與意大利以完成素願的極好機會。然而凡爾賽和約所給與的新領土，却又使他大失所望。原來意大利因參加協約國之故，在和議開幕以前，極希望和約能夠助之獲得廣大的殖民地，與其他重要國家的殖民地不相上下。可是現今的意大利，始終未能鞏固其在小亞細亞沿岸的勢力，因為在那裏，他僅領有羅德斯與杜達坎尼斯兩島，而且這兩島中，前者尚屬安定，後者爲了希臘人的民族意識十分激昂，就很不易統治。全部殖民地——以在非洲的爲最大——的人口，一共只有兩百萬，經濟上絕少發展的機會。截至現時爲止，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拓殖事業無非多耗一點國帑，從未收獲怎樣巨大的經濟報酬。不過在意大利眼中，以上說過的殖民地實無異是他所賴以建立帝國聲威的唯一的憑藉，他覺得要追踪英法兩國，就非從發展殖民地入手不可。

然而意大利冀與世界上其他重要國家並肩齊驅的願望，到底因工業富源的貧乏，受到極大的阻礙。意大利經濟上的發展，本來非常幼稚，較之擁有同等聲望的國家，相去真不知其幾何里。意大利全境多山，不宜墾種，此外又有許多沼地，苟不先費巨大的本錢，就絕對不合實用。還有在工業上，凡爲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工業所需要的原料，意大利都缺乏得要命。煤幾乎少到沒有，就是褐

炭，也只有極小數量的產出。又如各種重要金屬，也沒有一種不感缺乏。所以意大利不但需要進口大量的煤，更須進口爲工業上所必需的鐵。在這樣的情形下，重工業當然不易發展，只有輕工業尙有相當的成就。金屬工業中的汽車製造業，頗稱發達，每年輸出汽車甚多。但是機器、已成的金屬品、以及原料，就不能不賴外國供給——大批的供給。可是意大利何以能居於工業品輸出者的地位呢？這可說完全得力於織物工業。在織物工業中佔着首位的是棉織業，其地位本在絲織業之下，近年以來，始取後者的地位而代之。這種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卽棉花，當然須從國外輸入，但意大利的棉織品，不但能夠供給國外的需要，同時還能夠在世界市場中佔得重要的地位，亦可見意大利的棉織業之發達爲何如了。又如絲業，意大利本爲生絲與絲織品的重要輸出者，近來爲抵制人造絲的競爭，又致力於人造絲工業的發展，成績亦自不惡。毛織業的規模比較的小，且因國內所出產的羊毛，品質極劣，一部分原料不能不取給於外國，故其地位遂瞠乎棉織業與絲織業之後。惟意大利的毛織品雖然還不能建立怎樣巨大的出口貿易，但以之供給國內的需要，則已綽有餘裕。這表示意大利的毛織業，其實也很發達。說起農產品，意大利每年輸出水菓、蔬菜、橄欖油、乾酪甚多；然而不

管意大利近年來是如何努力於雜糧生產額的增加，還是不能不輸入巨量的小麥與其他的雜糧，藉補自己生產的不足。玉蜀黍和小麥一樣，每年向國外購進的，爲數甚鉅。

其實在意大利，因刻意經營的結果，可用以培植雜糧的田畝，已大有增加，這一部分固由犧牲其他的農產品所致，同時也由於化荒地爲可耕之地這個計劃之成功。且如今意大利正在廣大的沼地中進行大規模的灌溉計劃，冀有以增加耕地的數量，這個計劃的前途不消說是很有希望的。還有一層，意大利對於農產品的品質以及農業區內的情形，已知悉心研究，加以改良。法西斯政府近年來在農業教育的領域內，活動不遺餘力，同時並設立所謂全國穀物委員會，專司供給種子及改良肥料等事務，以是在過去數年中，意大利自己製造的肥料，進步甚速。在這樣的情形下，意大利目下所生產的食糧，當然超過數年前的生產，不過與戰前相較，卻又不曾有若何顯著的超過，這是因爲戰後最初數年意大利的食糧產額曾呈猛烈的退步之故。

意大利對於增加農業生產的計劃，所以如此積極進行，其最大的原因在於人口的激增。近幾年來，意大利人口增加之速，至堪驚人，生殖率與死亡率兩相抵銷之下，每年幾可增加五十萬之多。原

來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極力想藉增加人手，來彌補工業富源的欠缺，同時認為人民的蕃殖能力，乃國勢的強弱所繫，甚至較經濟能力尤為重要，故獎勵生產，無所不至，結果遂以造成人民的驚人的蕃殖力。大戰以前，意大利人口遠在法國之下，可是今日的意大利，其幾近四千三百萬的人民，已凌駕法國而上之，這一點，是意大利人所常常引以自豪的。

然而近幾年來意大利人口的激增，並不是完全由於人民的飛速進展的蕃殖能力。原來大戰以前，意人之遷居異國者，絡繹不絕，美國無論已，就是南美洲的阿根廷與其他各地，以及歐洲的法國，也為意大利移民的尾閫。自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意大利遷往異國的人民，共在八百五十萬以上，就中往美洲者約五百萬，其餘則分往歐洲各地或地中海沿岸。及至戰後，這種移民的數額，忽然大為減少，而在過去數年中，因世界恐慌的結果，意大利竟絕對的中止移民，這使意大利的人口，獲得了盡量增加的機會。不僅此也，自一九三〇年以來，法國有一部分意籍勞工，陸續給遣回故國，意大利的人口，因此益形擁擠。像這樣急激增加的人口，站在民族的立場來看，不消說是可喜之事，但其足以引起意大利嚴重的經濟問題，卻也是毫無疑問的。意大利的人口密度，超過每方

哩三百四十人，同時他的土地，如前面所述，卻有一大部分不適於耕種，據調查至少當有百分之三十絕無經濟發展的可能，即使有此可能，也非先耗巨額的本錢不可。然而意大利的政府，爲急於增進國力，一方面嚴厲限制人民遷居國外，一方面極力獎勵生殖。因此，除設法發展工業與農業以外，簡直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意在扶植經濟自給的保護政策，以及將國家的全部資金提供於農工業，這種計劃，均已在積極進行，其雷厲風行的狀況，斷非尋常國家所能幾及的。

原來意大利是個貧窮的國家，資金十分缺乏。國內儲蓄款項之少，異乎尋常，故工業化的推行不能不依賴外資。除了向國外輸入資本以外，意大利就沒有法子使自己有充分的償付能力，尤其是在世界恐慌的時代；因爲在此時代中，意大利很難使輸出額超過一定的限度，藉以償付那必需的輸入品的昂貴的價格。然而自法西斯政府勵行保護政策，並將國內全部資金提供於農工業以來，情形就突然一變；不管人口若何增加，不管一九三〇年的歲收若何惡劣，意大利居然在遍世界不景氣的當中，獨自打開一個景氣的局面，本來十分不利的貿易差額，忽呈極大的起色。一九二八

與一九二九兩年，意大利還輸入相當數量的外資，因此這兩年的貿易差額也極爲不利；但自此以後數年中，意大利盡可能的縮減外資的輸入，於是不但貿易差額驟現轉機，意大利還藉此表演了一樁奇蹟：他們始終不曾使里拉（Lira）同金本位脫離關係。

除設法促進雜糧的培種外，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並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植林計劃。在以前，幾佔意大利全境五分之一的森林區，當其出產消耗殆盡之時，即從來不知設法加以振頓。但是現今，則植林事業已在法西斯政府的直接監督下，就比較多山的區域內，很快的在進行着了。總之，我們如果說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憑藉有限的國富，對着經濟發展的目標努力奮鬥，結果卒獲得良好的成績，或者說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其經濟上的進步遠勝議會政治時代的意大利，這些話是都有充分的事實證明，誰也不能加以否認的。

可惜意大利的法西斯黨，當其獲得政權之時，雖然以增進人民的生活標準及保證意大利的勞動者能够享受最美滿的生活這兩點相標榜，可是截至現時爲止，他們對這方面好像並不會有多大的貢獻。現今意大利的工人所享受的報酬，依然非常之低，不特不敢與英國工人所享受的相

提並論，即與法比兩國的工資相較，亦殊有遜色；廉值的勞工，在意大利的工業界，依然是十分普通之事，推厥原因，便是由於農民的生活程度，比工人還要低下之故。意大利的土地，如法國的土地一般，在北部的固已給分成極小的地產，但是有許多區域，尤其是南部，大地產猶有存在。一般的說來，培種方法的標準仍低到可憐。當法西斯黨尚未登臺之時，意大利的合作運動就已非常發達，花樣也很繁多，有的是由擁有小地產的農民組織集團，關於用品的購買，出品的推銷，以及關於財政事宜，都歸集團辦理，藉收合作之效；有的是勞動者組織集團，共同在一塊大地產上耕種，這些勞動者有許多也是擁有小地產的人，當他們無需和合作農場做工之時，就回去料理自己的田畝。後來法西斯政府將舊時合作運動的許多領袖驅走，抓得了運動的領導權，遵照法西斯主義改組合作運動，正如他對付工業勞動者的工會一般。像這樣的經過改組並受政府獎勵的合作運動，並存在於某幾項工業生產部門，最著的有如建築業與築路業。不過這種合作運動一如農業上的合作運動一樣，其領導權已不復屬於舊時的領袖，而屬於法西斯黨了。

法西斯黨把持下的組織，即合作社與工會，當然以謀勞動者的利益爲事。無如事實上並沒有

能力保障工資的標準。原來在法西斯意大利，罷工是有于禁令的，當勞資兩方爲工資問題發生爭執時，只能由官廳出面釐訂工資；合作社與工會既由服膺法西斯主義者一手把持，行動決不致趨於極端，欲望其替勞動者爭得滿意的工資，簡直是一種妄想。意大利的勞動者這樣，心中無疑地蘊藏着極大的不滿，只因一切獨立的勞動階級活動都遭禁止之故，暫時尙不致爆發。而且，在最近的將來，法西斯黨似乎不會有提高工資的能力；因爲意大利的工業制度，與他國相較，是不免相形見绌的，其所以能使自己的輸出品在世界市場中獲得相當地位，完全得力於勞力成本的低廉，而勞力成本的低廉，則完全有賴於工資的低廉。意大利的食糧及原料，既皆有賴於輸入，故非極力維持其輸出品中的地位不可，這歷一來，世界市場競爭的急劇，遂影響到意大利勞動者的收入。還有，意大利政府爲要促成農業上的發展，因而增加爲激增的人口所必需的食糧，就非強迫勞動者接受低下的工資標準不可。原來掌握意大利國政的法西斯黨，凡事都左農民而右工人，他們在登臺之先，曾從都市中的次等的中間階級及鄉村中的農民，得到極大的援助，及至得勢以後，遂只知努力增進農業與農民的地位，而把提高工人的工資一事，置之腦後。況農民生活的改良，可以增進農產品

的產額，而工業品的產量，則因須銷往世界市場之故，似乎以在低廉的工資下比較的容易增進，所以意大利的政府，愈不願提高工人的生活標準了。

然而不管怎樣，法西斯黨對意大利的人民，不論其爲住在都市中的，或爲住在鄉村中的，關於經濟狀況的改進，總算已經盡了一點微勞。不過他們只知注意公益事業的設施，而不願提高工人的報酬耳。意大利雖然沒有失業保險制度，但以增進勞動者幸福爲目的之各種機關，尤其是所謂 *Instituzioni di Dopo Lavoro* 則早已在法西斯黨的監督下，陸續設立起來。唯此類公益事業，必須合乎法西斯國家所規定的需要，活動的範圍既很狹隘，經費亦非常有限，而且這有限的經費，十九都被撥充經濟發展計劃的資本，而非用於救濟失業工人，或設施如英國那樣的公益事業。關於政府設立之各種機關怎樣藉國家的援助替意大利的工業主持財政事宜的情形，將在本書以後再作簡單的討論，這裏姑不具述。意大利的工業家對於上述的辦法，常常加以指摘，說這完全是社會主義者的政策；至於法西斯黨，則認爲自己的手段，大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決定對私有企業積極干涉到底。實際，這種干涉與其說是意在以國家的行動代替私有企業的活動，寧說是

意在對私有企業供給有力的援助；慕沙里尼當答覆意大利的工業家的指摘時說，他的政策，目的只在將意大利工業的財政事宜，完全置於國家管理之下，並無絲毫社會主義的動機在內，這或許是心口如一的話罷。

意大利在過去期間，是文化落後的國家，農民不識字者，十居八九，生活標準也非常之低，故議會政治像缺乏營養的草木一般，從無發旺興盛的氣象。現今的意大利憲法，依然留有一八四八年撒丁王國時代的舊憲法的氣息。而一八八二年所規定的有限制的投票制度，則一直應用到一九一九年，是年意大利的人口約爲四千萬，而參加選舉者，卻只有三百萬。自從一九一九年起，意大利總算改絃更張，將全民投票制度與比例代表制度，俱付之實施，無如這些制度並不能使意大利的議會政治，與國家生命發生密切的結合。政黨永遠只有極薄弱的力量，也就永遠不設代表人民的意志，跟着法西斯主義的擡頭，根基未固的議會政治的勢力遂如向陽之雪，轉瞬消溶以盡。法西斯黨的羅馬進軍，終於把意大利人模倣西歐的先進國家而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的國家，毫不費事地打進了古物陳列所。誠然，法西斯黨的古迭達，也未嘗不遇到相當的反抗力量，可是

發出這種反抗力量的，並不是與議會政治制度有密切關係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主義者，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者，卻是贊成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而不贊成社會民主主義之勞動階級。

所以當壓平無產階級的運動以後，慕沙里尼藉中等階級與上等階級的贊助建立法西斯國家之企圖，遂前途坦蕩，絕少阻礙了。這兩種階級，對於議會政治的成績，原抱甚深的不滿，故當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壽終正寢之時，他們遂爽捷地接受了新的政治組織，毫無爲難之色。關於法西斯主義發展的經過，以及意大利政治制度的構造與作用在法西斯黨登臺後的變化，請參看本書以後所述，在這裏，我們所當著眼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其得勢之易，與阻礙之少，均非推翻德意志共和國的國社黨所可同日而語。德國對於議會政治制度之信念，固然不見怎樣堅固，可是比之意大利，則即使韋瑪共和國的壽命非常短促，也比較的要堅固些，所以我們決不可因爲慕沙里尼能够削平敵對勢力維持政權至十二年以上之久，遂推定國社黨也能使其特殊的專政制度，永遠博得德意志人民的愛戴。

十五 英國

在歐洲諸國中，英國的人口居第三位，但以言領土的面積，就得居第十二位。除蘇格蘭的北半部以外，工業都非常發達，因而人口也非常稠密。就人口的密度而論，英國僅次於比利時及荷蘭，而勝過意大利與德國。其人口總數，爲四千五百萬，若把北部愛爾蘭的人民計算在內，則在四千六百萬以上，對德國的六千三百萬固有遜色，較之蘇俄的一萬六千萬，尤覺瞠乎莫及。但除俄德兩國以外，則無論法國或意大利，其人口都須屈居英國之下，其餘各國更不消說得。且英國人民的平均財富，遠出其他任何歐洲國家人民之上。要估計一國的財富，不管用怎樣的方法，總難免有許多不確。現在姑以安極爾教授 (Professor J. W. Angell) 在其所著德國的復興 (The Recovery of Germany) 中的估計做標準：

國	名	年	份	人民平均收入（單位美金）
英國			一九二四	四三五
德國			一九二八	二三一
比利時			一九二六	二二三
法國			一九二七	二一八
意大利			一九二五	一四〇

如把年代的先後置之不問，英國人民的平均收入爲一百，則德國人民爲五十三，比利時人民爲五十一，法國人民爲五十，意大利人民爲三十二。至如美國的人民，據安極爾教授的估計，其與他國人民的比較數字爲一百五十。這些數字，對於我們現在的目的，似尙不致不穀正確；我們這樣便可據以得到如下的結論：在最近數年中，德、法、比三國人民的平均收入，約爲英國人民的平均收入之一半，意大利人民平均收入約爲英國人民平均收入三分之一。

英國人民的財富遠出歐洲其他各國人民之上，不消說是閱時兩世紀以上的工業化發展的

結果。就工業的發達的程度而言，英國穩坐着歐洲的第一把交椅，就是比利時也趕他不上。英國全部有業人民，工業者的人數與農業者的人數爲七與一之比，比利時就只有六·五與二之比，瑞士與荷蘭均只有六與二·五之比。至如德國，不管工業發達至若何程度，工業者對農業者僅爲二比一，而在法國，則工業者與農業者的比例，竟降至五與四了。

工業化既發展到如此程度，英國當然十分需要輸入大批食料。據統計，從戰後數年起，至世界恐慌初期止，英國平均每年輸入的食料，以價值爲標準計算，佔食料消費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之多，由是可知英國國內所生產的食料，只佔食料消費總額百分之四十弱。自從世界恐慌發生以來，英國所輸入的食料，在數額上無疑的視前增加，不過在價值上因農產品價格低落之故，並未呈相應的增加。在全部食料輸入額中，如近來幾年的統計所表示，百分之三十九——即相當於國內產量的數額——依賴外國供給，百分之二十二弱依賴屬地供給。如果把進口的食糧依照種類而求得其各自的數額，然後再加以比較，則有幾種因爲國內產量比較的多，輸入比較的少，有幾種因爲國內產量比較的少，輸入比較的多，這是不消說得的。自戰後起，至世界恐慌的前夜止，英國國內所

生產的食料在食料消費總額中所佔之比例數，有如下述：小麥約只百分之十五，獸肉約百分之十四，家禽、雞蛋、牛乳製品等百分之五十弱，蔬菜約百分之七十，魚類約百分之六十。還有，在恐慌未發生前，英國平均每年輸入的水菓，價值至五千四百萬鎊之多，為國內產量的價值約八百五十萬鎊的六倍有餘，這是因為英國消耗得最多的水菓，大都是輸入品之故。又如製糖的原料，國內產量僅佔全部消費量百分之六，而且全賴政府對培植甜菜者給與巨大的津貼，始克有此成績。除上述諸品之外，人造乳酪亦有大量的輸入；又英國的茶、咖啡及原料可可，皆全賴國外供給，這是誰都知道的。

英國不但工業十分發達，且其對於某數種工業之專精，亦非尋常國家所及。因此，其所恃以充裕財富的輸入品，種類實頗有限。原料性質的食料，絕無輸出，製品性質的食料，也輸出得很少。在原料品中，煤是唯一的重要輸出品。而製造品則為英國大部分的出口貿易所由成，就中尤以棉織物為最重要。大戰以後，英國銷往遠東的棉織品，數額實已呈極大的退步，然而即使在一九二九年，還是在出口貿易上居着首位，算起價值來，共一萬三千五百萬鎊，與英國全部輸出品的總價值七萬

二千九百萬鎊一相並列，即可知其所佔比例之大。次於棉織物的輸出品是鋼鐵，價值六千八百萬鎊；自此以下，爲機器五千四百萬鎊，毛織品五千三百萬鎊，煤四千九百萬鎊，以上五者，是英國的主要輸出品。此外，除棉毛織物以外的織物與衣服併計，價值在五千二百萬鎊以上；各種化學品，價值二千七百萬鎊，除機器以外的金屬製品，包括電器在內，價值在四千萬鎊以上，由是可見英國的出口貨，數額最大的是織物工業與金屬工業的出品，煤次之，化學品又次之。當然，上面所舉的數字，只說明各種工業出品輸出額的多少，並不能說明各種工業在國家生產經濟中所佔的地位之高下。例如織物工業的出品，輸出額在全部產額中所佔比例之大，決非其他工業的出品所可及，尤其是棉織工業的出品，在過去期間，銷往國外者佔全部產額五分之四以上之多。煤的輸出額，在全部產額中所佔的比例，就很有有限。然而出口貨尤其是鋼與鐵的製造，卻大有賴於煤。所以我們萬不可因爲織品的輸出額大於煤的輸出額，遂斷定織物工業的地位高於煤炭工業。據一九二九年的統計，英國的全部製造業工人——轉運業、分配業及其他事業的工人均不計算在內——只有百分之三八·五從事於製造輸出品，自一九三〇年以後，此種工人的人數尤形減少，至於不到全部製造

業工人三分之一，換一種說法，即使把與出口貿易有關之分配業工人與轉運業工人俱計算在內，英國與輸出品有關的工人，也不到全部有業人民的四分之一。

然而與輸出品有關的工人在全部製造業工人中佔三分之一，或在全部有業人民中佔四分之一，這究是可驚的比例；因為有這種可驚的比例，英國要想維持其現有的工業制度，並養活其人口，就不能不為其鉅額的輸出品找尋國外市場。截至恐慌發生時為止，英國嚮是在自由貿易制度下，向全世界的無論那一個區域找尋其國外市場，雖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不論在自治領地或在有幾個殖民地與保護國內，均得享受特惠稅率。當一九一三年時，英國出口貨之銷往屬地者，佔全部輸出額百分之三十七，銷往外國者佔百分之六十七。迨至一九二九年，銷往屬地者增至百分之四十四·五，銷往外國者減至百分之五十五·五。可是此種百分比的變化，實因對外國的貿易驟減所致，並非由於對屬地的貿易，有怎樣了不得的進步。至如輸入品，當一九一三年時，百分之二十五取給於屬地，百分之七十五取給於外國，迨至一九二九年，取給於屬地者居百分之二十七，取給於外國者居百分之七十三。可見是年英國輸入品的來源，與戰前相較，並無重大的變化。英國仍賴

外國供給大部分的食料與原料。就是輸出品，不管銷往外國的數額怎樣衰落，其主要的尾闈亦仍為外國而非屬地。

英國經濟制度之有賴於對屬地及對外國的貿易，已如上述；此外，英國與歐洲各國間的貿易對於英國的經濟制度有怎樣密切的關係，亦為我們所應知，茲說明如次。據一九二九年的統計，英國輸入品之來自歐洲各國者，居全數約百分之四十，輸出品之銷往歐洲各國者，居全數百分之二十九，而與美洲各國的貿易，則輸入品僅佔全數百分之二十九弱，輸出品僅佔全數百分之十六強。在歐洲各國之中，英國與之有最大交易者是德國，輸出品銷往德國者佔全數百分之五，輸入品來自德國者佔全數百分之六。至如與丹麥的交易，輸入方面雖佔全數百分之五，輸出方面可就只佔全數百分之一·五。與法國的交易，輸入輸出都約佔全數百分之四·五左右，不過仔細加以比較，則輸入稍多於輸出。此外，就要推與荷蘭與比利時兩國的交易為最重要，輸入方面各佔全數百分之五，輸出方面各佔全數百分之三。除去上述五國，歐洲各國中能在英國全部出口貿易中佔得百分之二以上者，只意大利一國，能在英國全部進口貿易中佔得百分之二者，只蘇俄一國。以上所說，

我們必須明瞭，是指除去愛爾蘭自由邦而言，因愛爾蘭自由邦在英國全部進口貿易中佔百分之四，在英國全部出口貿易中佔百分之五，就重要的等級言，實僅次於德國。茲再把英國與歐洲以外各國之交易，擇其最重要者，臚列於下，藉資參考。美國在英國全部進口貿易中佔百分之一六·五，但在英國的全部出口貿易中卻只佔百分之六·二五；次為阿根廷，在英國全部出口貿易中佔百分之七·二五，在英國全部進口貿易中佔百分之四。又如就屬地而論，印度是英國輸出品的最大市場，接受英國全部輸出品的百分之一〇·七五，同時英國輸入品之來自印度者，則只佔全數百分之四·五弱。此外，以重要的等級順次排列，澳大利亞在英國全部出口貿易中所佔的比例為百分之七·五，在英國全部進口貿易中所佔的比例為百分之四；加拿大前者百分之五強，後者約百分之四；南非洲前者百分之四·五，後者百分之四；新西蘭前者百分之三，後者百分之三·五強。

英帝國的貿易

觀以上所述，對於英國的出口貿易在世界恐慌前的分配情形，我們是已可思過其半。這種情

形告訴我們以兩個要點：一，即使英國的屬地在英國全部出口貿易中所佔的比例已漸有進步，歐洲各國依然是英國的工業品的最重要的市場；二，英帝國如欲僅藉對屬地的自由貿易，達到自給的目的，那就非將工業大加重新分配不可；英國現下所能供給的貨品，其種類既然只限於原有幾種，欲求其在屬地的市場擴大至可以代替歐洲的市場，真不知在何年何日？因了上述兩重原因，縱使英國能在各國都忙着增高關稅壁壘抵制外貨之時，與其屬地成立特惠協定，暫時藉這種協定獲得有利的貿易差額，也到底以盡可能的恢復自己的製造品在歐洲的市場為有利。站在工業的觀點來看，恢復歐洲市場永遠是英國切要之圖，因此事的利益，決非延長帝國內部特惠關稅制度一事的利益所可同日而語。還有一層，英國有幾個屬地，如加拿大，如澳大利亞，都已決定從事於工業的發展，就中尤以加拿大的工業家，如一九三二年渥太華會議所表示，深恐英國的貨品以極低的稅率輸入加拿大，將危害他們的出品在加拿大市場的地位，對於抑低關稅障壁一事，竟遲遲不予接受。他們說，只有將從前為保護加拿大工業起見，對外國的輸入品所課取之高率關稅，再提高一些，始可對英國給與特惠關稅；這就是說，英國的貨品在加拿大市場中，充其量只許奪取一部分

從外國尤其是從美國來的貨品的地位，而要想獨霸加拿大的市場，則無論目前與將來，均所不許。至如澳大利亞，反對抑低關稅障壁就沒有像加拿大那麼堅決，這完全因為澳大利亞的關稅，在渥太華會議以前，就已非常之高，澳大利亞人人都承認抑低關稅障壁，減輕消費者的負擔，乃是一種必要之圖，並非為英國的利益打算盤也。

根據上面所述，與其說渥太華協定是英國建立自給的帝國的初步，寧說是英國為歐洲各國自世界恐慌以來，高其關稅壁壘，並厲行其他的貿易上的制限，因而不得不採取這種臨時辦法。所謂臨時，意思當然不是業已確立的帝國內部特惠關稅制度，可以輕輕取消；縱使有事實證明這種制度的延續對英國經濟至為不利，英國也未便驟然改圖，因為這種舉動，也許可以引起絕大的政治糾紛。可是帝國內部特惠關稅制度雖將繼續有效至若干時日，英國人的公意，卻確乎不願其長久延長下去；倘使英國人在將來而猶贊成延長帝國內部特惠關稅制度者，則彼時歐洲的關稅障壁，必比現在更高，或者歐洲各國成立某種性質的關稅同盟，獨不許英國參加。在這樣的局面下，英國自然只好藉延長帝國內部特惠關稅制度或相互的通商協定，為自己的輸出品開拓在屬地的

市場。可是這種辦法，只能挽救英國的國外貿易，使不致完全毀滅，對於英國的復興及世界的繁榮，究屬毫無裨益。英國既然其商業立國，就只有設法抑低歐洲各國的關稅障壁或類此的障壁，纔是生路，至與屬地締結協定，則徒損害其在歐洲市場的地位，實無甚利益。

更有進者，在渥太華會議席上，英國的屬地曾表示不願以自己對英國的特惠換取英國對他們的輸出品的特惠之意，動機如此，政策可知。抱着這樣的政策的屬地，是否值得英國給與分外的利益，實屬一大疑問。英政府固然費了絕大的心血，想使渥太華協定替帝國內部的經濟聯合放一異彩，無如事實上，英國的輸出品欲藉這一協定擴大其在帝國內部的市場，竟有如登天之難。最近英國輸出品市場，頗有起色，推厥原因，大部分實得力於金鎊的跌價，而非得力於參與渥太華會議的屬地所給與的關稅上的特惠。只要看加拿大正在實施『反傾銷』的稅率，而英國對加的出口貿易反呈進步，便可知英國貨品市場的擴大，到底是由於什麼了。

英國的關稅政策

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即以自由貿易爲其商業政策的基礎，這緣故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當時的英國，以工業範圍的廣大，生產能力的豐富，超越其他各國。其工業出品在國內市場中，儘有壓倒一切舶來品的能力，所以對於工業，絕對用不着保護。只有某幾種貨品，例如蠶絲，不能與舶來品相競爭。但英國對於這一點，毫不介意，覺得除蠶絲工業而外，有希望的工業甚多，放棄一兩種，是無關大局的。而且，早在那個時候，英國就已需要進口巨額的原料，供工業上的用途，假如課這些原料以重稅，顯然不是經濟的政策。獨有食糧一項，農業者主張保護，製造業者主張自由，各不相下；那時的農業派，人數猶非常衆多，在政治上很有點力量，而且獎勵人民從事農業這種主張，不論在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均很佔勢力，故政府遂將保護食糧一案，予以通過。但是一八三〇年以後，英國發生猛烈的自由貿易運動，農業派驟然失勢，原來廉價的原料，與工廠有密切的關係，而廉價的食糧，則與工人有密切的關係，製造業者爲要抑低工業生產的成本，兩者缺一不可，因此之故，勃拉脫（Bright）科勃登（Cobden），以及反穀物律同盟，遂與黨從自由貿易獲得更多的受雇機會與更輕的生活負擔之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結果卒戰勝農業派。一八四六年當穀物律取消時，英國

的自由貿易派的聲勢正如日麗中天，盛極一時，而且自是以後，有不少時候，英國大部分民衆仍相信這一著走得很總明，用不着懷疑。

可是十九世紀漸漸的到了末葉，其他國家相率參加製造品的競爭，局勢已不復如在一八四六年時之簡單。起初，英國是連保護農業的呼聲，也幾於毫無所聞的；但自歐陸諸國，尤其是德國的工業突飛猛進以來，保護工業的呼聲，居然也在英國復活了。此後，『對等貿易』的主張，雖然喊了許多時候，依然很少成就，一直等到新卽位的皇帝向全國爲感情上及經濟上的聲訴，方纔佔着盛勢。一九〇三年後數年中，約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遂着手進行關稅改革，希望使之成爲英國政治上的事實。縱使這種偉大的計劃沒有得到成功，並且授自由黨以一九〇五至六年大獲全勝的機會，然張伯倫當在位之時，指導保守黨改革關稅，不遺餘力，結果遂給一九三一年及其後數年中的英國新關稅政策，開闢了一條道路。

然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國可沒有在最近的將來採取保護政策之趨勢，就是在大戰以後，英國雖對原來的嚴峻的自由貿易制度，已稍稍失去信仰，但一九二三年保守黨的挫敗，說明英國

大部分人的心理，仍然傾向於自由貿易。其實當此之時，贊成保護貿易者的理論，縱使不能說佔有絕大的勢力，究已比較的惹人注意；因為英國的出口貿易，其時已呈顯著的衰落，而戰後曾有一時陷於默默無聞的德國，此時忽又蹶然興起，在世界市場上成爲英國的勁敵。還有一層，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各國與美國，其時爭把關稅提高，抵制外貨的輸入，於是堅持英國只能在世界各國實施適當的稅率時維持自由貿易制度，世界各國的關稅一加以高，英國就絕對不應採取自由貿易制度那樣的理論者，益覺振振有辭。在這其間，帝國內部經濟聯合的呼聲，又甚囂塵上。因此關稅改革論者，遂同時抱着兩種理論，一方面主張英國應以建立自給的帝國爲其大政方針，另一方面卻又以爲英國苟不樹起保護貿易的大旗，對全世界示威，則以抑低世界各國的關稅爲目的的政策，就絕少成功的希望。這兩種理論，在事實上當然是矛盾的，然其可以使工業階級與商業階級傾向於保護貿易政策者日漸衆多，則殊途而同歸。不過雖然這樣，英國也直至一九三一年，當世界恐慌日益深刻化之時，方纔找到了採取真正的保護政策的機會。而且當保護稅率開始實行之時，當局至不得不騙說這只是爲挽回貿易平衡起見的一種救急政策，直等藉這種手段達到目的以後，纔敢明

白宣佈英國確已永遠放棄其原來的關稅政策，真可謂用心良苦了。

卽在今日，英國對於關稅政策，猶抱舉棋不定的態度，這是很顯明的。因爲英國政府中人，一部分固在歌頌目下的關稅制度，同時又在鼓吹某種政策，企圖增進帝國內部的經濟聯合，但是還有部分，則仍在希望英國能够利用新稅率爲維持或增進對世界各國的商業關係的工具。這兩種意見，孰是孰非，請讀者自己鑑別。並且，英國是否以永久的高度保護政策爲目標而前進，還是不然，願誠意抑低自己的關稅，以爲歐洲及全世界的抑低關稅運動盡一分子的義務，這問題也需要讀者以己意加以判斷。

上文說過，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英國新關稅，其唯一理由，爲恢復貿易的平衡。惟據調查，卽在世界恐慌未發生前，英國商品貿易的差額，較戰前數年已有每況愈下之象，同時向海外投資的數額，也大減少。當一九一三年時，如商業部的統計所示，貨品與現金併計，不利的差額尙只一億五千八百萬鎊，而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九中間，則每年往往大至三億五千萬鎊，就中一九二五與一九二七兩年，均幾近四億鎊。又如一九二六年，卽煤業爭端與總罷工發生的一年，不利的差額竟達四

億七千五百萬鎊之巨，可是這種情形，究係非常變故所致，不當以常例論。

但英國可藉以彌補不利的差額的收入，數實不小，其中包括課自航業的稅，海外投資的利益，代外人在倫敦金市處理財政上的業務所獲得的酬報等，此外又有幾項比較不重要的收入。將這些收入統計起來，彌補不利的差額而外，尚有盈餘可供海外投資，當一九一三年時，如商業部的統計所示，此種盈餘約在一億八千萬鎊以上。但在戰後，就沒有有一年能夠達到這個數目。一九二四年只有八千六百萬鎊，一九二五年只有五千四百萬鎊。到了一九二六年，即發生非常變故的一年，竟減至九百萬鎊；幸此後即呈極大的起色，一九二七年爲一億一千四百萬鎊，一九二八年爲一億三千七百萬鎊。一九二九年已稍受世界恐慌的影響，故又減至一億零三百萬鎊。這些數字，如其本身所表示，不消說比不上一九一三年，若取大戰前後的物價來加比較，則尤可知其不及一九一三年遠甚。自世界恐慌的來臨，英國的主要輸出品雖然大跌其價，情形卻更不如前。因爲海外投資的利益及課自航業的稅，既俱大減少，代外人處理財政業務所得的報酬，亦視前遜色，而商品貿易的不利的差額，卻因輸出額的暴跌，益形巨大。一九三〇這一年，英國的盈餘遂減至二千三百萬鎊。第

二年更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把價值三千五百萬鎊的出口現金併在貸方計算，英國還是免不了有七千五百萬鎊的直實的不利差額；這當然是各種無形的輸出品，以及有形的出口貨，數額俱呈猛烈的續跌所致。

由上可知一九三一年的英國，經濟局面確已嚴重到非改革其原來的政策不可，雖一九三一年九月的金融恐慌，直接原因並不在於收支平衡的顛倒，而是在於金鎊的國際信譽的喪失，因為金鎊的信譽一失，外人便紛紛向英國提取存款，英國自不免發生金融恐慌了。據有些人的理論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後，收支平衡的顛倒，自然而然的可以糾正，因為金鎊跌價的效果，必然是進口貨因價值日漸昂貴而減少，出口貨因價值日漸低減而膨大，直至收支相抵為止。可是這種觀念如果想立於顛撲不破的地位的話，第一要英國的財政當局有任金鎊跌到無論怎樣都無加以整理之決心，第二要收支自動獲得平衡之趨向，非常強烈，至可使匯兌的自由漲落，能藉減少進口額，增加出口額，而迅驟實現收支的平衡。但事實上，這兩點都不能成立。因為金鎊同金本位脫離關係之後，並無漲落的自由；而且從現下的國際信譽看來，金鎊對外幣的價值，繫於英國與他國間對於有

形及無形的輸出額的相互的償付者甚小，而繫於那可以支配英國與他國間資本的相互的流轉之商業信用者，卻很重大。金鎊的跌價，對於英國的輸出額的促進，誠已發生絕大的效果，假如金鎊仍維持其原來的價值，則英國的輸出額的傾跌，正不知伊於胡底，這是不消說得的。可是輸入額卻並無多大變動，非等實施保護關稅，藉因金鎊跌價的效果所不逮之後，英國竟沒有法子減少其輸入額。原來當此之時，各國的財政狀況都非常不妙，人民對己國的信仰，轉不若對英國的信仰爲強，金鎊的匯價無論怎樣不穩，他們寧可把錢財匯往倫敦，俾策萬全，這麼一來，英國縱使繼續購買與往前相等的外國貨，也不能使金鎊的價值再往下跌，而英國人欲藉有形與無形的進出口額的平衡獲得收支的平衡之願望，也就難於實現了。

這種局面，實際上反使意在抑低英國生活標準的國內壓力，效果大減。說英國的工資較他國的工資太高一點者，相信進口貨價值的高漲，可立即造成物價的高漲，因而間接實現勞動階級的生活費的減輕，與人民的真正收入的重新分配。可是處於受雇地位的勞動者，卻並不這樣相信。於是，有鑒於連年收支向呈不利的差額，遂有人主張應用某種政策，來減少進口額。而爲此種主張者，

則就是一九三一年冬季贊成實施保護關稅的人。因此，英政府當開始實施保護關稅之時，並不以原來所制定的永遠有效的一般的稅率爲準，卻往往採取特殊政策，用來抵制所謂『非常的進口貨』。此種手段與金鎊的跌價相輔並進，其效果如一九三二年商品貿易差額與收支差額所表示，頗有可觀。原來是年英國商品貿易的不利的差額（現金的進出口額並不計算在內），從上年的四億零八百萬鎊，減至二億八千九百萬鎊，收支不利的差額（一切無形的收支項目都計算在內，但現金的進出口額仍除外）從上年的一億零四百萬鎊減至五千九百萬鎊。可是，根據這種情形，說英國爲了世界恐慌與他國俱採取保護政策這兩重原因，應該採取目下的關稅政策，用救燃眉之急，這是可以的，若謂英國從此以後，應永遠放棄其往前的政策，而自安於保護政策，這就失之武斷。且英國的特殊政策，例如意在保護小麥生產者的利益之小麥經費，——最好名之曰津貼——以及近來以便利推銷爲口實而付之實施的同樣性質的政策，俱不能稱爲應付世界恐慌及貿易差額的非常狀態之必要的步驟，也不能稱爲促進英國經濟繁榮之不易的政策，如欲強爲辯護，那就未免強詞奪理了。

著者之爲是言，並非謂英國定將或定須復返於澈底的自由貿易制度，其意蓋謂英國目下關稅制度之理論，只適合於目下的緊急時代，一等緊急時代成爲過去，當英國需要一個永久性質的關稅制度時，就未必適用。英國以後的關稅政策，大概是只能看他國以後的態度而定，而歐陸諸國將來關稅上的聯合的程度，則尤可決定英國將來的關稅政策；因歐陸諸國或共聯而爲一，或數國爲一組，組成幾個鮮明的集團，然後共結關稅同盟或互締關稅協定，此種情形，目下已露其端，將來究發展至若何程度，猶未可逆料。倘使此種情形愈演愈烈的話，那麼英國也許將逼得維持某種保護政策，至政策施行的方式，則或許不爲關稅，而爲某種形式的進口貨管理，特許制度或比例制度。然而此種政策，正像現下的屬地特惠制度一樣，我們不應視爲適合於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政策，而應視爲英國受環境的逼迫，出於無可奈何之步驟，因爲英國與世界市場尤其是歐洲的市場，其間究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在。國外貿易應受國家統制之說，儘有其與無統制的自由貿易制度分庭抗禮的地位，可是此說的立腳點，應爲建築在國際協調上之社會主義的貿易制度，不應爲目的在參加市場的爭奪戰，作助甲國以打倒乙國那樣的勾當之保護制度，這是原則，不容更動的。

政黨與政治

前面已經說過英國倚靠國外貿易之般，怎樣影響於他的經濟情形。現在，我們應該掉轉方向，講講英國國內的政治情形了。大戰以前，英國是在兩大政黨輪流統治之下，這兩個政黨，溯其成立的歷史，都遠在十八世紀，但自成立以後，面貌一天天的變，卒與原來的面貌大不相同。他們的名字，一個叫民權黨(Whigs)，一個叫保王黨(Tories)。十八世紀以來，以訖於一九一四年，爲英國自封建國家發展到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時期，而民權黨及其後身自由黨(Liberals)，與保王黨及其後身保守黨(Conservatives)，則爲輪番支配這個時期的英國的兩大政黨。由於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改革法，工業界的中等階級，驟然在政治上佔得絕大的勢力，因之這兩大政黨的面貌，也變動了一下，自此以後，民權黨與保王黨的政見，就從未呈現重大的差異。對於次要的問題，或不免各有見解，但對於主要的問題，如英國的社會制度，應建築在何種基礎之上，各種基本制度如財產及階級等，應採取何種形式，用以維持此種經濟組織之政治組織，應採取何種制度等，則保王黨的意見，

就是民權黨的意見，毫無出入。固然，截至一八四〇以後數年止，保王黨大都主張保護貿易，而民權黨則比較的傾向於自由貿易；可是撤消穀物律的首相，卻是一個保王黨員，而且自此以後，這兩黨的政見，依然表示民權保王兩黨，宛如一家人一般，在大政方針上面，絕未發生任何衝突，例如一八六七年當都市工人被賦以選舉權時，從大體上說，民權黨固比較保王黨更爲傾向於選舉權的開放，然而頒布一八六七年的改革令者，卻又是保王黨的內閣，且自此以後，不論民權黨與保王黨，都以承認新起的選舉階級的要求，爲其大政方針的根據。從一八六七年起，至一八七〇以後數年止，英國的層出不窮的社會改革的法令，民權黨的後身自由黨所通過的，與保王黨的後身保守黨所通過的，一點也看不出有顯明的異點。及至恐慌時代來臨，爲了改革事業經費的難籌，以及對勞動階級選民的要求易於說話之故，兩黨的改革熱，遂同時消沉。但自由黨因爲與新教徒及工業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與有較高特權之階級，則殊少往來，故比保守黨更爲接近於勞動階級選民，尤其是工會與合作會社的會員。後來在英國的政治舞臺上，幹絕大事業的勞工黨，便在那個時候，開始顯露頭角，唯勢力尙小，只能附屬於自由黨。即使在一九〇〇年，當正式宣佈脫離自由黨而獨立

之時，勞工黨事實上依然是自由黨的與黨。自是以後，至一九一四年止，勞工黨勢力始終非常薄弱，設不上做政治上的中心勢力，且因與自由主義關係太深之故，始終追隨自由黨之後，無由自顯。

但自大戰爆發，強有力的自由黨，地位忽然動搖起來；如後面所述，自由黨勢力的沒落，引起勞工黨勢力的擡頭。不過我們必須知道，標榜自由主義的政黨，雖已分化而成爲許多意見不睦的團體，但如撇開黨派觀念不論，則自由主義依然是英國一大部人民政治上的信條，不但次等的中等階級服膺自由主義——高等的中等階級大都傾向保守主義——就是黑衫的勞動者，以及收入較豐的手工藝勞動者，亦多信仰自由主義。自由黨分裂以後，向勞工黨投信任票者，有一大部分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信徒，寧說是自由主義的信徒，這說明自由黨雖告沒落，自由主義之在英國，仍有其不可輕視的勢力。

當兩大政黨輪流統治英國之時，他們對於國事的見解，不獨內政方面，即外交方面，亦彼此一致，從無了不得的出入。十八世紀的英國，支配其外交政策的事實，是英法的對立。這個事實，隨着一八一五年拿破崙的滅亡而失其存在；法國稱霸全歐的企圖，既已歸於泡影，而法國的工業主義的

發展所採取的途徑，又與英國截然兩樣，在國際市場中既不致彼此對立，英國遂拋棄其原來的外交政策，永遠不想加以恢復。自一八一五年以後，英國以盡可能的避免參加歐陸的政治鬭爭，爲其外交政策。對於神聖同盟以及對神聖同盟的反動力量，他俱袖手旁觀，不與實際的援助，卻趁着這個機會，以全世界爲目標，埋頭於經濟發展。這樣過了不少時候，歐洲竟沒有可以引誘英國變更其外交政策的局面發生；因爲非等十九世紀後半德國勢力的擡頭，歐洲絕對缺乏力能雄霸全歐或奪取英國的世界貿易之國家。德國崛起而爲世界強國及工業國之時，剛巧碰到以重工業的發展爲基礎的經濟的帝國主義，也光臨這個世界，根據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理由，德國天然需要向海外發展，建立廣大的殖民帝國，並從經濟落後的國家取得適當的市場與穩固的原料來源。而早走一步，僥倖領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的英國，則覺得德國的擡頭，不論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都使其地位感受絕大的威脅，因而很自然地與德國對立起來。這種對立，便引導英國重新參加歐陸的政治鬭爭，一九〇三至四年與法國締結協約，一九〇七年與俄法共締三國協約，總之，替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奠就了基礎。

及助法國推倒德國以後，英國暫時已不必對德國心懷疑懼，且戰後歐洲的局面，曾有一時預示法國將藉與新興國家間所締結的同盟，握得歐洲的陸上霸權，故戰後的英國，遂一變其戰前的態度，對德國事事寬大，而對法國給與德國的待遇，則不甚贊同，不過尙不致與法國作顯明的衝突。原來法國與英國的見解不同，英國相信德國對歐洲和平的威脅業已成爲過去，法國卻以爲這種威脅依然存在，所以處處與德國爲難，坐視新創的德意志共和國在風雨飄搖之中，而不加援手，卒以促成一九三三年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撫今追昔，法國應亦自悔失計罷。

自從大戰終了以來，英國又欲重返於往昔的政策，但他既爲國聯的會員，對於凡爾賽和約及其他和約的條件，均負有維持的義務，故雖試圖閉門不問歐陸的事情，終難如願。英國之意，雖欲極力避免再受新條約的束縛，例如維持東歐現狀的條約，就因其拒絕參加『東羅加諾』會議，得脫身事外。然而對於意在保障西歐和平解決辦法永遠有效之羅加諾條約，他就欣然簽字其上，誓願恪守，因他認這個條約有關歐洲經濟繁榮的復興，與德國的重建，所以又不恤受其束縛了。再，英國的統治者，與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一樣，對於蘇俄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甚烈。俄

國革命後最初數年，英國曾附和其他資本國家，共同煽起蘇俄的內戰。自此以後，他對蘇俄的態度雖因政府的更迭而有異同，但從大體上說來，英國究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國家團體中的一員健將，對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傳佈，遏止不遺餘力。而英國人閉門不問歐陸事情之願望，乃益難實現了。

愛爾蘭

大戰以後，英國對國外政局，已有不易應付之苦，不料正在斯時，帝國內部又發生重大糾紛。愛爾蘭鬧着要自治，閱時已有一世紀之久，這種要求，當大戰猶在進行之時，即一九一六年，竟爆發而為愛爾蘭革命，事雖不成，但愛爾蘭人要求自治如故。故大戰終止以後，英政府知愛爾蘭人之不可以武力壓服，遂於一九二一年慨然承認其自治，醞釀多時的愛爾蘭自由邦，於焉成立，為大英聯邦中自治邦之一。自從一九二二年英愛間的協定訂正之後，愛爾蘭自由邦的憲法遂規定愛爾蘭得享受澈底的自治，但因協定中規定愛爾蘭的議會，必須舉行效忠英皇的宣誓典禮，愛爾蘭的政府，必須按歲攤還英政府在過去期間改進愛爾蘭農民地位之費用，故此後英愛間仍屢起糾紛。愛爾

蘭自由邦會要求脫離英帝國而獨立，但英政府堅決予以拒絕；及至一九三二年，凡列拉（De Valera）政府有鑒於嚴重的農業恐慌，拒絕履行對英政府繳納年款之義務，於是英愛兩國之間，遂發生猛烈的爭鬪。英國對來自愛爾蘭的進口品課以高率關稅，藉施報復，而愛爾蘭人則宣言將反對英國的統制到底，並在凡列拉的指導下，著手某項工作。冀把他們的國家，根據經濟的民族主義的原則，改造得變成自給的經濟單位。

向來的情形，愛爾蘭自由邦所輸出之農產品，主要的是牲畜，幾佔全部農產品百分之四十五，而且大部分銷往英國，故自英國對愛爾蘭的農產品舉行抵制以後，愛爾蘭自由邦就遭遇絕大的經濟困難；農產品輸出額之傾跌，直接引起農民購買力的減少，間接引起都市失業人口之增加。還有一層，愛爾蘭自由邦雖然是一個農產品的巨大輸出者，但食糧卻十分欠缺。農民只能生產馬鈴薯，以及飼牲畜用之燕麥、乾芻等；小麥可說絕無出產，一切雜糧除雀麥以外，產額都非常稀少。總之，愛爾蘭的種植品，其總價值僅為牲畜的總價值三分之一而弱。所以愛爾蘭自從喪失其出口貿易以後，不但購買製造品的能力隨以喪失，就是比製造品更為重要的食糧，也沒有能力購買了。

當著者執筆之時，英愛間的爭端，尙未覓得解決的途徑。從日下的情況看來，愛爾蘭自由邦的經濟的前途，實很可悲觀。愛爾蘭的勞工黨，以民族主義爲標榜，始終擁護凡列拉的政策；然而愛爾蘭的勞動者與農民，則已不甘在重重經濟困難之下，只作宛轉的呻吟；他們正在對政府堅決地要求援助。可是愛爾蘭政府因收入減少之故，國庫一貧如洗，絕對沒有能力滿足他們的要求。很顯明的，愛爾蘭的經濟能力，尙不許其脫離他國而獨存，倘如脫離他國而獨存，人民的生活標準就非每況愈下不可，至少在此後一定期間內是如此。英愛間的交易，無疑地可使英國及愛爾蘭自由邦，受經濟上的利益；而愛爾蘭的經濟的民族主義，與其說是從真正的經濟上的需要出發，毋寧說是從政治上的情感出發。所以，縱使英國的政府被愛爾蘭人對凡列拉的民族主義的熱烈的信仰所激怒，始終抱着極端的态度，拒絕一切調停，著者仍希望英愛間的爭端，能在最短期間內解決，庶不致貽兩敗俱傷的後悔。

帝國內部的第二個重大問題，使大戰後的英國難於對付的，是印度問題。不過這個問題，似已落到本書範圍以外，因為印度問題與其他的東方問題有連帶關係，欲想不牽涉其他的東方問題而詳細闡明英印間的關係，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須知道印度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與印度新憲法有關之種種懸案，已引起英國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的重大問題就是了。原來印度，前面已經說過，是英國的出口貨，尤其是棉織品的最大市場。但在大戰時，印度國內棉織工業，已大有進步，自一九一八年以後，進步如故，同時日本的廉價棉織品，又開始在印度作大規模的傾銷，成為英國的棉織品的勁敵。印度的製造家，主張對英貨與日貨，都課取極高的關稅，藉以保護自己的工業。以此，英國雖繼續握着對印度的統治權，也不能不承認印政府的關稅自主，坐視印政府應印度製造家的堅決的要求，課英國的貨品以保護關稅，而無如之何。幸渥太華會議席上，印政府允以特惠稅率待遇英國的貨品，這使英國的出口貨，在印度市場中獲得有利的地位，不須擔憂日本貨的競爭。唯印度所以保護國內工業者，仍屬無微不至，印度人民對政府給與英國貨以特惠稅率之舉，又嘗為猛烈之反對，所以英國貨在印度市場中的地位，尚不容十分樂觀。

不寧唯是，印度同中國一樣，常常用抵制爲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在過去期間，印度進口商人拒絕購買蘭開夏（Lancashire）出品之事，幾於記不勝記，同時甘地（Gandhi）所倡導的以手織機出品代替舶來品之運動，又在民間佔極大的勢力。於是，英國貨品在印度的市場，遂一天蹙如一天，時至今日，英國顯已到達不容印度市場再縮之地步。惟英國廉價棉織品之對印輸出額，固已一落千丈，而且照情形看起來，將來似乎不會有什麼轉機，但從大體上說起來，英國對印的輸出貿易，還不小。這種輸入貿易，就給與英國應付印度民族主義者的要求之政治方針以莫大的影響。頭腦頑固的人，主張壓平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藉武力打開英國貨在印度市場中的出路；而大部分的政治家，以及與對印貿易有密切關係之出口商人，則對這種手段的實效抱着極大懷疑，故贊成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過去期間的圓桌會議，以及此刻正在進行中的關於印度新憲法的創製的會議，將來是否能夠促成英印間的妥協，尙有待於日後的事實來證明。據著者的意見，這也許是可能的。因爲日下的印度，其團結力尙設不上舉行公開的革命，而對於要求英國完全退出印度之舉，又有多數人不願表示贊同。印度所希望的是自治；只要英國肯略與恩惠，他們無有不願與英國妥協。

印度的意見，向來十分紛歧，尤其是回教徒與印度教徒，意見永遠不會有融洽的時候，所以英國將來如被捲進第二次大戰的漩渦，情形當然很難講，否則，將來英國與印度之間，至少必能維持暫時的妥協，斷不致趨於顯明的決裂。還有一層，至今尚保有相當勢力之印度的王侯，極不願民主主義的制度，以民族主義運動為護符，在印度境內獲得穩固的根基，而這些王侯的態度是親英的，這就使得英國對印度比較激烈的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愈加易於應付。末了，我們須知可以削弱印度的民族主義的力量，不只限於人種上與宗教上的差異，同時還有階級利益的衝突，印度棉織工業界的雇主，一方面固然帶着民族主義的氣分，但在另一方面，卻唯恐以極低的工資所雇得的勞動者之勢力過強，將來難於駕馭，故所以束縛之者不遺餘力。這是英印間將來的關係，至少當可暫時妥協之另一個要素。

帝國主義與投資

本書因被性質所限，除印度因與英國國內經濟情形有非常重大的關係，特另闢一欄外，對於

全部的帝國內部問題，未便一一盡述。其實，帝國內部之一般的經濟關係，在本章起首兩節中，業已略述梗概，而在本書以後說到「歐洲經濟聯盟」的計劃，以及意欲維持並發展對歐洲及對屬地的經濟關係的英國之困難情形時，又將再度提出討論，所以在這裏，似已無庸作更詳的論述。唯有必需補充者：歐洲諸國之中，在從前，固然要推英國是最早的擁有廣大的殖民地的國家，就是把以前的情形撇去不講，單講現時的成績，英國也不見怎樣弱如人家。十九世紀末了三十年中，大英帝國的屬地，面積增加四百七十五萬方哩強，人口增加八千八百萬。換句話說，英國在這三十年中所獲得的屬地，面積佔現今屬地總面積三分之一，人口佔現今屬地人口總額四分之一。降至二十世紀，英國的屬地仍續有增加。截至一九一四年止，英國屬地的總面積為一千一百二十五萬方哩，人口總數為四億一千七百萬，就中英屬印度的人口居其三億一千五百萬；又屬地的人民，除六千萬弱為白種人外，其餘均屬有色人種。大戰使英國以管轄委任統治地的名義，獲得不少新領土。到了最近，即一九三三年，把戰後的獲得計算在內，英國的屬地，人口統計超過四億五千萬，面積統計超過一千三百萬方哩，無論人口與土地面積，均遠出其他任何殖民帝國之上。即使如法國那樣，在大戰

爆發前三十年中急起直追，結果在世界各處，特別在非洲與印度支那一帶，獲得廣大的屬地。一九一八年以後，又從戰前的德意志帝國手裏，獲得不少委任統治地，究竟也不及英國。

這樣，英國的帝國主義的進展，其速度誠非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可同日而語，與這種帝國主義的進展同時發生的，是海外投資數額的膨大。其實，英國的海外投資，並不是十九世紀末了二十五年中的新事業。緊承着拿破崙戰爭的結束，英國就已開始向海外大規模投資；當一八七五年時，英國投向海外的資本，已達約十二億鎊之多。此後與年俱增，尤以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前後十四年間，英國的海外投資總額突飛猛進，終於以四十億鎊的數目，被推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次於英國的債權國是法國，約十八億鎊。再次為德國，其海外投資事業，雖比法國為遲，但海外投資總額竟也達到約十二億五千萬鎊之多。至如美國，那時還是個債務國，這是因為大戰前的美國，為要促成自己的經濟發展，必需輸入資本之故。

像這樣投向海外的資本，是能够滋生利益的；這種利益，便是英國每年購買輸入品的大部分經費所從出。當一九一四年時，英國的海外投資總額中，投在帝國內部的差不多居其半數，投在

美洲的居整整的半數，就中尤以投在美國的爲最多，幾居英國全部國外投資額五分之一，剩下的數目，則分投於加拿大及拉丁亞美利加各地。投在歐洲的比較的少，一共只有兩億鎊有餘。但法國投在歐洲諸國的資本，就要佔全部國外投資額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如德國，則以中歐與東歐一帶，爲其最重要的投資範圍。以此之故，就海外投資的領域而言，英國與歐陸的列強是不致發生怎樣重大的衝突的；而且自大戰以來，這種局面依然被維持着，因爲大戰以後，英國可供輸出之資本，已視前退步，這種資本，大部分投往帝國內部與拉丁亞美利加，較小部分投往遠東，對於歐洲各國，英國從來不曾給與長期的借款。故英國在歐洲方面的投資，大都是短期性質。至投資的方式，則或爲商業上的往來，如賒給歐陸各國以貨品之款，或由英國的銀行貸給歐陸各國，尤其是德國的銀行以現款。由此可見居於海外投資者的地位的英國，其依賴於歐洲各國之繁榮者，遠不及依賴帝國內部及拉丁亞美利加之繁榮爲切。而因接受英國大部分資本的國家大抵爲農業國，他們對英國的負擔，已因農產品的跌價，愈加繁重，故英國的海外投資的利益，也隨之而發生動搖了。

很幸運，不管世界恐慌的時期怎樣長久，英國的海外投資之滋生固定利息者，在過去期間竟

絕少收不回來之情事，這是與英國之放棄金本位有關的。因為英國貸給外國之借款，大都以金鎊為標準，而非以實金或債務國之貨幣為標準，所以金鎊的跌價，多少可以使債務者減輕一些負擔。英國自抑低金鎊的價格以後，當然不能不犧牲一部分對債務者的權利；但金鎊不跌價，則債務者無力履行償付義務之事，必將漸開其端，循至愈演愈烈，無法遏止，與其受此種損失，何如犧牲一部分權利之為愈乎？所可慮者，假使世界恐慌長此繼續下去，在重重困難中的農業國，究能繼續維持其對英國的償付能力至若干時日，實屬一大疑問。因了這個緣故，特海外投資的利益為挹注的英國，對於農業國繁榮的恢復，不消說抱着非常熱切的關心。自農產品跌價以來，英國大受其利，近幾年來英國貨品進出口貿易不利的差額之低減，可說全出農產品跌價之賜，不過一想起海外投資利益，則英國人的大願，又在此而不在彼了。

十六 蘇聯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或蘇俄）即將其在亞洲的領土撇開不算，單講在歐洲的領土，也得算是歐洲最大的國家。若把在亞洲的領土計算在內，則總面積是八百五十萬方哩，爲歐洲連歐俄在內之總面積二倍有餘，較之北美洲的總面積，也大得多。這一事實——廣大的領土——是研究現代俄國者所不應忽略的第一要素。俄國曾在大戰中喪失不少領土，較其他任何交戰國所喪失的爲多，可是統計這種喪失了的領土，竟只佔全部領土百分之三。

在這廣大的領土中，住着一億六千二百萬的人民，——遠出北美洲的全部人口之上，但較歐洲除蘇聯外的人口總額，則少得多。原來蘇聯的人口密度，僅爲每方哩十八人，較歐洲除冰島外之任何國家爲稀。可是，蘇聯各地地方的人口，疏密極不一致。歐俄的人口，較亞俄的人口稠密得多。亞俄有一大塊土地，宛如無人島一般，而歐俄則不但有幾個大都市，例如莫斯科與列寧格勒（Lenin-

strib), 人口之稠密, 凌駕西歐的大都市而上, 即以鄉間而論, 亦多人煙繁密的村落, 不過村落與村落之間, 往往間着一塊綿亙數哩之遙的無人區域。由此可見蘇聯有許多區域的人民, 其彼此隔閡的程度, 還不及蘇聯人口數字所示之甚, 況蘇聯的農民, 不論其爲土地勞動者或畜牧勞動者, 向來保持着不時遷居的習慣, 這也是蘇聯人民的隔閡不致流於澈底之一因。

蘇聯的人民, 種族與方言, 都十分複雜。最多的爲各種式樣的斯拉夫族, 佔全部人民百分之七十以上; 他們操着大俄羅斯語, 或類此的語言。在帝俄時代, 大俄羅斯語是唯一的正式的語言, 如出版界及學校, 都必須採用; 因此, 一般人都以爲俄國的全體人民, 除少數部分以外, 都操着同樣的語言。然而這種見解, 後來竟被革命證明其不確。除斯拉夫族以外, 俄國的印度歐羅巴人種中, 就要算日耳曼民族爲最重要, 大部分住在伏爾加河附近, 次爲住在該處南方之亞美尼亞民族, 雖則在這兩個區域內, 還住着許多其他的民族。自伏爾加河而東, 深入中亞細亞, 爲混合的土耳其民族與韃靼民族的住區, 其北爲各種式樣的蒙古人種的住區。此外, 在俄國的南部, 又住有喬治亞民族, 與俄國西北境的芬蘭民族極爲相似。自此以下, 則爲北部西伯利亞雪地裏之各種民族, 他們在人種上

與語言上，都已不能形成重要的單位，有幾種簡直與世界隔絕，無從查考。從列甯格勒的北部人民訓育學院所採用的語言不下五十種之多一事看來，蘇聯北部人種與語言之複雜，實足驚人。末了，蘇俄境內又住有數約五百萬的猶太民族，他們在帝俄時代，備受壓迫，並須住在自波蘭起至大俄羅斯省止的限定的區域內，不得遷出界外；但自革命以後，猶太人已可自由移動，在克里米半島上確立他們廣大的農業殖民地了。

蘇維埃國家是反宗教的。革命以前，俄國人民大部分信奉希臘正教，小部分信奉天主教及路德教，天主教徒以西部爲多，而路德教徒則集中於北部，此外又有一大批回教徒，及少數佛教徒。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蘇俄的反宗教運動漸趨緩和，上述五種宗教以及其他的宗教之信徒，已准保持其舊日的信仰，唯經過一番變動以後，各種教徒的人數，當然無從知道。

由上可知蘇俄的少數民族，確是異常的多。但是一則因爲蘇聯對於非俄國化的文化，非但不加遏止，反極力加以獎勵，二則因爲一九二三年的憲法，對於蘇聯中的各邦，賦與極大的自由發展的權利，故蘇聯的少數民族問題，究與其他國家例如羅馬尼亞之少數民族問題不同。說蘇聯境內

絕對找不出分離的情感，固然近於武斷，因為從烏克蘭及喬治亞兩邦，都可看出有此種感情存在，其他的區域，諒亦難免；然而此種感情，力量十分薄弱，範圍亦十分有限，這是不容否認的。

蘇聯本是個農業國，人民恃耕種爲生者，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但蘇聯的土地，並非全部適於耕種。統計這個國家的森林區，不下二十億英畝，幾佔全境五分之二，就中四分之三在亞俄境內，四分之一在歐俄境內；而森林區以北，靠近北冰洋一帶，則一望皆屬苔原，即欲培種森林，亦有所不可能。以此，蘇聯可耕之地（註一），包括所謂『黑土』地帶在內，一共約只三億五千萬英畝，若連能夠間接生產食品的土地計算，則歐俄南部、中亞細亞、西伯利亞等處之一望無垠的草原，也不妨列入；然而這些草原，尤其是在亞俄境內的，大部分完全依靠不可恃的天時，假如歷久不雨，那些草原就可立即變成不毛之地，從前如此，現在未嘗不如此，所以蘇聯的牧場的統計，對於蘇聯的農業，是沒有重大關係的。在全部可耕之地中，用以培種穀物者約居四分之一；主要的農作品爲小麥及黑麥。用以培種『工業』的農作品者，約只佔十分之一；這種性質的農作品，以重要的等級順次排列，爲向日葵、亞麻、棉花及甜菜等。牲畜的產量本很豐富，但在過去五年之中，已呈極大的衰落了。

除上述各種物品之外，以木材、煤油、皮革、魚等物產爲最重要。煤及其他礦產品之產量，雖在逐漸發達之中，究尙不能與先進工業國相比。但蘇聯是以追上或超過先進工業國自矢的；據最近的統計，蘇聯人民之受工廠雇用者，已與兩千萬的數目相去無幾。而且自五年計劃開始以來，蘇聯採取先進工業國的辦法，專集中其注意力於重工業。一部分非農業性質的生產，固然仍如往前樣，由鄉村人民所組織之『農業合作社』(artels)處理，但此種事業，究已較前大減。這說明蘇聯的工業，正在對準大規模化以進行。蘇聯的國外貿易，因受政治的影響，迄無這樣的發展。主要的輸出品爲農產品及本節開端所列舉的各項貨品。主要的輸入品爲各種機器。

然而蘇聯雖已開始實行大規模的工業化，我們若欲在這裏估計其生產的可能性，這就未免白費氣力，因爲蘇聯的各項生產，現在都只初露端緒，並不會發生若何確實的效果。例如，烏拉嶺的礦產，甫於最近著手開掘，我們當然無從知道其對於蘇聯的國富究有若干貢獻，卽如木材一項，大概的情形雖已爲我們所洞悉，但因交通之不便，蘇聯的木材富源對於蘇聯的貢獻，決沒有像表面上的情形之甚，故仍不能據以爲估計蘇聯生產的可能性的材料。蘇聯的交通，可說不便之至，推原

其故，疆域的遼闊，國庫的支絀，都應負部分的責任。尤其是鐵道，因為有這兩重原因，很不容易維持營業。蘇聯的國境如其遼闊，幾條少數鐵道的建築，無濟於事，而欲一下子就築成遍佈全國的鐵道網，則又苦於沒有這種財力。或有人說，蘇聯的廣大的平原，絕少傾斜之處，這就給與鐵道工程以莫大的便利；此話固然不錯，但我們須知蘇聯的鐵路工程，便利之處固多，困難的地方亦不少。例如西伯利亞大鐵道的大部分基地，必須用終年凍結的土壤敷設起來，這是如何費力而日費錢的一件事！以此之故，蘇聯的鐵道綫，西部還可一觀，廣大的東區，就貧乏到極點了。

所幸蘇聯可供運輸的水道，為數甚多，故國內交通，尚不致因鐵道綫的貧乏而陷於絕大的不便。然而這只是指國內交通而言；對於國外貿易，那些水道就絕少貢獻，因為蘇聯大部分的河流，不是注入給深鎖在陸地內的裏海，便是注入終歲不開凍的北冰洋。而且這些河流的本身，也往往會部分地凍結起來，阻礙航運的進行。在過去一百五十年當中，爲了要獲得一個不凍的良港，曾費去俄國政治家的無數心血，而俄國之對海參崴抱着戰戰兢兢唯恐或失的態度，多半就因為這是俄國在東方唯一的不凍口岸。又俄國的公路，亦十分窳劣。可供造路用之石塊與沙礫，都付缺如。因此

之故，到了冬季，當積雪凍成堅冰之時，尚可藉冰橇利便交通，一到春秋兩季，大部分的道路就很難行走，至如夏季，則又塵埃蔽天，低窪遍地，簡直可使行人裹足。有些地方，甚至還停滯在以駱駝代步的階段。航空事業雖已著手推行，但猶幼稚到可憐。

從前面所講的情形看來，蘇聯決不能說是自給的國家。其實，只要有充分的交通工具，替蘇聯遼闊的區域調劑貨物的有無，蘇聯的自給的可能性是很強的。倘使交通工具充分的話，黑土地帶就可把剩餘的食糧，運往北部，養活該處嗷嗷待哺的人口，木材、礦產、棉花等物品，也可藉以獲得圓滿的流轉，收供求相應之效。否則，蘇聯人民便難免永遠停滯在極低的生活水準。坐視局部的或普遍的貨物恐慌陸續發生，而無如之何了。

然而蘇聯有一種極大的財產，足以自豪於人，那就是人口。近年以來，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為蘇維埃關於撫養嬰孩的制度，已把嬰孩的死亡率（註二）減至絕低，蘇聯的人口，竟至以每年二百五十萬的速率累加。這種人口，未必都一個個都十分聰明幹練，但可說一個個都有用，都可以受國家的調動，作無論那樁事業中的一分子。俄國歷來的統治者，可於咄嗟之間，募集數百萬的大軍，

——據說推翻沙皇政府之役，人民應募充兵士者，數達一千四百萬名——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代俄國的顯著的特點，是共產主義的政體。所以在下面，我們將把話說回來，講講他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此以先，我們必須知道俄國本有幾種傳統的特點，這些特點，便是俄國易於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而不易變成他種性質的國家的由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對於自十五世紀以來向在專制政體下生活着的民族，原沒有什麼不便；而國家政體須以人民生活為前提這種觀念，從只曉得彼得大帝、喀他隣二世那些名字的民族的後裔看起來，自也不覺得有什麼可異了。

並且，平凡的俄羅斯人民，卻賦有不平凡的社會合作的思想，這一點已可使俄國變成蘇維埃制度的適當的根據地而有餘，何況商業性質與工業性質的資產階級那樣的東西，在俄國是沒有的，俄國有的是最易受各種新思想感染的作家與官吏所組成的『知識階級』，這一事實，至少可把西歐各國的任何社會黨面前的種種難題中的一個難題，輕輕解決，而蘇維埃制度在俄國的發展，乃因以愈加便利了。

沙皇時代的俄國

俄國有幾處地方的文化，其實發達得很早。例如基輔，在第九世紀基督教主義尚未輸入之前，就已經十分繁盛。又如下諾夫哥羅，當第十世紀之時，即已有斯坎的納維亞人移居該處，經營商業，以是成爲極重要的商業中心。又如中亞細亞的商業都市，如布哈刺（Bokhara）與撒馬爾罕（Samarland）之類，係隊商的集中地，商業發達甚早，唯此等地方那時猶未隸屬於「歐洲」，故不能併入計算。所以，俄國那時儘多繁盛的都市，上面所舉的基輔與下諾夫哥羅，不過略示一二，非謂俄國繁盛的都市，已盡於此。然而此種都市文化，到了十三世紀，忽被侵入歐洲的韃靼民族，摧殘淨盡。以是談俄國的歷史者，莫不視十五世紀爲俄國現代史真正的開始；那時，有一個能征慣戰的王家，在莫斯科成立起來，勇敢的伊凡一世與伊凡二世（即所謂「恐怖」的伊凡）把韃靼人逐出境外，將俄國南北兩部的大部分土地，劃入俄羅斯帝國的版圖，然後又藉哥薩克人的遠征，開始向西伯利亞殖民。俄國的沙皇，一開頭就採用絕對的專制政體，除北斯哥夫（Pskov）與下諾夫哥羅兩地由

伊凡四世給與自治權外，俄國並沒有第三個自治區域。真正的代議機關是沒有的，議會（Duma）只供帝王諮詢之用，毫無代表人民意志的能力。只有貴族，因歷史關係，得享受參與機要的「特權」；除去這點，沙皇的權力便可說是無限量的大。

自此以後，到革命爲止，俄國有兩件大事，值得我們注意：其一爲俄羅斯帝國版圖的擴大，其二爲俄國之力圖促成自己的西方化。彼得大帝先征服克里米半島，繼又掩有波羅的海沿岸之瑞屬領土，建聖彼得堡（即今之列甯格勒）於其地，作爲俄國的西部口岸。喀他隣二世攫取波蘭的一部分爲己有，這纔使俄國成爲歐洲列強之一。從一八一五年的劃分領土協定，俄國又獲得芬蘭與北薩拉比亞兩地。十九世紀是俄國吞併西伯利亞的企圖進展得非常迅速的時期。自一八六四年起至一八七九年止，前後十五年間，中亞細亞的廣大的區域也脫去部落的統治，改受沙皇的節制。及至十九世紀垂垂向盡，俄國遂完成其征服亞俄的事業，而於一九〇〇年著手建築西伯利亞大鐵道。可是攫取滿洲的計劃，到底敗於日本人之手，從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好大喜功的俄國，第一次受到重大的打擊。由上可知俄羅斯帝國的發展，完全是現時代的事；然而也未必盡然；例如黑

海沿岸的大港敖得薩，其建築的日期，竟遠在一七九四年，

這個巨大的帝國，曾爲西方化的試驗場，每隔若干時候，必發生一次西方化的計劃，現今蘇俄的工業政策，好像只不過是那種計劃的最後一個階段。最先企圖促成俄國的西方化的，是十六世紀的伊凡四世，其時英國人正藉英國莫斯科公司（British Muscovy Company）爲媒介，與俄國開始作商業上的往來。外籍工人開始來俄，俄國開始知道創辦教育，此外爲文字、幣制、以及人民的東方化的習俗，俄國的統治者亦曾設法加以改革。但這些改革，都不見怎樣澈底，因而效果亦頗有限；終十六世紀之世，俄國從國外輸入的制度，還得推一五九七年所輸入的農奴制度的影響爲最大，此種制度，已與奴隸制度爲近，而非西歐中古時代的農奴制度了。

比伊凡四世的時代更爲重要的，是彼得大帝在位之時（一六八五—一七二五）。這個英敏的統治者，很巧妙的把俄國造成西方化的國家。工廠與造船所開辦起來了，教育制度設立起來了，此外還有許多改革，次第見諸實行，就中有幾種會與俄國人民的習慣發生絕大的牴觸，完全靠沙皇個人的努力，始得底於成就。我們須知彼得大帝時代的改革，與其後喀他隣二世時代的改革一

樣，全屬一手所造成。凡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做的，彼得大帝無不做過，因此他的舉動，有時難免流於偏激，但這完全因為他缺乏合作的人，不僅須對俄國素有的腐敗情形作不絕的鬭爭，同時還須打倒那反對他的根本思想的反動勢力之故。那時有所謂「親斯拉夫主義」(Slavophilism)者，極力否認西方文化的價值，反對俄國採用西方文化。此種思想，到了十九世紀，猶佔絕大的勢力，至可支配社會革命黨的全部行動。直至革命以後，始漸漸衰落，終於完全消滅。近來斯太林 (Stalin) 與托洛斯基 (Trotsky) 間的鬭爭，係起於對革命戰略的意見的不同，與親斯拉夫主義是毫無關係的。

不管俄國的統治者怎樣努力於改革，一八五〇年以前的俄國，還是個非常落後的國家，大部的交易，猶停滯於以物易物的階段。少數工業組織，不為國營的工廠，即為貴族所經營的『專有』工廠，其他性質的工業組織是沒有的。工廠的人員，一部分為外籍勞工，還有部分是本國的農奴。卑下的農奴受工廠雇用之後，普通都由工廠供給膳宿，辦法雖然不合於理，然實為現代俄國規模完備的工廠廚房、工廠俱樂部，以及工廠內部家庭性質的事業之濫觴。但這只是十九世紀前半的情

形，後半因俄國不絕從事改革的結果，情形就大進步。自一八六〇年以後，農奴開始獲得解放，同時其他的新事業，也著手進行，就中最重要者，爲維持伯爵（Count Witte）的偉大的鐵道計劃。

然而此類新事業的進行，非有巨額的資本不可。俄國向來是個十分貧窮的國家，那裏來的錢創辦新事業？這就使俄國負了極大的外債。而爲了要償付外債的利息，俄政府必須輸出大量的穀物，藉資抵銷。加以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因美國的穀物開始參加世界市場競爭的結果，穀物的價格大跌，於是俄國也不得不增加其穀物的輸出額（讀者可參照一九三〇至三二年的世界情形）。這種輸出額，不消說都是從過着卑下的生活的農民身上榨取來的；而那時候的農民，解放的費用已給與他們以奇重的負擔，雖在所謂『密爾』（mir）或鄉村團體指導之下，亦絕難增進農產品的產量。故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農民，其困苦誠有非筆墨所能形容。即都市中的勞動者，其經濟狀況亦不見怎樣勝過農民，並絕對不許組織團體，作任何性質的活動。

但自俄國在日俄戰爭失敗以後，帝國的根基就突趨動搖。大都市不時發生罷工，而農民暴動，又盪起於國內各處。在聖彼得堡及其他的大都市，罷工立即變成革命運動。蘇維埃——即兵工代

表會議——曾一度以聖彼得堡爲根據地，指揮全國的勞工。沙皇與其顧問看見這種情形，立即表示願容納人民的要求，實行改革。議會很快的成立起來，立憲民主黨（Kadets）及其他的社會黨，均佔得相當議席。然而一等危險期已過，議會的意見，便又完全受政府的藐視。一切革命活動，都遭壓服，首相斯托里賓（Stolypin）雷厲風行的從事撲滅革命努力；社會黨或被捕下獄，或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其幸而免於斯二者，則大部分遁至國外，躲避國內反動勢力的兇焰。

這便是俄國當歐戰爆發時之情形；歐戰，這樣到底是軟弱而浪費的沙皇制度，趨於崩潰。原來是時俄國動員兵士至數百萬，此數百萬的兵士，在無論什麼時候，總只有三分之一在前綫，其浪費可想。加以交通的不便，大部分的兵士得不到衣食軍火等供給，因此還沒有到達一九一六年年底，俄國國內就已經有要求麵包與和平的呼聲。及至一九一七年三月，兵工代表蘇維埃領導下的彼得格勒總罷工，遂把具有數百年歷史的沙皇政府，一把推翻。一個態度溫和的政府，起而暫掌政權；同年五月，這臨時政府改組爲以克倫斯基（Kerensky）爲領袖的聯合政府，蘇維埃亦有代表參加。

俄國革命

可是那時俄國中心勢力所在，已非臨時政府或聯合政府，而為原來已經存在，以及三月革命以後陸續成立起來，終至遍佈全國的蘇維埃。社會民主黨中的過激派，即所謂布爾什維黨者，其重要分子如列甯等，本來流亡在外，到了一九一七年四月，相率歸國，指導蘇維埃的進行事宜。不過蘇維埃雖然已經有列甯等人作領導，雖然已經有了一個代表大會和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蘇維埃的代表大會，於六月初旬舉行，推出一個執行委員會，與都市勞動者的執行委員會相合作），他們還沒有固定的大政方針。俄國全體勞動者的願望，是和平與麵包；可是他們不曉得用怎樣的方法去得到這些。

克倫斯基政府於六月間受協約國的慫恿，對德軍舉行總攻擊，不料竟碰到悲慘的失敗，俄國的軍隊幾於完全潰散。七月，彼得格勒的罷工潮，為政府所壓服，這給與政府以對布爾什維黨施行報復的機會。惟布爾什維黨在勞動階級中間的勢力，已很盛大，政府對此，不無惴惴於中，因而對於

布爾什維黨，始終不敢爲十分嚴厲的壓迫。不管怎樣，一九一七年的整個夏季，布爾什維黨的思想之在俄國，真可謂速於置郵而傳命，循至全俄的蘇維埃代表，莫不崇奉布爾什維主義。這一事實，使布爾什維黨於同年秋季，直捷痛快的發出了『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口號。

九月初旬，當政府爲了國民會議的召集應採取怎樣的方針與方法那樣的問題，舉行冗長的討論之時，科尼羅夫將軍 (Admiral Kornilov) 叛變的警耗，忽焉傳至。依賴勞動者團體的協助，政府並不費怎樣的氣力，即將叛變一鼓蕩平。而勞動者方面，也因為公然成立軍隊，號曰赤衛軍 (Red Guard)。此後，俄國的物價，一天天的向上漲，民間的生活，一天艱苦一天，農民侵襲大地產之事，時有發生。光陰容易，不覺已到十月，列甯提議布爾什維黨應該站在民衆前面，立即發動革命。黨員還猶豫不敢即決。但距此事未滿兩星期，革命果然發動了。冬宮很快的落於革命軍之手，克倫斯基倉皇遁逃，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就這樣的在十天之中，並未經過激劇的戰鬪，告厥完成。是時留在俄都的外籍新聞記者，至不敢相信革命業已發生，因爲他們平時只曉得革命的形式，是沙袋鐵絲網之類的障礙物，以及兇惡的巷戰，誰料到這次革命，竟並未經過若何的流血，即獲得成功呢？

這次革命的領導權，不消說操在布爾什維黨手中，此事之理由甚多：赤衛軍與彼得格勒蘇維埃，盡在布爾什維黨掌握之中（其時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爲托洛斯基），一也；布爾什維黨對於民衆眼中的罪人，素抱深惡痛絕的態度，並且屢受不被人民所信任的政府的壓迫，因此深得羣衆的同情，二也；而最大的原因，則爲布爾什維黨是唯一的具有明確的大政方針的政黨。這個政黨，是絕對不與其他的社會黨合作的。他與同出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黨（Mensheviks），固如冰炭之不相容，即與實力雄厚的社會革命黨，也只對其中的左翼分子有相當的聯絡，同右翼分子就絕無合作的可能。他所引以爲同志的，是深信其主義的都市勞動者，以及他曾經給與和平的預約券的兵士。兵士大都是農民出身，有時成羣回到鄉間，復爲農民，所以藉着對兵士的聯絡，布爾什維黨就在構成俄國人民的大部的農民中間，佔得相當的勢力。然而一般的說，農民的態度究不甚可靠。十月杪，全俄農民蘇維埃大會忽然分成兩派，左派繼續擁護布爾什維黨，右派卻表示不願擁護了。只有半數農民擁護，到底不是穩妥的辦法。因此到了十一月八日，人民委員會（革命成功後所設立之執行機關）主席列甯，遂頒布一條重要的佈告，將俄國所有土地收爲國有，一面建立

社會主義的體制，一面卻將土地交給農民去管理。這麼一來，布爾什維黨日後當應付重重困難之時，便不愁沒有大部分農民擁戴他們了。

上面所說的重重困難，發生得很早。布爾什維黨抓得政權之後不久，便知會一切交戰國，提議總休戰。這種提議，未蒙各國採納，於是布爾什維黨單獨與德奧議和。起初，兩方面還各以誠意進行和議，但是德國忽然在半路上改變其態度，意欲以對付戰敗國的辦法對付俄國。俄國不服，戰事又起，但以種種關係，俄國終於不得不承認專斷的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一九一八年三月）。因此喪失所有邊境諸省，甚至烏克蘭也被敵人擄去，又如土耳其對高加索境內所提出的要求，俄國也只好一一答應下來。同時，革命的反對者或自己募集軍隊，或借外國的援助，企圖顛覆革命政府那樣的事情，不等蘇維埃政權獲得穩固的根基，即相繼發生。一九一八年一月，科尼羅夫在頓河流域成立白軍，舉行叛變——後來柯氏的位置，由但尼金繼承。同年四月，英國派遣軍隊至穆爾曼斯克（Murmansk）與阿堪遮（Archangel），威脅俄國的北部；日本的軍隊，侵入俄國在遠東的國境；彼德留拉（Petlura）的匪軍，從加利西亞（Galicia）進攻俄國；此外又有逼留俄境的捷克軍，

以西伯利亞的一部分與伏爾加河流域爲根據地，受協約國的接濟，大肆滋擾。此種由反對蘇俄的國家給與接濟，陰謀推翻蘇維埃政府之企圖，全不管大戰業已結束，和平時代業已開始，兀自層出不窮，除上面說過的以外，還有藍吉爾之變，其根據地爲克里米半島；尤特尼克之變，其根據地爲愛沙尼亞；高爾恰克（白軍將領中之最兇暴者）之變，其根據地爲西伯利亞。又如南部的亞美尼亞、喬治亞、阿才倍疆（Azerbaijan）等區域，曾脫離俄國，自立爲共和國，歐洲各國莫不興高彩烈的予以承認。等到大部分的陰謀都歸失敗，忽又有波蘭人大賣氣力，於一九二〇年興兵犯俄，但結果亦無所成，熱鬧一時的反蘇維埃運動，至此始告一段落。自一九一八年起，至一九二一年的初期止，蘇維埃政府有時竟必須同時應付內亂與外患，至半打之多，亦可見其危險爲何如了。

溫斯登·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總不能說是共產主義的熱烈的同情者罷，他的著作對於一九一八至二〇反蘇維埃的白色團體，頗有論述；他把這些白色團體的失敗，歸咎於指揮之不統一以及政治能力的缺乏，而引高爾恰克虐待西伯利亞農民，及但尼金允許以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歸還原來的地主兩事爲證。如邱氏所述，可見沒有一個白色領袖有成功的希望，無怪轟轟

烈烈的反蘇維埃運動，漸漸消沉，終至一敗塗地，只有波蘭人曾於舉行反攻時，予俄國以重創，唯亦僅能保持他們的都城華沙使不陷於敵手，並非在反蘇維埃運動上有若何的成就。然而，爲要削平這些紛至沓來的內亂與外患，俄國不消說是出了很大的代價。第一，他必需有一枝軍隊，藉以捍衛根基未固的革命。謝謝托洛斯基的努力，這一點是不成問題了。但馬上就來了第二個難題：那巨大的紅軍，以及那曾經發動革命的都市勞動者，是不能沒有給養的；俄國的經濟，已在一年前完全崩潰了，況且歐洲各國正在對他使用大戰最後兩年中對付同盟國的手段——封鎖，他將怎樣養活那些紅軍與都市勞動者呢？而且顯明的辦法，是把國內所有的給養統集中起來，然後以嚴密的方法，計口授糧，並按照職務之重要與否而定授與的先後，凡在捍衛革命上擔任最重要的職務者，領受給養亦最先。一九一八至二一年俄國所實施之『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政策，本質上無非是集中給養受國家統制那樣的政策的推廣，而集中給養受國家統制之政策，則爲大戰未了時歐洲大部分交戰國所曾經採用過的。我們通常總以爲布爾什維黨抓到政權之後，必趕忙將一切事物都加以社會化，孰知亦未盡然；他們的第一個經濟統制機關『維斯葉加』

(Vesnyenka) 固然成立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但經濟上的重要項目穀物與商船，則一直等到第二年二月，方纔國有化，國外貿易到六月方纔國有化。又如各項工業之國有化，雖早已在逐漸推行之中，但將一切工業統統收爲國有之佈告，則直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方纔頒布，這個佈告的一部分的意旨，是在挽救那時的怠工以及一切妨害工業效能的舉動的。

原來醉心革命的人看見舊制度已被推翻，勞動者統治國家之新制度業已開始，狂喜之餘，立即動手攫取工廠，置於『工廠委員會』管理之下，而這些委員會的主持者，則大都只具革命的熱忱，毫無組織能力。況革命前的工業專家，俱屬中等階級，幾可說無一人贊成革命，革命以後，相率遁至國外，其留在國內者，又不但沒有替新制度效勞的意思，並且受反蘇維埃國家的嗾使，大肆破壞新制度之陰謀。俄國當一九一八年的夏季，分子真可說複雜到極點，有熱烈擁護新制度可是能力十分薄弱的革命者，有革命政府的偵探，有反革命團體的間諜，還有深信革命前途毫無希望的悲觀主義者。爲要肅清反革命的勢力，蘇維埃政府終於用嚴厲的手段，實施集權化的工廠管理制度，以及常與『奇卡』（Cheka）（蘇維埃偵緝反動分子之機關）這個名詞發生結合的報復政策。

一九一八年九月，爲俄國『赤色恐怖』真正開始之期。對於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重則處以死罪，輕則加以流刑，再輕則逐出國外。可是革命雖因此漸趨穩固，俄國究難免喪失大部分有組織能力的工業專家。影響所至，當俄國百端待理之時，俄國的勞動者也不得不在乏人指導的環境裏，自己動手學習工業了。

然而自一九二〇至二一以後，俄國的國外情勢，忽然緩和起來。封鎖解除了；俄國先後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一九二一），土耳其（一九二一年，當南方的三個共和國加入蘇維埃國家之後），波蘭（一九二一），德國（一九二二）等，陸續締結條約。就是不會與俄國正式締結條約的國家，也開始承認俄國爲經濟上的隣國。英俄通商協定，締結於一九二一年三月，繼續有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而因在此以前，曾有英國抗議蘇維埃政府拘禁兩名英籍工程師無效之一幕，到了是時，英國遂表示不願繼續通商協定，藉示報復。英俄間的商業關係，以此暫告中斷。不過一到同年七月，英國就取消對俄貿易的禁令，而與俄國磋商新的通商協定了。同時，以世界經濟會議爲居間，美國也在倫敦與俄國舉行關於商業借款之談判。除此以外，完全承認俄國或因商業關係承認俄國的國

家，還有德國、奧大利、意大利、匈牙利、法國、日本、斯坎的納維亞諸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

這樣，俄國終於同世界各國，建起了和平關係，此種關係雖說不上怎樣美滿，但已儘量使俄國取消戰時共產主義的制度。這是俄國所日夕想望的，因為具有那樣緊張的動機的統治制度，已絕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在從前，爲要養活紅軍與都市勞動者，俄國曾向農民嚴厲徵發食糧，此種手段，後來漸爲農民所痛惡，且因工業生產的崩潰，農民無法以穀物換得日用品，於是怨望之心，與日俱增。同時貨幣問題，又使俄國的經濟制度，益陷於嚴重的困難。所以自一九二一年起，蘇維埃政府衡情度勢的結果，卒將列甯的新經濟政策付之實施，對私有企業性質的商人頒給短期的營業執照，俾農民可用自己的生產品，換取爲自己所必需的日用品。並且開始實行穩定貨幣的計劃——

第一次發行金 червонец (值十盧布) 在一九二二年。因此，俄國的經濟局面，始得暫保小康。可是另一個難題，又隨之而起；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之時，都市中瀕於飢餓的人口，爭出高價購取農產品，農民看見這種情形，都竭力增加農產品的產量，但工業品的產量，則因俄國缺乏充分的資本，不能與農產品的產量相應，結果，農民所必需的製造品，價格一天天的往上漲，卒以釀成一九二

三至二四年的『剪刀恐慌』(scissors crisis)後來蘇維埃政府用盡各種計策，纔將這個難題解決。可是依然未能解決俄國的根本難題。一九二四年一月，列甯遇刺得免，但接着就患中風逝世，於是他的遺志，只好由他的後繼者去完成了。

所謂俄國的根本難題，不消說是貧乏。豐富的製造品，為增進人民的生活水準所必需，但如果沒有充分的資本，以及可供維持工業人口用的食糧，則豐富的製造品就無從生產。俄國的資本怎樣呢？可供維持工業人口用的食糧又怎樣呢？這種食糧，必須由農民供給，而在個人單位的生產制度下，農民是很不願意這樣做的；工業品的價格，因生產量的短少而逐步上漲，農民覺得生產額外的農產品，未免太不上算。可見那時候的俄國，可供維持工業人口用的食糧，實大成問題。至如資本情形也同樣。俄國假如不先籌巨額的款項，劃作『固定資本』——凡如鐵道、工廠、電氣化等，俱屬於所謂固定資本——那麼在經濟上，就極少迅速進展的希望。一個貧窮的國家，普通總藉借外債，來促成其經濟發展，但俄國卻沒有這種福氣，因為世界上的有錢國家，都對之抱極大的惡感，他們說：蘇維埃政府要借錢嗎？請他先把沙皇時代巨大的舊債承認下來再講罷。以此，蘇維埃政府遂只有

從國內極有限的財源，「省下」一筆本錢，作購置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舶來品之用。如輸出多量的食糧、煤、油、木材等，藉以償付輸入品，便是辦法之一，但是這一辦法，徒使農民像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中的農民一般，益陷於不利的地位而已。

五年計劃

不管怎樣，俄國欲促成其經濟發展，不外二途：其一為利用國內有限的資本，其二為利用外資：開始於一九二八年的五年計劃，原則上便是採取第一種途徑的。以自己的資源為主，以外國願意貸給的短期借款為輔，創立西方化的工業制度，這可說是五年計劃的骨幹。當一九二七年時，俄國就已著手研究自己生產的可能性，接着便訂立計劃，規定各種工業在此後五年中所包羅的範圍。第一次五年計劃所最注重的，不消說是重工業——這是工業國的基礎。但對於農業，也未嘗不予以極大的注意，務使農業能夠達到增加生產，尤其是社會化的生產而後已。此事之動機，一部分是政治的。原來俄國革命後將土地給與農民這個辦法，自共產黨看來，只是暫時的辦法；共產黨及其

最高領袖列甯，都竭力反對俄國革命在俄國建立如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所建立般的有產農民的社會。起初，他們想藉大規模的國有農場的設立，對農民收潛移默化之效，這就是說，使農民於不知不覺中，信任社會化的方法。可是這種希望，並沒有實現，而變通辦法的新經濟政策，則徒使農民離社會化益遠，富農 (kulaki) 與貧農 (peredniaki, bedniaki) 間之貧富差異，益加巨大。因此，五年計劃農業部分的方針，不僅在使農事益趨於集團化，同時並在求得鄉村農民貧富的平均，而為要達到後者的目的，蘇維埃政府除自己鑒別富農與貧農的等級，加以不同的待遇外，並獎勵鄉村農民亦從事於此種運動，事實上，簡直把富農看作罪人。

大體上，五年計劃的工業部分可說是成功的，且成功的程度，超出任何留心蘇俄事情者的想像以上。縱使有幾項工業，其成就還沒有確實的數字可查，縱使工業生產難免有一些錯誤，而且生產品的品質，猶萬萬趕不上西方的先進國家，但五年計劃的工業上的成就，究屬可以驚人。(第二次五年計劃，以交通及輕工業為其最注重的兩點，於一九三二年底開始實施)。至如農業，成就比較的少。農村社會化的計劃，是一九二九年底著手實行的，因為過於操切，不久就需要修改；原

來那個計劃開始以後，有許多農民不了解政府的意思，憤而輟耕，以致穀物產額低落，牲畜也因爲被屠殺的太多，產額大減，故俄國於一九三〇年春季修改其農村社會化的計劃，實係不得已的舉動。加以農產品的價格，其時已呈猛烈的傾跌，這使俄國不得不輸出更多的食糧，藉以購買必需的機器。在這樣的情形下，大部分國營農場與穀物工廠就變成浪費的組織，難以管理得法；況且『集團』農場對於俄國農民傳統的習慣雖然沒有不合的地方，但俄國的農業生產竟在一九三〇至三二這幾年中，呈顯著的退步，將來能否迅速復原，正是未可逆料，此誠蘇俄之一大隱憂矣。

同時，俄國的對外關係，也不見怎樣美滿。前面說過，俄國曾與各國訂立通商協定，因此獲得各國勉強的承認；然而，他們顯然只承認蘇維埃制度，如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的事實所昭示，不能用國外的武力推翻，也不能用國內的陰謀推翻，並非真的對俄國表示友愛，或真的承認蘇維埃制度。不幸的『事變』時有發生，一九二六年英政府派遣警察搜查雅各斯商館（Arcos House）（俄國駐英商務機關），便是一個例子；此等事變，一部分起於對俄的不滿，還有部分起於對第三

國際的活動的憎惡。俄國之拒絕加入國際聯盟，從歐洲諸國看來，當然是一種太不客氣的舉動；其實俄國也未嘗不派遣全權代表，出席於一些國際會議，例如一九二七年的裁軍會議以及同年的世界經濟會議，均有俄國的代表參加，只因這些代表，其對社會的觀念，與其他各國的代表截然不同，所以他們的演詞，也只能使同席的外交家，相顧錯愕而已。

俄國在國外的革命宣傳，自從很早的時候以來，就已經冷下去了。起初，共產黨以為俄國革命的成功，只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成功，俄國應負起領導世界革命的任務。大戰爆發後不久，俄國革命即隨之爆發，這一事實，暫時證實了共產黨觀念的正確。於是第三國際遂努力在俄國以外的國家宣傳，冀有以促成那些國家的革命（參觀第四部七之十二）。然而到了後來，經驗告訴共產黨說：上述的手段，非但不能促成世界革命，反足以妨害俄國與各國間的和平的貿易關係，而這種關係，則為俄國所迫切需要。因此，當新經濟政策實施期中，第三國際的說話，雖然仍如往前一樣激烈，但行動則究已緩和得多。這種情形，曾引起托洛斯基、季諾維埃夫（Zinoviev）及其他的共產黨的憂慮，他們固執原來的意見，以為第三國際不應緩和對世界各國的革命宣傳，並以為倘若革命的

國家只有俄國一國，那末要想完成俄國的革命，便只有買通農民，使農民成爲資產階級，而後始有可能；他們引那時富農在新經濟政策庇護下逐漸蕃殖起來一事做例證。共產黨內部就這樣的發生長時期的爭鬪。最後，托洛斯基派終於被共產黨秘書長斯大林及其同黨所戰敗，托洛斯基於一九二七年被逐出國。可是離開此事沒有多久的五年計劃，其目的除求得俄國的自給以外，並有消滅富農一項；其亦有鑒於托洛斯基所指陳的危機，而思所以除患於未然歟？

俄國在過去數年中，業已建立了一個確切的目標：求得自給與對世界各國維持友好關係兩事，同時並進。這便是俄國以溫和態度對付日本、波蘭那些國家的由來。但俄國決不是已經忘懷戰爭。他們覺得資本主義國家對他們表示沒有惡意，只是暫時的情形，一等機會到來，那些國家是很容易第二次聯合起來，向他們進攻的。況俄國與歐洲各國間的條約，當其簽訂之時，對方面的經手者，概爲從國際戰爭的氛圍中長大起來的外交家，這尤使俄國不能不惴惴於中。一九三三年四月，當莫斯科政府逮捕英籍工程師加以鞠訊之時，英國的報紙與政治家，即說被捕者絕對無罪，他們所受的鞠訊決不能得到公平，其俄國的態度仍舊沒有一點和緩。

所以不論在什麼時候，蘇維埃政府總是被戰爭的恐怖所征服，其表現於行動者，為增強紅軍的實力，鞏固防禦工程，將重工業與軍火製造廠移至遠離邊陲之處所等；又如政府中常有人提議，將國都從莫斯科移至烏拉嶺附近，這尤足說明俄國對於未來的戰爭，是怎樣的重視。今日之俄國，一如從前的俄國，是個四面受敵的國家，這一點是俄國所深切明瞭的；現今的食糧恐慌，恰好使之愈加明瞭自己處境的危險。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給與他的印象，實在太新鮮了。

蘇維埃組織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如其名稱所示，是若干共和國的聯邦，由七個自主的共和國組成，茲列舉如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聯邦之中最大者）、白俄羅斯、烏克蘭、外加高索、月即別斯坦（Uzbekistan）、突厥斯坦（Turkmenistan）及太奇克斯坦（Tajikistan）。這七個自主的共和國，有幾個並包含若干『自治共和國』，例如伏爾加河日耳曼共和國（German Volga Republic）、遠東共和國、韃靼共和國等，便是隸屬於俄羅斯社會主

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自治共和國、喬治亞共和國、亞美尼亞共和國、阿才倍疆共和國等，則爲隸屬於外加高索的自治共和國。此外又有所謂『自治區』，其自治的權限，較自治共和國爲小。一九二三年的蘇維埃憲法，規定七個自主的共和國，除將有幾種權力由聯邦政府執掌外，均得享受自主的權利；可是聯邦政府的權力，實大得有些可以舉凡國外貿易、外交、國防、全國的經濟政策、國內貿易、稅制、勞動法等，總之一切大政方針，均須由聯邦政府制定執行，而自主的共和國，則只有在公衆衛生那樣的事務上面，獲得絕對的管理權而已。又如撤廢多餘的教堂這一問題，也於一九三二年收歸中央政府處理。

蘇維埃國家的人民，不論男女，凡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而依藉自己的勞力以生活者，均得享受公民權。不得享受公民權的人民，包括下列各種階級：一爲雇傭他人以謀圖者（富農亦屬之）；二爲依賴不勞而獲的收入以生活者；三爲僧侶及教士；四爲白癡及神經病患者；五爲舊時沙皇制度的雇員；但以上各種人民，有時得由省選舉委員會加以鑒別，選取合格的分子，恢復其公民權。據通常的統計，蘇聯人民之屬於上述各種階級，因而喪失公民權者，約有八百萬之多。凡被褫奪公民權

的人民，不僅喪失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而且不能爲工會的會員，不能享受領物單，並不能享受其他的重要權利。此種責罰，當然較施於犯重罪者的責罰爲輕，然而蘇聯對於一切罪犯，除反革命的罪犯外，都只處以極輕的刑罰，比別國要輕得多，所以剝奪公民權，實是一種極重的責罰。

蘇聯的政治機構，形式上猶如金字塔一般，蘇維埃制度好比基地，而各級蘇維埃代表，則好比一層層的石塊。最低級的蘇維埃代表，是市鎮蘇維埃代表及鄉村蘇維埃代表，其中並有工廠蘇維埃代表（在各級蘇維埃代表中間，城市工人比鄉村農民佔有更多的比例）。這些蘇維埃推選代表，組織縣（*raion*）蘇維埃大會。縣蘇維埃推選代表，組織省（*oblast*）蘇維埃大會。復由省蘇維埃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四百五十一人，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集會三次或四次，與所謂民族會議（由一切共和國及自治區的代表組織之）共同選出一個包含二十七人的主席團。這個主席團以及人民委員會，便是蘇俄的最高行政機關；所謂人民委員會，係各種人民委員會（如外交人民委員會，財政人民委員會等）所組成，其性質相當於英國的內閣。從前當列甯任人民委員會會議主席的時候，人民委員會是俄國的最高機關，自新憲法制定以後，地位降低一等，退居主

席團之下。此外又有所謂「勞動國防會議」，隸屬於人民委員會，實際上無異是人民委員會所附設的經濟委員會，專事審查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所提出關於工業及財政方面的計劃，而決定其可否。再下，更有各色各種的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分別處理各色各種的國營事業。但是這些機關，數目既非常繁多，名稱與職司，又時有更動，斷非這裏的篇幅所能罄述，只好加以省略了。

以上便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組織的概況。然而單知蘇聯的政治組織，而不明瞭蘇聯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則以上所說，都將成爲空論，甚至可以引起讀者對蘇聯的誤解。因此，我們必須把這兩個因素，即共產黨與好像蛛網樣遍佈於全國的小組織，簡稱叫做「集團」(the collectives)（註三）的，提出來敘述一番。

共產黨之在俄國，是主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其重要可以想見。他所以能主持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由於蘇維埃憲法使之有一種特殊的地位，而是由於在過去期間，有那麼的歷史，在現今，又有那麼的黨員。前面說過，在革命時代，共產黨是唯一具有明確方針的政黨。俄國假如要想

完成革命的話，就得使共產黨員擔任蘇維埃政府中的一切重要職務，俾可使他們執行黨的意旨。共產黨便這樣抓得了俄國的政權，直至現今爲止，此種情形，從未發生變動。固然，俄國差不多兩百萬名的共產黨員，未必個個都佔重要位置，而非共產黨員之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者，倒不在少數；可是真正重要的位置，卻依然被共產黨員佔據着，這些身居要職的共產黨員，其一舉一動，都得遵照共產黨全體黨員大會的決議，在大會閉會期內，則必須遵照共產黨政治部（委員九人，秘書長爲斯太林）的決議。因此之故，共產黨全體黨員大會會議席上的辯論，不消說是可以決定俄國大政方針的動向的。

然而俄國的共產黨的特點，決不止此；這個政黨，是抱有絕大的犧牲精神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欲想加入這個團體的男女，必須經過一次嚴格的審查與若干時的訓練，在訓練期內，他們的行動，無時不在未來同志的監查中，倘被那些同志認爲不敷資格，就會給削去預備黨員的名義。（共產黨常常舉行大規模的『清黨』運動，一九三〇年夏季的一次，預備黨員以前述的情形被開除者，達十三萬人）以極端審慎的手續，選取智慧與品性俱優得上做新制度的柱石的人們爲黨員，

這是共產黨的主要方針之一。概括的說，一個共產黨員須有爲國家服務的決心，須有擔當過度的勞作，並依照黨的命令，擔當種種分外的事務之精神。關於個人的服務精神及個人的行爲，共產黨向來懸着極高的標準，凡爲共產黨員，非合於這種標準不可。最近數年，共產黨員雖已可比較的不受黨的束縛，但報酬依然非常菲薄，生活仍甚清苦。再，每個共產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決議；無論理論與政策，當還沒有通過於黨員大會之時，黨員固可盡量提出討論（讀者可參閱歷次共產黨黨員大會的報告），但一等通過以後，黨員就有絕對遵從之義務，而已被否決的思想或策略，則任何黨員都不許繼續堅持。

由上可知共產黨是現代俄國的推動者，同時也是其指導者。即使不是共產黨直接管理的所在，也可感到共產黨的勢力，如在各種工廠中有名的『赤色三角』（Red Triangle）一般，都有共產黨的代表駐在那裏，他的職務，是與工廠委員會的代表及工廠管理集會討論，決定工廠的大政方針。共產黨的勢力，真可說是無遠弗屆。而且，我們切不要以爲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僅限於共產黨的黨員。第一，全俄人民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者，俱屬共產主義者（各種共產主義青年團體，使

是預備他們去參加的組織)；第二，有資格做共產黨員而猶在做預備黨員者，人數頗為衆多；第三——這是最重要的一項——爲了不願去受共產黨的嚴格的試驗，或斷定自己沒有通過試驗的能力，放棄加入共產黨的希望，結果俱不入黨，但心窩裏卻絕對贊成共產黨的政策，像這樣的人們，多到不可計數。在蘇聯，最露骨擁護共產主義的人們，有一部分並不是共產黨員。

然而，在共產黨的嚴峻的紀律與絕對中央集權化的統治的對面，卻配置着高度的自治與充分的自由批評，而且配置得十分調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實際上，單單此種自治與批評，已儘能使蘇維埃制度順利進行，一點也不感困難。有許多觀光蘇聯的人，覺得蘇聯最可驚奇之事，並不是鐵的紀律，而是非常熱鬧的討論、提議、以及批評；不論朝野上下，都一逕沉溺在這些討論、提議、批評之中，對於蘇維埃制度的各部分的工作方式，不僅批判其得失，並且加以修改，務使能適應地方需要或特殊情形，而修改時所採用的大刀闊斧的手段，又可使英國的政府官員舌擣不下。譬如就講司法罷；蘇聯對於天皇所主張的罪與罰務必求其相稱之法則，奉行唯謹，爲其他任何國家所不及。蘇聯的法律，除與國家的安全有關者外，都是很軟性的，並無絕對不許更動的一般法的性質，存乎

其間，而執行法律的權力，又不像英國那樣操於內閣各部之手，卻是操於『集團』之手；在蘇聯，工廠裏的工人有『集團』，分租房子裏的房客有『集團』，小學生的父母有『集團』，甚而至於監獄裏的犯人，也有『集團』。只要有幾個俄國人在那裏，那裏便有一個『集團』。所謂『集團』者，即地方委員會之謂，故在蘇聯，到處有地方委員會，也就到處有討論；甚至像移去一個躺在馬路正中的醉漢，這種事情，要是不先組織臨時委員會討論進行辦法，也許會辦不了的。

而且一切批評或控告，中央政府不但不予禁止，反大大的加以獎勵。報紙上滿載這種性質的文章；甚至有一個機關，叫做工農監察委員會，專司接受並考查控告，不受任何其他政府各部之管轄，地位很高，但隨時可以降尊紆貴，到民間去，調查各種控告，尤其是關於能力不稱職守腐敗情形，以及官僚制度等的控告之是否屬實。這種辦法，不消說是可以引起濫告與誣告這些弊端的；控告受獎勵的地方，私怨與細憤就有發洩的機會。在現今的俄國，彈劾負責人員既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關於營私舞弊及妨害工業等的告發，也成了家常便飯。推蘇維埃政府之意，以為一等全體人民有了極強的合作意識，共同埋首於一樁偉大而且重要的事業，就不怕私怨細憤不完全消滅；這種

信念並不是沒有理由，因為俄國正在創設一個新社會，工作異常緊張，但每人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卻非常菲薄，在這樣的情形下，歇斯脫里的性質與不良的脾氣爆發而為有害的行動，究屬情有可原，就大體上說，蘇聯人民的共同意志其實甚為堅強，至少都市中人民是如此。何況獎勵控告的辦法，對於社會的不滿，猶如安全瓣之於汽鍋，到底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事情呢。

說到這裏，我們似乎不能不把蘇聯的一種特殊組織，即國家政治保安部（G. P. D.）提出來敘述一下了。這一機關，創始於一九二二年，實際上是從『奇卡』變化而來。他是唯一的權力及於全俄的警察機關，此外的警察機關，權力範圍都只限於當地。除執行通常維持治安的事務以外，又負有防止國內反革命勢力的任務，補助責在捍衛國疆的紅軍的力量所不及。以此之故，他有權代表國家，對妨害工業的行動及一切反革命的陰謀實行總檢舉。他更被政府賦以絕大的秘密動作的權力，在受其雇用的大批人員中，有些穿制服，有些卻只穿便衣，以非正式警察的資格，混在社會上的無論那一個角落裏，人不知鬼不覺的幹着偵查的事務。這在英國人的耳中，當然是一種很可惹起不快之感的材料，不管蘇聯以外的歐陸各國，是怎樣比蘇聯更為善於利用密探，然而我們

不要以為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所做的事情，只是限於上面所述；他有時候也會做出絕對屬於社會性質的事情。舉個例子：為教養「無家庭的兒童」而設的全部組織——這真可說是一樁值得讚美的富於創造力的事業——便是國家政治保安部所發起而且促成的。

蘇聯政治組織的功能，便如上面所述，然而這只是蘇聯的一個輪廓畫，並不能說對於現代俄國的一切，都已描寫無遺。如由廢止私有財產所引起的社會變化，如國家的各種計劃，如將能生產的勞動者的地位擡得極高，將依賴不勞而獲的利益為生活的人們的地位抑得極低，那種舉動，在蘇聯都是流於異常的澈底，要想闡明這些問題，非有洋洋數十萬言的專書不為功，斷非這裏狹隘的篇幅所能辦到。總之，你如果去訪問蘇聯，你就得時刻被那裏的情形所激動，覺得蘇聯真是一個奇異的國家，凡被歐美諸國奉為模範的思想及制度，他均舉而投之垃圾堆，卻自己創立一套新的思想及制度，奉為模範。俄國也許還未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現今的統治者恐怕也只好這樣承認。可是他到底是向着社會主義這個目標奔跑的，所以其全部生活，不能不採取與眾不同的途徑，對於資本主義文明所由建築的一切思想制度的價值，也不能不毅然加以否定了。

此種對着社會主義目標奔跑的運動，是建築在俄國數千萬人民的覺醒的而且熱烈的合作精神上的。俄國的人民，單是被動的按時投票，萬萬不能說已盡公民的責任；他必須殫精竭智，畢生從事於改造社會，務使俄國在最短期間，變成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誠然，在俄國全體人民之中，能够認識和了解蘇維埃國家的目標者究有幾何，這個問題言人人殊，或以爲很多，或以爲極少，莫衷一是；然而除出被視爲社會公敵的少數人民（在俄國覺得自己是個四面受敵的國家之時，這少數人民也將始終被當作社會公敵看待）以外，俄國的全體人民，尤其是青年與兒童，全部蘊藏着清晰而且熱烈的「對國家的目標之了解和認識」，這是無論如何不容否認的事實。在現今的世界，俄國是唯一已經創造出一種爲古代的雅典人民所曾經有過的精神的國家；此種精神，同冷淡、遲鈍，好像死了心一般，有時卻盲目幹些破壞行動之中歐人民與東歐人民——其實就生活水準而言，這些人民大都高出大部分俄國人民之上——的精神比較起來，高下優劣之相去，奚啻霄壤？無怪共產主義的同情者的頭銜萬萬加不到頭上的人們，也要對之擊節稱賞，歎爲觀止了。

對文盲的奮鬥，以及俄國無產階級需要教育這種呼聲，幾使動作慢一點的俄國人買不到一

份報紙或一本書籍。雖則革命以後，俄國的報紙與書籍，產量均有飛速的增加。這只是蘇維埃人民熱誠的表現的一個例子。他如數百萬的婦女，或投入工廠，從事生產，或投入公務機關，擔任工作，此種情形，亦爲他國所未有。其實俄國革命所倡導的兩性平等的學說，不僅爲蘇聯的增進生產運動供給一枝生力軍，其對社會的影響與意義，尙有什百倍於此者。至如蘇聯對兒童的待遇，其動機竟可說是完全注重社會方面，而忽略生產方面。在這個世界，關於兒童生活及兒童勞動的法律，從動機上說，沒有一個能够比得上蘇維埃國家那麼寬大；蘇維埃政策重要目標之一，是避免歐洲其他各國工業制度所曾經走過的途徑，易言之，即絕對不靠犧牲新出世的國民，來完成創造工業國的事業。蘇聯的財富，能否應付蘇聯所已經訂定的關於兒童看護與兒童教育的極高標準，當然要看整個蘇維埃聯邦將來的經濟發展到達如何程度而定；可是對於蘇聯的動機與努力，我們已無所用其懷疑了。

(註一) 包括「集團」農場內部的牧場。

(註二) 當一九一〇年時，歐俄的幼兒死亡率率爲百分之二十八·五；一九二七年減至百分之十八·四，大都市的嬰兒，

死亡尤少。

(註三) 此字與集團農場不同。

